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 行 理 事 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陈 昱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陈 昱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王 坚	

《闽都文化》总第 93 期 2024 年第 4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陈 昱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林瑶佳 张博雅
编 务 主 任	单 南
编 务	何 玲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艾 奇
本期责任编辑	曾建梅
地 址	福州鼓楼区天皇岭弄 1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严复与北京大学

P12



郎官巷里的童年

P26

左宗棠：忘归石上证三生



左海风流

- | | | |
|----|-----|---------|
| 4 | 王义遒 | 严复与北京大学 |
| 12 | 华 严 | 郎官巷里的童年 |

榕垣旧事

- | | | |
|----|-----|-------------|
| 19 | 大 路 | 万历年间的福州血案 |
| 26 | 穆 睦 | 左宗棠：忘归石上证三生 |
| 33 | 危砖黄 | 1132，乌石山之会 |

双塔视野

- | | | |
|----|-----|----------------|
| 37 | 安 逸 | 翰苑连芳留佳话 |
| 40 | 吴新友 | 一张与加德纳家族有关的明信片 |
| 43 | 陈建中 | “协大”旧楼话往事 |

闽都宗祠

- | | | |
|----|-----|--------------|
| 46 | 张 茜 | 在龙峰河湾里 |
| 50 | 大 雄 | 藏了二十年的宗祠 |
| 53 | 郑秀杰 | 林家村，穿越时空的旗杆林 |

Contents

P53



林家村，穿越时空的旗杆林

P63



坑上人家

P82

走进龙山



闽镇闽村

- | | | |
|----|-----|---------|
| 58 | 董山静 | 罗源湾说潮格 |
| 63 | 莫 洁 | 坑上人家 |
| 68 | 邵永裕 | 石马骑山入梦来 |

在水一方

- | | | |
|----|-----|-------|
| 72 | 陈崇勇 | 水吉访古 |
| 77 | 张玉琳 | 长亭更短亭 |

侯官风采

- | | | |
|----|-----|---------|
| 82 | 林思翔 | 走进龙山 |
| 86 | 鹿 野 | 大地之眼 |
| 90 | 叶育新 | 秋江夜泛七里诗 |

- | | | |
|----|-----|-----------------|
| 封面 | 艾 奇 | 春景（摄影） |
| 封二 | 陈 伟 | 鼓山摩崖石刻（国画） |
| 封三 | 郑立流 | 宋王禹偁诗《春居杂兴》（书法） |
| 封底 | 陈玉树 | 精舍 |

严复与北京大学

王义遒

此前我在文章中曾称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898年成立时的首长孙家鼐，和1904年京师大学堂失去了最高教育行政机构职责，成为单纯“大学堂”的首长张亨嘉为“首任校长”。但实际上他们只是“相当于”校长，当年并无人这样称呼，前者其时的正式称号是“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管学大臣”）；后者则是“总监督”。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其首长称为“校长”，严复是第一任校长——北京大学首任正式校长。

一、长校背景

严复与京师大学堂的因缘可追溯到大学堂成立之前。他的友人张元济于1897年奉旨获准在京师成立了“通艺学堂”，供有中学根底的京官及其子弟学习西方科技知识，所谓“实学”。严复不但参与其事，而且还讲授“西学门径功用”专题。戊戌变法失败后，通艺学堂并入新成立的京



严 复

师大学堂。

1902年初，清政府拟将1900年停办的京师大学堂恢复。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邀请严复商量事宜，他从天津到北京，对恢复京师大学堂提出了不少革新的主意。其中首要的是要解除丁韪良的西学总教习职务。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让严复任西学总教习最合适，但张百熙受学堂内原有守旧派的掣肘而没有表态。后来严复曾不无自负地说，不聘他当西学总教习，“其不幸自在大学，于复无所失也，不独无所失，且甚得也。”后来张百熙聘他为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

1904年，严复辞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后去了上海。此时马相伯（即马良）带着一批学生脱离由法国天主教会主办、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正准备筹建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聘严复为董事。严复在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导下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与马良共同制订了《复旦公学章程》。1906年末，严复被端方任命为复旦公学监督（校长）。他接受任命后发现复旦财务十分混乱，便进行了整顿，引起校内某些宵小的毁谤。1908年春，严复觉得不值得和这些人计较，提出辞职。

1905年秋，京师大学堂原教习、时在安徽高等学堂任代理监督的姚永概推荐在上海的严复来安徽高等学堂主持校务。1906年4月严复到安庆后，看到该校规模大，经费充足，觉得大有可为。于是，他从学制、教学内容和学生甄别等方面开始整顿学校，包括淘汰不合格的学生，通过考试裁撤了几位中国和日本教习等。但其时他已是复旦公学监督，沪皖两地奔走难免顾此失彼，且还有一段时间卧病在沪。他的严厉做法自然得罪了一些人，因此，1907年，一些学生受某些教习的煽动而闹起学潮来。在这种情况下，严复选择了辞职，并于6月6日离皖赴沪。

此后，严复又回到了天津和北京，主要在学部、海军部及海军部下属的一些机构担任顾问、咨询一类职务，并短期担任过考试官，审阅过教科书。在政治上，他主张渐进的教育救国、君主立宪，反对共和革命。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校门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处于混乱状态，时任总监督劳乃宣托病而去。于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1912年2月25日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于3月8日到任。5月3日，根据大总统和教育部的命令，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名为“校长”。同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这个命令有内阁总理唐绍仪和教育部长蔡元培的副署。严复由此成为中华民国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二、保校功高

对于受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严复是高兴的，但实际上他接手的是一堆烂摊子，问题很多，矛盾百出。



蔡元培呈荐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等文

首先是政治上，严复是知名的君主立宪派，而从南方迁来的临时政府，特别教育部中以蔡元培为首多为革命派。严复此时虽已能面对现实，遵从共和，但在革命派看来，他还是一个保皇派，要处处加以防范。而此时校内还有不少守旧派，这使严复受到两面夹击。1912年4月24日蔡元培在北京上任之初严复前往拜会，提出北京大学应脱离教育部独立的主张，以免工作受教育部掣肘难以施展。蔡元培当面未置可否，却在5月1日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呈了一文，提出上述京师大学堂改名和总监督改为校长的意见，还提出：“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校

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北京大学校长，其余学科，除经科并入文科，暂仍其旧。”袁世凯批示，“准如所拟办理。”这显示，北京大学的重要事情都由教育部定夺，甚至校长的任命也得由教育部提出意见，大总统不过是批准并下命令而已。实际上将严复的独立要求挡了回去。

其次在经济上，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独立，各自为政，国库空虚，学部也不再给大学堂划拨经费。严复说大学堂“几至不名一钱”，一再请求度支部和学部拨款，但没有结果，其经费远不如天津北洋大学堂有税银保障。于是，严复只好利用其个人人脉在4月7日从华俄道胜银行贷款7万两以保证5月开学。但秋季开学时，这7万两银子已用完。严复多方筹措，终于在8月26日获得华比银行20万借款，除了偿还华俄道胜银行7万两本息外，还能提供秋季开学。但为此严复与教育部又闹了不少纠纷，教育部曾想将这笔款由他们来掌控，并在贷款抵押问题上也发生冲突，严复甚至再次提出脱离教育部“独立”。

再次是人事纠葛。辛亥革命后一方面有些教职工擅自离校，需补缺，另一方面原京师大学堂有不少冗员，有的还十分守旧。因此严复一方面要延聘新员，其中有一些是严复的乡亲故友，另一方面又在教务与庶务上裁撤了一些提调、监学等管理人员共20多人，节省了大量经费。严复要求严格，为此又得罪了不少人。



严复所作《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

虽有这些情况，北京大学还是在5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有818名学生参加，各界来宾甚多，教育部长蔡元培出席并发表演说，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开学以后本可按部就班地进行教学，但到6月却风传教育部要将北京大学停办。为此严复写了近1600字的《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申述了四点理由：一、北京大学的办学程度不可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但仍“为全国中比较差高之学校。今若将其尽废弃，是举十余年来国家权力所惨淡经营，一旦轻心掉之，前此所糜百十万帑金，悉同虚掷”。二、大学之“程度亦何常之有？吾欲高之，终有自高之一日；若放任而不为之所，则永无能高之时”。三、有人认为“我国教育方针必从普及入手，令中小学未备而先立大学，无基为壙，鲜不覆溃，则不知高等大学与普通教育双方并进，本不相妨。普通教育所以养公民之常

识，高等大学所以养专门之人才。……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四、为保存与研究我国新旧各种学说价值之需要。另外，关于经费问题，民国初建，百废待兴，区区一校一年二十余万金，对国家仅是“九牛之一毛”而已。最后他说，问题在于“存废”，如存，他就设法改革；如以他的看法为不然，则另请高明。

7月1日，教育部通知北大“并无是说，并飭力加整顿，以期进步”。但教育部仍企图将分科大学（相当于现本科生“学院”）改为选科，变相停办北大。为此，严复又给教育部写了近3000字的《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主要内容是：旧有分科学生最多再读一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于1910年3月31日才开学，有学生，一般学制为4年，而商科定3年），提前按选科



严复所作《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

生毕业，发给选科生文凭；而对外国教习按合同处理，对本国教职员本无合同，则量才录用。今后改良办法则是：招生以考试为准，不讲以前文凭，对学生要收食宿费（他认为过去免收学生学费与食宿费做法，不可久长），毕业授以学位；教习“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这样，大学还应造就师资人才，成为“一国之学业中心点”。他针对文（时“经科”已并入文科）、法、理工（“格致”科已改名“理科”）、农、商各科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办法（如商科学制也改为4年）。总的是要求增加西学的分量，而且西学要用西方原文来教。

他的“说帖”受到教育部的欢迎，因为教育部实际上是想利用将分科大学生改为选科，提前毕业，将北京大学解散。所以教育部在收到严复的“说帖”之后虽然声明“解散之事，全属于

虚”，却又在7月7日下了一个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说“大学堂自清末开办以来历十余载，更经丧乱，因陋敷陈”，“学生之班次虽增，陶植之成绩未着”，“政体既变，各方对大学咸有不满之意”。教育部遂议决停办大学，同时发下《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这九条是：1. 各分科大学学生一律提前于元年年底毕业，给予选课文凭，概不授予学位。2. 本年下学期各分科主要课应增加钟点讲授，其补助课钟点酌量删减。3. 分科学生从下学期起一律征收膳费，唯学费一项仍旧豁免。4. 本年年底各分科学生毕业后选其成绩优异者，每门资派一二名出洋留学。5. 凡合同将满之外国教员应按约辞退，其未满足诸员亦酌量辞退，以节经费。6. 各分科学长应兼充教员，唯文科学长既兼署校长，事务较繁，无须担任教课。7. 法科商科两学长应以一人充任。8. 文科及预科教务

长均应裁撤。9. 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

严复将他的“说帖”与此“九条”分头到各学科征求学生意见，鼓励学生将意见写成“说帖”转呈教育部。结果学生们意见很大，各学科学生纷纷写了给校长或学长、教务长的“说帖”，严复都转交给了教育部。这些意见中如有：文科的《论文科大学不应缩短毕业期限改办选课说帖》及《文科大学应办完全科不宜办选课说帖》，工科的《维持工科办法说帖》，农科的《陈请妥筹维持本科办法说帖》。法政科法律门三个学生直接写了本科不能改为选科的理由，请校长转给教育部。在这些“说帖”中，学生们所列举的理由通情达理、铿锵有力。他们从学生利益、课时、经费、教员、学生人数等方面来论证本科改选科之不妥，还以严复的“说帖”中所说的“法律不溯既往之原则”（即当今改革“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意思）来加以论述；并且对分科学生人数少的客观原因做了分析。他们还认为严复的“说帖”中提出分科改选科的主张也是因教育部有指令而不敢违抗的苦衷而造成的，实非本意。这说明多数学生是非常拥护校长严复的。

在校长与多数学生的反对下，教育部也松动了停办北大的意图。特别是1912年8月9日，全国临时教育会议第19次会议上讨论了“分设大学案”，决议要在北京、南京、武昌、广州四地设四所大学。北京既有了北京大学，自然不能将它撤并，教育部停办北大之动议就被否决。这样，严

复和广大学生保存北大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教学改革

严复成为北京大学校长后，除了尽心尽力解决经费和人事问题外，同时也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教学改革。

严复到任后，即召开了多次教职员会和教员会，商讨清扫积弊、改良进步的方案。首先，他认为政体既变，课程也应相应改良。于是将经、文两科合为国学科。这是他一贯想法，认为中国传统的“旧学”也得保留继承，就索性让一部分人继续全学传统学术。不过后来教育部主张，经、文两科合并为文科，他就改变了主意，在《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中说：“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但这与他的中西学分治，在一个人身上合一的思路并不矛盾。这也是他一贯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套的反映，认为体用是一源的。他强调“中西会通”，先分而治之，再结合为一。

其次，对于法科，他提出要改变过去法学科目以学习外国法律为主的情况，改为以学习本国法律为主。民国初建，虽然当时还只有约法和参议院法等少数几种，但今后会制订更多法律法规，是值得学习的，外国法律及历代法律只能作为参考。

再次，他将原“格致科”改为“理科”。但



严复关于挽留各分科大学学长呈教育部的函件

当年开学时理、工科学生很少，原有共 58 人，此时仅 18 人，不得不合为“理工科”。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非常重视作为“西学”主要内容的理工科。他说过：“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他特别强调要学物理学，认为“物理科学诚此后教育所不可忽”。他主张一方面要派遣优秀毕业生到德美两国留学，另一方面要整顿和改善实验室，还通过继续建设农科新校舍来扩展农科。

最后，他竭力聘任有欧美留学经历和在本国学习西学成绩优秀的西学教员，在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上也形成了说外语的风气，据说直到蔡元培长校后才终止。

在严复试图大展宏图革新北大教学时，6 月初财政部以库银支绌为由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月薪在 60 元以下者，照旧支給；在 60 元以上者，一律暂支 60 元。这在北大教职工中引起极大混乱，部分人员离开学校。严复为此给大总统袁世

凯和教育部上了一个“说帖”，说明大学不能执行这个通令的理由。为了表示服从政令，愿意牺牲自己，将月薪由 300 元降到 60 元，其他人按原薪照发。结果，财政部采纳了这个“说帖”，北大包括校长在内的全部人员的薪水不变，平息了北大的混乱。

接着，在 7 月 3 日，教育部根据国务院通令照会：北大教员不得兼职。可是当时法科学长王世澂、农科学长叶可樑、商科学长吴乃琛分别在总统府、外交部、财政部兼职，教员吴闿生也在总统府兼职，他们都表示宁愿辞去大学职务。严复呈文教育部遵令的同时却力图挽留这几位学长，给“遵令”打了折扣。9 月，严复本人又担任了总统府顾问，这更是违抗了教育部通令，引起教育部严重不满，甚至有人眼红严复又能得一笔丰厚报酬。部里又多革命派、留日派人士，对严复这个君主立宪派早就看不惯，再加上华比银行贷款的纠葛，严复与教育部的矛盾已不可调



郎官巷严复故居

和。而此时正好碰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应袁世凯之邀北上，黄兴向袁世凯推荐了章士钊任北大校长，以使北大受国民党掌控。当时原教育部长蔡元培已因不满袁世凯独揽大权而辞职。10月1日，在严复并未辞职亦未被免职的情况下，袁世凯下达了任命章士钊为北大校长的命令。这种一校两长的局面使严复十分尴尬，加上当年京津一些报刊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这也使严复无法表白，极度苦恼。这样，他在10月7日不辞而别，到了天津。此后北大校内学生分成两派，绝大多数学生拥护严复，上书大总统收回成命，章士钊也坚持不上任。10月8日，袁世凯任命马相伯代理北大校长，但“拥严派”学生以“盗卖校产”的不实之词赶他，他只好以“年老不能胜任”为由辞职。12月27日，袁世凯正式免去了章士钊、马相伯的校长、代理校长职务，任命

曾任京师大学堂工科监督、彼时为工商部矿政司长的何燏时为北大校长。但多数学生还是反对，实际上是要求严复回来。学生闹事，学校混乱不堪。第二年教育部又以北大“费用过多，风纪不正，学生程度尚低”为由，要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这遭到何燏时和师生及社会各界反对，何于1913年11月5日提出辞职，学校由工科学长胡仁源代管。1914年1月，正式任命胡仁源为校长。这之后，经过教育部

再次要求北大并入北洋大学和袁世凯称帝闹剧，到1916年12月26日经教育总长范源濂聘请、大总统黎元洪命令，蔡元培任校长，北大才出现了新面貌。

严复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到北京大学校长，总共只执掌了学校7个月，他的教学改革主张和教育思想实在无法实现。即使如此，他还是为北大后来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笔者以为，这点连蔡元培也是承认的。蔡氏曾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20多年后1934年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说，1912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他将当年的事（而且严复并未辞职）记成了“两年后”，说明在蔡氏的心目中，这一段时期严复的工作对北大还是相当有影响的。

郎官巷里的童年

华 严

我出生在一个很不平凡的家庭，父亲的家享有盛名，母亲的家世代巨富，但是我的童年却不如人们所料想中的快乐。

父亲名璠，是严家的第三子。大伯璩。二伯年纪很小便去世。父亲之下有四叔璿、五叔玷，以及四位姑母瑛、璆、珑、珒。母亲慕兰，是林家的次女。大舅熊徵、大姨慕安、二舅熊祥和三舅熊光是她的弟弟。我是父母的次女。大哥侨、大姊倬云，三妹庆云不满周岁便夭折，四妹佻云、两个弟弟杰和僖。手足中只有我一个人兄弟姊妹都齐全。

大哥是祖父的长孙，出生时老人家十分高兴，赋诗道出内心喜悦之余，在北平大阮府胡同宅第中举行空前盛大的庆祝，大门口鞭炮之声连续不绝，那时他的气喘毛病已经很严重，长袍马褂打扮一番，燃点香烛虔诚地叩谢祖先，然后端坐大厅上头，笑逐颜开，上气不接下气地接受家人晚辈向他道贺的跪拜。大姊出生时没有大哥那般风光，但也差强人意，毕竟她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女儿。我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出生后，大伯连



严倬云

忙替我取个名字叫倬云。他自己只有两个女儿倚云和系云，四叔、五叔都还未婚，所以殷切地希望父亲能为严家多制造几名壮丁。叫“云”的女孩子必须“停”了，大伯说。但他的心愿未曾得偿，想赶到严府来的女孩子还是匆匆忙忙、冒冒失失地在赶路。该停的云停不了，又来了一个我的妹妹。父亲想了想，干脆庆祝吧，把她叫作庆云。但庆云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原因是奶妈身上有脚气的毛病，她吃了她的奶，因缺乏维生素 B1，而致心脏衰竭。大哥、大姊出生时雇奶妈都经过体检，我和三妹的奶妈则删去这项手续。



严停云外祖母陈芷芳（前坐者）和母亲林慕兰（左一）、大姨母（左二）及三位舅父，大舅林熊徵（右二）、二舅林熊祥（右三）、三舅林熊光

我们两个人的奶妈偏都有这种毛病，自小弱不禁风的我没在当时发病，长得漂亮又强壮的三妹，却因此送了小命。

庆云去了，又来了一个妹妹，父亲把她命名为伶云。却在小名上做些功夫，管她叫“更”（更换一个方式吧），在心里暗暗这样祈求。果然，上天不负苦心人，二弟降生了。家人亲友七嘴八舌地说：“我知道这回一定是个男的，桌面嘛，四条桌脚生了下来，再生的一定是张桌面了。”此桌面又来了一张桌，我的三弟，但三弟没有二弟气派，没把他的桌脚带来了。

父亲是位典型的古时读书人，他对佛学非常有心得，擅诗文，又有一手极佳的书法。在北平清华大学念了一段时间，对祖父说，他无法佩服那些教授，所以不去学校了（后来清华送他一个学士学位）。祖父要他到德国留学，也被他拒

绝了。毕生自修研究，孜孜不倦。

全面抗战前不久，美国哈佛大学有意请他主持一个有关佛学的研究中心。双方接触数次，却因战事爆发而停顿。他有一间大书房，连接着大花厅，然后是一处种植着四时好花的庭园。公余时父亲的天地便在此中，我们兄弟姐妹不敢侵入他的世界打扰他，他对外界凡间的一切也多半不问不闻。母亲生性至孝，外祖父28岁时去世，外祖母年轻轻的守寡，为了儿女和家业，备历艰辛。母亲和诸位舅父姨母也就特别孝顺以慰亲心。嫁到严家不过经月，母亲便恢复日夕侍奉跟前的习惯。我们家住福州城内郎官巷，三次搬家，从巷中到巷尾再到巷头，也仍旧是在郎官巷。原因是外祖母住在杨桥巷，后门设在郎官巷，和我们家的前门距离不过丈余，如此，母亲每日来去十分方便。

通常她午后三四点钟回娘家，外祖母睡得晚，伺老人家上床就寝，回家的时候接近午夜。自从我们上学，除非周末，或者放学后到外祖母家去，我们很难见着母亲的面，上学去时母亲尚未起床，放学归来母亲已上外祖母家，晚上母亲回家，我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

如此，我们那偌大的家以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管家婆婆率领的奶妈、丫鬟、房下（福州人用语，即同打扫房间及洗涤的女工）甚至厨子、男工的管辖和控制中。

管家婆婆和丫鬟是母亲从娘家带来的，奶妈则是我们断奶后仍留住的几个，有最多意见，最



郎官巷

以她所奶过的哥姐儿的荣辱为荣辱的争权夺利、抢位子的人。众人中尤以管家婆婆，曾伺候过外祖母，在家中有高人一等的气势。她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天生一对狭窄、凶光四射的眼睛。没念过书，头脑简单。她会告诉别人我们家的“鹅”正在生“鸡蛋”。那时闽剧演着《苏东坡游赤壁》，“赤”与“七”福州话同音，她说这戏非常好看，可惜七壁中她只看到第五壁。

母亲对她好，她也对母亲忠心耿耿，深得母亲的信赖。然自己也是个女人，却比任何人都更看不起女人，闲里没事注意我们姊妹长得比兄弟结实些，便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说：“猪不肥却肥了狗！”

大哥出世后她自告奋勇帮着奶妈照顾他。对他的爱一往情深，三弟也是她所爱的，她见了

他们时的称呼总是“心”呀、“肝”呀、“命”呀、“宝”的。她并不爱二弟，因为她直觉认为二弟是母亲心中的第一块瑰宝，因此替大哥和三弟抱不平，背地里恨得牙痒痒的，管二弟叫“太子”。但是恨归恨，见了太子她可丝毫不敢失礼。

管家婆婆常常命令姊姊和我做哥哥弟弟的游伴，他们爱骑马，我们便充当马儿。骑士们手执长鞭，我们跪在地上奋力爬行，膝盖和手心因此常常擦破。遇着骑士是哥哥，我这羸弱的驽马便不胜负荷，频频马失前蹄，管家婆婆的脸孔又放下了，不是打手心，便是遭罚跪。没经她老人家许可，不管多久，也不许擅自起立离去。

哥哥弟弟们有很多玩具，让我们姊妹看了十分羡慕。一回我们看中一只小橡皮艇，趁哥哥不在家，拿出来吹足空气放在浴桶（当时用的是日

式既高且大的椭圆形木桶)中漂呀荡的。不巧哥哥回来了,我们慌里慌张把小艇塞向他的玩具柜子中。不出五分钟,那湿淋淋还未把空气放走的橡皮艇揭发我们的罪状了。管家婆婆和哥哥的奶妈都当审判长,姊妹中以我的嫌疑最大,定为罪魁无疑,管家婆婆宣判我应该被送往后街一家糕饼店的烘炉接受烤刑。行刑的人指定糕饼店的老板雇师,我说她不敢,我将禀报父母。她立刻拉着我直奔后街,那肤色黝黑,尖头颅、八字眉、血盆嘴的雇师正站在熊熊炭火的大烘炉旁。管家婆婆对他说:“雇师,来,帮我把这个做坏事的孩子放进烘炉里面去!”

雇师粗声应着,边龇牙瞪眼,双手鹰爪般钩曲着做大猩猩扑人姿态向我左一脚右一脚地迈过来,我吓得魂不附体,尖声号哭,接下去多少年,当我听得雇师名字,或是大门口见他老远摇摆着矮胖身体沿着巷子来,便急忙转身逃走,跑进卧房一个劲儿地往棉被底下躲,即使是六月天,被掩得全身汗透,也不敢把头伸出来。

我们家有个男工,他当过兵,见了我总管我叫参谋长,他也不喜欢管家婆婆,因为她常常吩咐他做着“女人才应该做的工作”。一日交给我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十来只死蟑螂,还有一把图钉,要我夜晚时分溜入管家婆婆房中,把那些东西放进她的被窝里。夜里我走进管家婆婆的房间,原以为她在洗澡,谁知道她一个人在房里流眼泪。我大感惊奇,没想到她也是个会流泪的人,她见了我,瞪着一双三角眼:“这时候你来我

房间里做什么?”

我不说话,回身跑开去。后来母亲告诉我一些管家婆婆的故事,长大后我才知晓管家婆婆年轻时有一场动人的罗曼史和一次失足,这在当时母亲并未说给我听,只提她很可怜,受婆婆和家里人虐待。丈夫爱上别的女人,经常打骂她,家境困苦,生孩子时没钱请接生婆,自己跪在床旁泥巴地面上把一对双胞胎男婴生下来,没几天,婴儿因护理失当死去了……

我们兄弟姊妹三餐吃饭,都由管家婆婆率领的奶妈众人列队站在身后“伺候”着。管家婆婆不希望我们多吃小菜,说人要多吃白米饭,小菜的作用只是把饭“骗”下肚子去,又说;乖孩子、聪明的孩子知道多吃白米饭,谁小菜吃得最少谁就得到第一名。这情况下我最容易上当,拼命大口大口地吞下白饭争取冠军。

不知道是吃多了白米饭,或者是小时吃了有脚气病奶妈的奶,我的脚气病发作了。发病时恰在那年外祖母生日的盛宴后。夜里躺在床上,整个人里里外外都很不自在。那时候的我七八岁,晚间已不由奶妈陪伴,而是和姊姊同床睡在父母卧室后面的一个房间。我开始气喘如牛,父亲听见了,问:斑(我的小名),你是怎么啦?

我回答我是在“呼大吸”。第二天我们的家庭医师梁伯伯来了。他为我把脉,用听诊器为我诊察着,又用小锤子在我膝盖下面左几下右几下地敲敲打打,我的双脚木呆呆的,毫无跳弹的反应,梁伯伯说我的脚气病已经很严重了,如果



郎官巷



郎官巷严复故居内景



再拖延下去，心脏就要受影响。他为我注射强心针，又注射维生素 B1 的针药。父母和梁伯伯都担心我受不了药水的刺痛，但我的眉头也不皱一下地接受了。我注了不少维生素 B1 的针，又把米食改为面麦。

我本来不爱面食，但知道白米对我不好，便自然地不去想它，我病愈后很久，面麦食的习惯也还留着。那时，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位婆婆级的人物，她也曾经在外祖母家中工作过，外祖母对她很关爱。她是个寡妇，现在姑且管她叫寡婆，她来了便在母亲房中摸摸抹抹做些轻松的工作，闲来无事，坐在大天井旁的梧桐树下挥动着扇子打蚊子纳凉。

我们家有雇用多年的男裁缝，年纪三四十岁，鳏居，或者是不曾结过婚。母亲在门旁附近划个地盘让他有个工作间，除了缝制父母亲和我们衣服外，也让他接些外人的衣服裁剪。寡婆来了没多久，便和裁缝好上了，这些本来不关我

们小孩的事，却不料有一晚，我冒冒失失地闯进裁缝的工作间。也不知道他和寡婆正在做什么，只见二人见了我，惊慌失措乱作一团，离开裁缝的工作室，寡婆尾随着我来了。

“二妹哥（福州话尊称年幼的女孩子为妹哥），我刚才吓死啦。”

她说看见一个眼睛像铜铃，舌头伸得长长的鬼，站在裁缝工作室的门后边儿，吓得她连忙扑进裁缝怀里喊救命。

“那鬼是有来历的，二妹哥。”

“那鬼生前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寡婆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是从前住在我们这幢房子里那家人的大女儿，因为和拉黄包车的男工谈恋爱，被多嘴的妹妹向母亲告发。黄包车夫被辞退，大小姐挨了打，又被关在房间里。那一夜，她上吊死了，从此变成吊死鬼。每当月黑风高，便到处现形……

寡婆估高了我当时的理解能力，我完全不知

道她和裁缝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也不知道她捏造那么一个故事的用意所在。我本来胆子小，又好幻想，她那样平白地把个恐怖至极的鬼怪形象植入我的脑子中，使我从此更感全屋无一处安全地带，睁着眼、闭着眼，只觉到处阴风惨惨，鬼影憧憧。

我还怕生病，先是听父亲的一位老朋友中风了，我头晕眼花，手足无力好几天。那日梁伯伯来为父亲量血压，便坚持请他也把我的血压量一量。又听一位长辈心脏病突发去世，说发病前只觉一阵天旋地转。接下去好几天，我成天都觉天地正在旋转中。又听大人们谈论失眠的痛苦，我也担心自己会失眠。忽然有个奇怪的想法：入睡前我是清清楚楚的，入睡后便无知觉，这从清醒到入睡的交接点是在哪里？我想着，开始烦恼自己无法从清醒的界线接到睡的界线去。一连好多天，蒙眬欲睡时，一阵忧虑使我浑身冒汗，惊跳起来，于是我真彻底而且严重地失眠了。母亲听梁伯伯的指点给我一些安眠药，但安眠药的力量抵挡不了我的念头，我仍旧整夜眼睁睁地在担心自己无法跨越那个界点的恐惧中。

这样过了几乎一个月，母亲给我喝了好些竹叶心熬的茶。也不知道是否那种茶有些作用或者我那专和自己过不去的念头终究也会疲劳，我开始入睡了。以后很久，我不敢对人提起，提起来心有余悸，怪念头蠢蠢欲动，又将来袭。我还有一个怕，就是蛔虫，当时蔬菜花果的处理方法未臻标准，蛔虫病是大人小孩常见的毛病，母亲房间

柜子里经常放着一大玻璃罐屈臣氏塔糖，我平素爱吃糖，也一向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思，唯有见到那粉红色上有波浪刻痕的尖锥形糖药，却怎样也不肯张开嘴巴吃下去，仿佛我情愿把蛔虫养在肚子里而不敢面对着它。我前后数次被蛔虫吓得很惨。一位当时在我们家的父亲堂妹闹了蛔虫的毛病，奶妈告诉我那一次她上马桶，起码拉下结成一大把的二三十条。

我怕病，但是不怕痛，我怕鬼，但是不怕死人。第一次看见死人，是跟着母亲、二舅、姨母他们参观林家在福州兴设的一所题名博爱的大医院，我跟在大人们身后，转来转去，竟转错了路走进太平间，我看到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男孩的尸体，站在他们近旁眼睁睁地盯着那灰里带黑的脸孔，许久许久不想离开，直到院中有人前来把我领回母亲身边去。又一次也是在博爱医院，我竟误闯进手术室，小小身体挤在医师身后看他们完成一次血肉模糊的断腿大手术。

外祖母是我童年时心目中最神奇、伟大、可爱的人物。是她使我的童年加添了万花筒般的绚丽色彩，她像《红楼梦》中的贾母，由她的安排指挥，杨桥巷那大宅第，连月连年的庆典和节日活动，走马灯般的令人心旷神怡，目不暇接。她又是最慷慨的圣诞老人，每逢过年过节，给我们的玩具和食品，总是成担成担地挑着来。

老人家有张满月般的脸，弯弯淡淡的两道蛾眉，眼睛看着我们时总带着慈祥的笑，中国式的狮子鼻，则是和厚的表征，尽管那时候已经六十

多岁，但白净而细腻的肌肤上不见皱纹。她的一双脚裹得又短又尖，算是当年一般人眼中最美好合格的。身体丰腴，小脚载不起那重量，成天里不是床上躺着，便是坐在卧房靠窗的一张桌子旁，手中一根长长的旱烟管，散发着雪茄的香味。

我直到现在没有注意别人饰物的习惯。外祖母手上那一对特大号碧绿晶莹的玉镯子和一枚仿佛夏夜天空中最大星星的钻戒，却是依旧在我记忆中璀璨发光，

外祖母的生日是农历闰五月十五日，每年五月到临，杨桥巷一连三进的大宅第整顿装潢，焕然一新，张灯结彩，满目辉煌。先由鼓山涌泉寺圣恩老法师主持礼佛拜年。接着第一大天井中竖起大银幕放映电影，那是胡蝶、阮玲玉、王人美的时代，我记得演过《白云塔》和《渔光曲》，又记得自己撑不开睡意正浓的眼皮，看某位女主角一双手一路颤抖着放进嘴里一颗荔枝。

第二进天井中搭了戏台演的是闽剧，那时有个最有名的乾旦叫林芝芳，演着《紫玉钗》《玉堂春》和管家婆婆最爱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学校里正是季考的时候，我平时不念书，这时腋下夹着一册教科书，装出十分用功的模样，跑东跑西地赶热闹。我爱听圣恩老法师率领徒儿礼佛时和谐又透着凄惻或悯然的唱诵声。众比丘中我特别注意一个年纪很轻的，他的长相非常清秀，声调非常好听。我心中十分好奇，不知道他是何愿心，抑或受了何等人间疾苦，使他在如日初升的时刻，看破红尘出了家。



华严女士作品

七七事变前一年的夏天，外祖母因糖尿病逝世，杨桥巷的大宅第从里到外一片素缟，备极哀荣。繁文缛节的悼念过程维持了整整一年，直到老人家的朱红色大棺徐徐落土，掩埋了她七十二个年头多姿多彩、亦苦亦悲的生命轨痕，也结束了我的虽有声有色，却多愁多惧的童稚岁月，童年的一切如今离我十分遥远。青少年时百般的苦恼和艰辛也早已成为陈迹。年少时听父亲说过一句话：“做一颗棋盘上的棋子，生命把你怎么下，便怎么安。安，是做人第一要诀。”当时听着不甚了了，时日过去了，经历了种种坎坷，对生命的一份认知随着加添；我明了安的意义，学习随遇而安。但不管环境怎样，不敢忘记鞭策自己，有如小草，遇有阻隔，匍匐着从石缝中爬行出来。我的路非康庄，欠辽阔，但只要努力不懈，前程终能在望。到现在，我已是一个甲子过了的人，仍愿意向小草学习、看齐。所得的结果只一滴青翠、一份嫩鲜，我已经满足，已经别无祈求。

万历年间的福州血案

大路

楔子

明嘉靖八年（1529），一个叫王尧封的官员，往上递了一张病假条。不久，批复下来了：皇帝给了他一顿臭骂。皇帝说，公事没交代清楚，就敢擅自请假？停职！

明代的官员，工资很低，连后来的《明史》都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而且很没有尊严，动不动就被皇帝喝令拉下去打屁股。

这位王尧封，好歹也是“巡视浙江兼制福建沿海地方都御史”，堂堂中央都察院正二品官员，地方官见了会发抖的御史大人，生了病上头不加慰问，还被“革职闲住”，够委屈的。

明代皇帝对官员请病假的处理，那是超级严苛。比如天顺二年（1458），明英宗下令，“御史再不许养病、省亲”。之后有好些御史，因在京做官没有携带家眷，病重无人照料，孤零零死在京城。



明世宗嘉靖像

嘉靖六年（1527）颁布的规定刚缓和了一点，“京官告病者，吏部查验的实，照例放回。若托故诈病、扶同保勘、病痊不赴任者，一体罢职”。现在皇帝又翻了脸，下令说，王尧封的职务，让“浙江左布政使胡珵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之”。

这是当年十二月的事情。谁也没想到，这张病假条，像“蝴蝶效应”的那对翅膀，轻轻一扇，先引发了一桩福州血案，再掀起东海上的大风波。

一张病假条引发血案

嘉靖九年（1530），正月将尽。

从永乐七年（1409）开始，上元节的假期从正月十一开始，到正月二十方才结束。此时，元宵的灯才收了几天，上班的人们也刚刚收心干活。年前才升了官的胡璉，要到福州来巡视了。

这天凌晨，天还没亮，福建布政司的布政使查约、参议杨瑀，福建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王翱，提刑按察使司的经历周焕，都集中到南察院，等候恭迎上头派来的御史胡璉。

南察院在哪呢？就在今天孔庙大成殿后面。

侯官县令黎文会没有来。他又喝醉了。

黎文会是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上任前是个举人。乌山下的侯官县衙中，有知县宅。黎文会就住在这里，他那爱喝酒的脾气，大家都知道。连县衙中门外西边县狱里的狱卒，也都知道。

刚过完年，狱卒的荷包有些瘪。知道黎文会爱喝酒不管事，就大着胆子收了犯人的银子，要私下里放跑两个。

其中一个，叫林汝美，是原来县衙里办事的，也算老同事，杀了人（也有说他是杀妻）被抓起来了。另一个叫车小二，这人是当地黑社会老大，贼狠，狱卒们谁都不敢惹他。

银子入袋，枷锁也解了。月黑风高，县令已醉，快走吧。

谁承想，这两位刚出了房门，居然从牢里地

上的冬瓜里抽出刀来！

同伙被抓的一堆犯人，全让他们给放了。出去时，大概惊动了巡逻的，车小二、林汝美一不做二不休，路过知县宅，剁了黎文会。按原定计划，他们要出南门兜赶海路逃亡。这一群越狱犯路过南察院，嚯，一大群官员！杀！

布政使查约，参议杨瑀，都指挥使王翱，按察使司经历周焕，等等，就这么全给杀了。

这个血案，在万历《福州府志》中，是这么叙述的，大家可以看原文：

嘉靖九年，侯官县狱囚反，时正月二十九日夜也。

初，侯官县令黎文会素酗酒，守狱者得囚金，纵之。有林汝美，故县吏也，以杀人论死；车小二，则郡巨盗也。二人私以兵器藏瓜中，遂率众斩关而出，杀侯官令，趋南门，将逃于海，适三司晨候御史于南察院，遂杀布政查约、参议杨瑀、都指挥使王翱、经历周焕，贼逸去，后颇追获。

最后一句中的“颇”，该通“叵”，指“不可”的意思。是说他们逃走，没有被捕获。

清代郑祖庚的《侯官县乡土志》，也提到了这桩血案，版本略有不同，说他们“又破府狱，纵其囚。时诸司衙参皆被杀”。意思是不但把侯官县狱给开了，还跑到福州府的监狱大闹一场，把犯人都给放了。

还说，“贼由井楼门斩关，出趋连江，航海遁去，官军捕之，终不获”。

井楼门在哪？大约在今天龙山巷与井大路的交叉口。这些人出了井楼门，直奔连江，下海。

——如果不是王尧封因为请病假被停职，胡璉就不会取而代之，到福州来视察。福建的这些官员，正二品的福建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王翱，布政司的查约（他是浙江海宁大族查家的，有可能是金庸的祖上），就不会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下束手被杀。

越狱杀人犯，逃哪去了

明初，朱元璋上位不久，在各省设置了政府机构：

1. 掌管民政的，叫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由文官担任，官衔是从二品。
2. 掌管监察与刑狱事务的，是提刑按察使司。由三品文官担任。
3. 掌管军事的，是都指挥使司，相当于各省

军区。都指挥使是武官，正二品。

这三司分权而相互牵制，大权统归中央。地方如有大事，中央会空降官员，暂时主掌一切。

明初的福建，人口有380多万，算是大省。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在福建省设了两个军区，一个是福建都指挥使司，总部在福州；另一个是福建行都指挥使司，设在建宁（今建瓯）。

福州的军区，是在洪武四年（1371）正月就设置了福州卫指挥使司，第一任长官就是朱元璋的侄女婿、驸马王恭，为的是抗倭防倭。

史料有记，洪武三年（1370）六月乙酉，“是月倭夷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傍海之民，遂寇福建沿海郡县……”“洪武五年（1372）六月丙戌，倭夷寇福州之宁德县”“洪武五年八月癸巳，倭夷寇福州之福宁县，前后杀掠居民三百五十余人，焚烧舍庐千余家，劫取官粮二百五十石”……类似的记载不少，福州卫的任务还是挺繁重的。

接着设置建宁都卫指挥使司，是因为陈友定的流寇还在闽浙这一带活动。

到洪武八年（1375）十月，又“改都指挥使司……福州都卫为福建都指挥使司”，建宁那边也升级为“福建行都指挥使司”。

按郭造卿《闽中兵食议》中说，“闽地有二都司，五水寨，旧额共马步官军四万八千二百余名”，明代福建的兵力，比浙江、广东的都要多。而福建都指挥使



井楼门古城墙遗址

司，地点就在今天湖东路与鼓东路那一带。

这两条路之间的都司巷，就是因明代福建都指挥使司设在此处，后来得名的。福建都司周边，当时驻有福州左、中、右三卫，每卫编制5600人，三卫总兵力，接近17000人。

这么多的兵，怎么就抓不住几个逃犯？

很巧，搜索资料时，笔者在明代文学家郎瑛的著作中看到了逃犯的名字。

郎瑛是杭州人，生于1487年，卒于1566年。福州惨案发生时，他40多岁，应该是听说过这事。

郎瑛在《七修续稿·国事·浙省倭寇始末略》中写道：“嘉靖廿九年秋，福建林汝美、李七、许二越狱下海，诱引日本倭奴与沿海吴籍，结巢双屿，横行水上，行文于浙之宁、台。自称奥主，借银米于某地交割，否则引兵入界，官司尽空……”

假如郎瑛的记录正确，那么，这个越狱犯林汝美，从嘉靖九年（1530）越狱，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居然还活着，而且更加肆意妄为，“结巢双屿，横行水上”，成了大海盗。双屿在今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六横岛一带，正是明代走私商人及倭寇盘踞的地点。林汝美们公然以武装敲诈浙江的宁波、台州官府，要银要米。

福州这桩血案，除了本地的方志，没有看到其他的资料记载。当时朝廷如何处理，不得而知。这群越狱犯在浙江海面掀起了大风波，真想看看，冷血的嘉靖皇帝，他还能不能淡定不理？

双屿港大捷

明朝廷当然不肯善罢甘休。朗瑛继续写道：“上命都御史朱公紈开府于浙，因调福建（行）都指挥（僉事）卢镗、浙江都指挥梁凤等捣其巢穴，严禁下海。”

总指挥是朱纨。朱纨是谁？

来看《明史》中朱纨的传记。

朱纨是长洲（今苏州）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明年七月，倭寇起，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可见，朝廷调动朱纨，是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七月间的事情。这个时间，咱们不要理睬文人朗瑛，先以《明史》为准。

当时的双屿，并不简单。朱纨的列传中，提到“奸民阑出入，勾倭人及佛郎机诸国入互市”——人员很复杂。除了“倭人”，还有“佛郎机”，就是葡萄牙，还有“诸国”。

有一本1614年初版的《远游记》不知道



朱纨像

大家有没有看过，是葡萄牙商人及冒险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ao Mendes Pinto）写的。

在书中，他写道：“……至1540年或1541年，葡萄牙人已经在双屿建屋千余所……有居民三千人，其中葡萄牙人一千二百名”“双屿比印度任何一个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加壮观富裕”，和其他葡萄牙人一样自说自话，把双屿当作葡萄牙人的殖民地。

当时，葡萄牙人还与走私商人许二、李光头以及日本人一起劫掠福建、浙江。

朱纨上任之后，先是设法管制沿海的船只，让载重三百石、长四丈、宽一丈二、吃水六尺以上的民船全部到官府登记注册，双桅以上的民间大船全部被官费买下，编号后由官府管制调用。这一来，海上的走私船基本跑不动了。

再来看他调用的将领。

浙江明明也有都司，朱纨为什么不就地遣将，还要从福建调用卢镗呢？

这原因不好明说，但私下里谁都知道，沿海卫所的军队，与走私船向来有暗中勾连。卢镗的工作地点在闽北山区，与沿海的走私商人搭不上关系，不会走漏消息，这大概是第一个原因。

卢镗出身军人世家。他的高祖卢宝是平阳卫千户，祖父卢英是处州卫千户，嘉靖二十二年（1543），38岁的卢镗世袭做了福建镇海卫千户，《明史》说他“有将略”。卢镗因屡立军功，升福建都指挥僉事。

嘉靖二十七年（1548）三月，卢镗率领1000

名福清兵，与浙江方面的千余名乡兵会合，带着轻重火炮以及火绳枪，下海攻打双屿港。

两方一接触，胜败立分。最能打的大盗李光头立刻被俘，日本倭寇的旗舰也被明军缴获。接着，朱纨亲自到达督战，封锁了双屿港的出入口。各国海盗先是顽抗，接着伺机出逃。当年四月初七，明军攻破双屿，将岛上的建筑群、港内的27只船一把火烧光。葡萄牙殖民者全部被驱逐出双屿。

双屿岛孤悬东海，易攻难守，朱纨于是下令以木石填塞港口，然后撤军。

走马溪之战与朱纨案

心有不甘的海盗们，屡次在海上发起反击，都被明军打败。逃走的葡萄牙海盗，跑到当年的另一个海商走私基地——漳州月港外的浯屿继续作恶。

嘉靖二十八年（1549）正月，葡萄牙海盗联合双屿残党，集结在福建诏安走马溪，准备反攻。明《备倭记》提到走马溪，说“亦呼贼澳，为海口藏风之所，凡寇船往来，俱泊于此”。葡萄牙海盗侵入走马溪的岐下、宫前、山南等村庄打家劫舍，还在附近海域抢劫商船。

卢镗与福建巡视海道副使柯乔，命令福州左卫指挥使陈言等，率领福清兵和海沧兵，与漳州浯屿水寨、铜山西门澳水寨、诏安玄钟军等处的部队，一同进军诏安湾和东山岛。

二月廿一，海盗们手持火绳枪出战。卢镗早已在海陆要隘埋设伏兵，此时亲自擂鼓，指挥将士，在夷屿海面，将三艘葡萄牙大小战舰和四只叭喇唬船团团围住，激战三天，全歼葡萄牙等外国侵略者和海匪 239 人。所生擒的 96 名海盗，全部就地正法。朱纨大喜，向上报捷说：“全闽海防，千里肃清。”

然而，这些海盗，与当时浙闽两地的海上走私集团息息相关，走私集团有不少浙闽富豪甚至官员的股份。朱纨海上剿匪这几年，走私团伙损失惨重。对于“砸饭碗”的朱纨，他们放出谣言，说这 96 个“被擒者皆良民，非贼党”，买通御史陈九德、周亮等，弹劾朱纨“举措乖方，专杀启衅”，说卢镗、柯乔等“党纨擅杀，宜置不理”。

这么多人在嘉靖皇帝面前说尽朱纨的坏话，嘉靖这种皇帝听风就是雨，便下令撤了朱纨职务，让兵科都给事杜汝祯组织审讯。

消息传到，朱纨气得当场痛哭：“吾贫且病，又负气，不任对簿。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说自己做官多年，家贫如洗，现在又生病又受气，不想再到公堂上分辨是非了。

朱纨“制圻志，作绝命词，仰药死”，在官兵来逮捕他之前，写下墓志铭和遗书，喝下毒药，自杀了。

而跟随他转战三年的卢镗、柯乔，随后被革职、判了死刑，下狱待死。

抗倭名将卢镗，是否终结了福州越狱案

对待外国侵略者，确实不能手软。朱纨一死，“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摇手不敢言海禁事”，于是海防松弛，倭寇大起，东南沿海告急。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七月，明朝廷派出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管福兴泉漳地方”。王忬启用泉州人、参将俞大猷及温州参将汤克宽等，赶赴浙江。

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明军在普陀岛大破倭寇。朝廷大喜，论功行赏。王忬乘机上奏，请求释放卢镗、柯乔等。《明史·卢镗列传》中因此说卢镗“寻赦免，以故官备倭福建，迁都指挥”。卢镗全力投入战斗，和俞大猷一起成为抗倭主力，立下不少军功。

然而，在抗倭拉锯战中，某些不上前线的御史们叽叽歪歪，说王忬在沿海抗倭不力，嘉靖皇帝便把王忬调走了事。

再后来，王忬因“积怨严嵩，遂下狱，次年斩于西市”，死得很惨。王忬有两个儿子，老大是明代大文学家王世贞，老二叫王世懋，后来做过福建提学。王忬的冤情，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新皇登基的隆庆元年（1567），兄弟俩上京申冤，才得以平反。

嘉靖三十三年（1554），上头派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闽军务。张经是福州洪塘人，知道卢镗的本事，升卢镗为参将，分守浙东。卢镗与俞大



都司巷人家

猷配合默契，屡败贼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海盗林碧川出没台州外海。卢镗遣都指挥王沛在大陈山海滩大败林碧川，生擒这个盗首。有资料说，林碧川就是林汝美。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嘉靖九年（1530）的越狱案，至此可以结案了。杀了福建都司指挥使王翱的越狱犯，终结在他的同事、福建行都司指挥使卢镗的手中。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卢镗升任都督佥事。虽然他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因上司胡宗宪被劾又一次被拖累下狱，但好在朝廷上还有不少人为他抱不平，得以免罪遣归故里。卢镗活到1577年，他这一世，看到了戚继光、俞大猷们平定倭乱。

《明史》说，卢镗的抗倭功劳，仅“亚俞（大猷）、戚（继光）”。

补 记

回到最初。那位请病假被撤职的王尧封，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又做了南京兵部尚书及户部尚书。第二年，65岁的他又被罢了官，被迫退休。他的老家河北保定定兴县有人给他立过牌坊，到20世纪60年代，这牌坊因为当地拓宽公路被拆除。

而胡璉，按照《胡氏族谱》中提供的资料，这位胡大人，在嘉靖九年（1530）之前，曾经做过闽广兵备道，还缴获西洋火器“佛郎机”，命人改造为“神机炮”，为剿灭倭寇起了作用。嘉靖十六年（1537），擢为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佥都御史总督云贵二省粮饷，征讨安南。在嘉靖朝，胡璉看来混得不错。

不过，在《明史·列传》中，提到胡璉，压根儿就没有说他嘉靖朝的风光，只有这么一句：“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进士，官刑部。尝谏武宗南巡受杖。”说他年轻时，一个小小刑部郎中，不过是五品官，还敢劝谏正德皇帝不要南巡，被狠狠打过一顿屁股。

福州老城，湖东路社会主义学院的公交站牌后、海运大厦边，至今有都司巷。穿过这窄巷，能见到的，不过是水泥房、水泥路、水泥墙。走到巷子尽头，抬眼看，路对面是“鼓东一号”电梯房。闹市中密密的高楼大厦，遮蔽了数百年历史的痕迹。

左宗棠：忘归石上证三生

穆 睦

光绪十一年（1885）暮春三月的一天，初雨乍晴，鼓山上来了了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他看上去很是羸弱，额头前面隆起的圆骨，衬着瘦削的脸庞，显得格外突出，他的左目几近失明，看东西时会不经意地转过头来，这时候若对上他的右眼，会感觉精光乍现，一股凌厉慑人的威严迎面扑来。

老者 73 岁了，正是去年底刚到福州督办福建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41 岁以举人出仕，历任兵部郎中、太常寺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其间“剿灭发逆、擒、回各匪”、创办福建船政，授东阁大学士。同治十三年（1874），任钦差大臣督办

新疆军务，“底定回疆”，加恩二等恪靖侯。光绪七年（1881），一直军机，旋任两江总督。光绪十年（1884），二直军机，三个月后，改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因其曾入阁，且两直军机，世人称之为“湘阴相国”。

潮声浩瀚来沧海

左宗棠是光绪十年（1884）十月廿七到的福州。

在此之前的两江总督任上，他以“目疾加剧”，多次疏请回籍调理，朝廷也准了他的假，可惜假未休完，就因“边事愈棘”，催他急速入京觐见。



这“边事”，就是法国侵略越南进而攻击驻越清军而引起的“中法战争”，从光绪九年（1883）十一月打到现在，清军连连失利，先后丢了北宁、太原、兴化等地，慈禧太后震怒之下，撤了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左宗棠是公认“敢战、能战、知兵”的人，“边事”伊始，便表现出“冀收安南（即越南）”的决心，故此，此番入京，朝廷便是让他入值军机。兼“管理神机营事务”，希望“遇有紧急事件”时，可以随时“预备传问”，并向法方传递出和谈不成就决战的信心。

因为这时候，法国正忙着与英国争夺对埃及的控制权，无力扩大战争，主动提出了和谈，朝廷也默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占领，让主张“可和则宁和”的李鸿章先和法国谈谈，这自然遭到了清流言官的谴责。把疆臣中主战最力的左宗棠调回中枢，一来减少谈判的阻力，二来以知兵的人入阁，可以堵主战派的悠悠之口。

但磕头换不来和平，软弱得不到尊重，谈着谈着，法军找了个借口，就对中国本土发起军事攻击。七月初三，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仓促应战，全军覆没，官兵阵亡700多人，船政局也遭到破坏，之后，法军转攻台湾。七月初六，朝廷被迫对法宣战。七月十八，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此时，台湾局势已岌岌可危，基隆失守，沪尾受敌，全台海口被封，法国舰艇游弋在台湾海峡！

云气飞鹏下郡城

左宗棠来到福州后，将钦差行辕设在北门的皇华馆（今福州三中附近）。在此之前，福州的官民因“马江败挫，一夕数惊”，有户人家院中的木头倒地，发出“砰”的一声，家里人以为是炮响，裸足而奔，引得周围人惶惶不安。所以左宗棠的到来，让福州人倍感安心，以为廉颇不老，遂在皇华馆贴了一副楹联迎接他：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荡节即使节，轺车乃军车，说的是左宗棠此行，气吞斗牛，兵强马壮，东南半壁的安危，终于有保障了。

这副对联，左宗棠十分欣赏，尤其“复临”二字，让他想起了两位福州故人。

一位是林则徐。

毫不夸张地说，林则徐是左宗棠步入仕途前的偶像。鸦片战争后，从两广到新疆，再到云贵，他的心一直追随在林则徐的左右，同悲、同愤、同喜，甚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对着星空问素未谋面的林则徐：“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知复几人？鸟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想着“勤萃备至”的林则徐，他多希望自

己能“分其劳”，能“佐万一”，可惜他就是个落第的举人，教书的先生，困在这年年旱、年年闹饥荒的柳庄，家事缠身。当好友胡林翼将他推荐给林则徐后，他还在为侄子成亲、教导陶家子弟读书而操心，无法脱身。

道光二十九年（1849），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还乡的林则徐，途经长沙时，想起了这个被胡林翼称作“楚材第一”的人，遂派人到柳庄约请左宗棠一见，左宗棠闻讯，马上赶到林则徐停泊在湘江的画舫上，65岁的重臣与37岁的布衣，彻夜长谈，相见恨晚。两人聊到的关于西北边政，尤其是新疆大患的话题，深深刻印在左宗棠心中，为日后他收复新疆埋下了伏笔。

另一位是沈葆楨。

沈葆楨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他的仕途没有沾林则徐多少光，反而得益于两个外人，一个是保举他担任江西巡抚的曾国藩，另一个就是左宗棠。

同治五年（1866）二月，左宗棠剿灭最后一股太平军后，由粤入闽，意气风发，开蚕棉馆，办正谊堂书局，又选址马尾，创建福建船政。当他准备大展宏图时，突然接到朝廷谕令，调他为陕甘总督。船政伊始，如何能停，于是他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楨“出主船政”，可沈葆楨有沈葆楨的顾虑，只一力逊谢，左宗棠无奈，只好效“三顾茅庐”故事，也“三造其庐”，终于说服沈葆楨，同意于次年六月母丧服阕后出而任事。

可惜，马江一战，因“两张无主张，两何无

奈何”，船政局毁于法军炮火，令左宗棠不胜唏嘘。

鼓山曾见异牛祠

说到“两张无主张，两何无奈何”，左宗棠想起了一桩轶事，这事跟“两张”之一的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有关，也与一头牛有关。

张佩纶是著名的清流，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坚决主战，结果被朝廷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在法舰进入马尾港后，张佩纶自告奋勇上前线指挥作战，不料，开战仅半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灭，船政局亦被炮毁，在马尾山督战的张佩纶瞠目结舌，仓皇逃跑，以致跑掉一只官靴。为了吃饭，他换上兵勇的服装，“微服”来到船政局卫生队所在的彭田（位于鼓山），躲了三天。事后，他向朝廷的奏报中将这段经历轻描淡写为“军情瞬息千变，既牵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误于陆居，不能同舟以共命”，这“陆居”二字甚是巧妙，将彭田丑事一笔带过。

左宗棠于光绪十年（1884）来福州时，曾派台湾总办全台粮台兼理捐借事务的沈应奎到“鼓山访牛”，这在张佩纶看来是非常可疑的举动。马江方败，台事未了，左宗棠千头万绪，如何有空理会一头牛？何况沈应奎原是贵州布政使，因在贵州废除与法签订的协议而被免职，此番入闽，亦是左宗棠保举，准备前往台湾负责防御并训练民团。让一个前“副省长”找牛，牛何幸也？于



1870 年时拍摄的鼓山放生池

是，心虚的张佩纶向同为“清流四谏”之一的好友陈宝琛去信，认为“沈意不在此，欲借此陷害某也”。

这事情，陈宝琛是这样解读的。

首先左宗棠喜牛。左宗棠的四儿子左孝同在《先考事略》中提道：“府君（指左宗棠），将生之夕，祖妣梦有神人，自空中止于庭，谓牵牛星下降，惊寤，而府君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左宗棠是牛郎下凡，自然对牛情有独钟。

其次，同治五年（1866），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放生过一头牛，当时还是举人的陈宝琛亲眼所见，便将此事记录下来：“左文襄公（宗棠）督闽时，有奔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师至闽，遣沈道应奎往视之，已毙矣。追述其皈依后异迹，寺僧就其瘞处，立异牛祠焉。”这异牛祠旧址仍在，即今鼓山的放生池。

这本是一件寻常的事，张佩纶因为心中有鬼，这才对左宗棠“找牛”的举动疑神疑鬼，以

为左宗棠借“找牛”为名，派人到鼓山搜罗其贪生怕死的材料。

叨陪上相开双眼

其实，左宗棠入住钦差行辕后，真没空管张佩纶的闲事，他把心思都放在了援助台湾、部署闽江防务、拓增船炮上。

台湾是南北海道的咽喉，关系甚大，不容有失。所以左宗棠入闽后，以援台为第一要务，他联系南洋大臣，以援台兵轮做出进逼台北之态，牵制法军，使其有所顾虑。

在台湾局势稳定后，他开始布防闽江防务。闽江口有两道防线，一为长门、金牌，二为闽安，他先令所部“各营勇分扎长门、金牌、连江、东岱、梅花江各要口，严密巡防”，又在海口“最要之地”的长门、金牌，竖立铁桩，横以铁索。另外，在林浦、魁岐及闽安右路的梅花江，也垒石填塞，仅容小舟通行，并打捞被法击沉的火炮，加固炮台。除夕，正是家家户户团圆过节的日子，他顶风冒雨，深入长门、金牌前哨巡视，致欲偷袭的“法军引去”。

他还奏拓福州船政局。船政是左宗棠的心血，马江海战后，虽然修复了船厂的厂房和设备，但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左宗棠痛定思痛，从加强战备和海防全局出发，决定重新规划。他上了个奏折，要求拓增炮厂，并于穆源开办铁矿，冶铁自用，“彼挟所长以凌我，我必谋所以制

之”。知耻而后勇，为时未晚。

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地加强备战的时候，广西传来了“镇南关大捷”的捷报。

镇南关位于中越边境上，在中法战争初期，左宗棠就派他的老部下王德榜急赴滇桂边界募军，并以自己的爵位将该军命名为“恪靖定边军”。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法军进攻谅山，谅山、文渊、镇南关相继失守。危急关头，朝廷派冯子材、王德榜等部赴关迎战。冯子材正面迎敌，苦战两日，王德榜则深入敌后，断敌军火，二人内外夹击，终于取得了镇南关战役的胜利，法军的尼格里准将重伤，士兵伤亡近千。广西提督苏元春称，此战中，“冯子材、王德榜尤为卓著战功”。

茫茫瀛海何时晏

镇南关大捷前后，左宗棠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手常不由自主地颤抖，批阅文书时，笔都无法握住，伏案时间一久，就感觉六神无主，头晕眼花，有时还会咳血，想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又会气喘腰痛，困乏不堪。医生说这是“肝脾火忧，心失所养”，建议他悉心静摄。恰巧黄波前来拜访，便放下手头的政务，邀了他一起前往鼓山。

黄波，是湘军名将黄润昌的三弟，名润珂，字沛皆，与左宗棠是长沙老乡。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将他从粮台调到督署，总理营务，后又提拔他署理扬州知府，可惜没多久他得罪了提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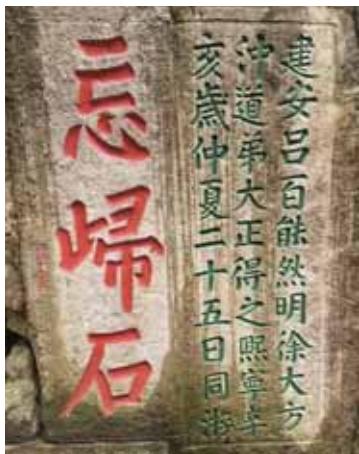
使，被弹劾降级使用，跟了漕督杨昌濬。马江海战后，杨昌濬入闽当了闽浙总督，他也跟着来到福州。

见左宗棠下了软舆，黄波赶忙上前搀扶。三月的福州，与长沙很像，湿气重，乍暖还寒，尤其是雨，又轻又细，蒙蒙的，总有一种如烟的湿漉。尽管雨停了，但上下台阶，还是要格外小心。

鼓山是闽藩左辅，山中的涌泉寺更是闽刹之冠，若不是军务繁忙，左宗棠早想登山一览，顺便看一看鼓山的摩崖石刻。他11岁起就留意书法，还从二哥处借了一本劳崇光收藏的《北海法华寺碑》帖学习，书法上的造诣自然不弱，而鼓山壁立千仞，石刻如麻，正可以慢慢欣赏。

望着苍苔半蚀下名公巨卿的文字，左宗棠总要轻轻摩挲。他一会儿跟蔡襄、苏舜元、朱熹、赵汝愚、陈孔硕、真德秀、龚用卿等古人交流，一会儿跟林则徐、沈葆楨、陈宝琛、林寿图、杨浚、周莲、吴大廷等同僚倾诉。如果题刻者与抗击外虏有关，他会久久伫立，仿佛对他们遭受主和派排挤的经历感同身受，想起力主抗金而罢官寓榕的李纲、因主战被秦桧诬陷的张元幹、金人犯淮而抱愤以卒的汪若容、安南之役中居功至多的汪文盛、鸦片战争时在五虎门练兵抗英的苏廷玉。

站在比自己还要高大的“忘归石”前，他想起了李纲题灵源洞的一首诗，“淹留遂忘归，怅望云海暝”，原来李纲当年也曾站在这里惆怅、徘徊，对“偷安朝夕间”，顿足捶胸。是啊，这茫茫



忘归石题刻

瀛海，何时能晏？

原本镇南关取得了大捷，正应该乘胜追击，将法军赶出越南，再伺机渡海收复基隆，谁承想，朝廷以李鸿章为首，竟然不进反退，想乘胜而和，理由是“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唯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这是什么逻辑！打败了和，打胜了也和，怎不叫人郁闷于胸？

在兼山亭坐定，黄波已写好一首诗，题目叫《陪湘阴相国游鼓山》，诗曰：“劣巔峰头雨乍晴，忘归石上证三生。潮声浩瀚来沧海，云气飞鹏下郡城。题咏尚留唐宋字，登临不尽古今情。叨陪上相开双眼，一览乾坤万里明。忽从天半会群英，洞口神仙亦笑迎。出岫闲去随变幻，在山泉水自澄清。茫茫瀛海何时晏，落落晨星几点明。一夕便传千古迹，他年勒石纪功成。”

黄波说，他会叫人将诗刻在灵源洞前的崖壁上，让后世的人都能想起左宗棠的功业。“他年勒

石纪功成！”左宗棠的泪夺眶而出，功成不必在我，“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

落落晨星几点明

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廿七的傍晚，福州城的东北隅传来巨响，听说是城墙崩裂了两丈，还在庆幸没有人受伤，大雨就倾盆如注，下了整夜。天刚放亮，就听到大街小巷传来了哭泣声，原来左宗棠薨了！

左宗棠的死，与朝廷的最终妥协有关。四月廿七，《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正式签订，中方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法军退出基隆、澎湖，至此，中法战争宣告结束。

消息传到左宗棠耳中，他气得浑身颤抖，当即上了“疾愈剧，以款议垂成，疏请回京复命，并恳开缺回里治疾”的折子。朝廷不允，只给了一个月假。

六月初九，左宗棠的病情突然恶化，伴着痰涌、气喘、抽搐，神志也开始昏迷。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想到了家乡，想到了家人，也想到了两件他一直无法放下的事。

一是海防全局。

六月十八，他忍着病痛向朝廷上《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形棘手。”希望选一贤能之士主持大局，凡一切海防政事，皆由该大臣统筹全局，他把衙署都想好了，“驻扎长

江，南控福建、广东，北卫畿辅，或驻署办事，或周游巡阅，因时制宜，不受廷部的遥控。”

二是台湾建省。

也是在六月，他再次上奏：“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震慑。”这实际上是沈葆楨的主张，故后世有“台湾建省，始于沈葆楨，而成于左宗棠”之说。

这两件事最终都在九月初八得到了施行，可左宗棠等不到了，在病痛的折磨中，他的生命悄悄走到了尽头。

七月廿五，左宗棠病重，连连咯血。次日，他把次子左孝宽叫到跟前，口述遗折：“伏念臣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知，屡奉三朝，累承重寄，内参枢密，外总师干，虽马革裹尸，亦复何恨！而越南和战，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生，不能瞑目！”倍哀于将死的禽鸟之鸣，字字恳切，句句戳心。

七月廿七的晚上，在风雨交加中，左宗棠永远闭上了他渴望了解世界的双眼。

九月初七，福州为左宗棠举行御祭，朝廷派福州将军古尼音布前往致祭。次日，灵柩发往湖南。启行时，《申报》记载了当时的经过：“送葬者自督抚、将军、学政、司道各大宪之下，均徒步徐行，末则孝子孝孙斩衰徒跣，哭泣尽哀。闽人士感公恩德，一律闭门罢市，且罔不泣下沾襟。自皇华馆至南台，沿路张结素幄，排列香案。绅士及正谊书院肄业生，皆在南台中亭路



《陪湘阴相国游鼓山》题刻

祭。远近观者，如海如山，路为之塞。”

他年勒石纪功成

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初二，黄波带着潘纪恩、易孔昭等左宗棠旧部、老乡再次登上鼓山，来到了灵源洞。物是人非，一年前他勒在洞壁的《陪湘阴相国游鼓山》诗仍在，可诗还是那首诗，陪的人却已不同。

吟诵着诗中的“他年勒石纪功成”，泪水浸湿了黄波的眼眶。是呀，左宗棠两任福建，仅仅在福州待了20个月，但无论是创建福建船政、兴办蚕棉馆、开设正谊堂书局、发起南台团练局，还是组织恪靖援台军、整顿福建防务、增拓马尾船厂、开采穆源铁矿、试办闽台糖务、奏议台湾建省，哪件事在他人不是避之不及？只有他迎难而上，肩任不辞。他以诸葛武侯自居，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132，乌石山之会

危砖黄

徘徊于摩崖石刻间，最让人心动的是对这些石刻隐藏的历史细节或人物境况作某种猜想，然后便萦绕于心，时时惦记着要解开那雪泥鸿爪下的秘密。

福州乌石山霹雳岩下，有这么一段摩崖石刻：

参知政事孟庾，宣抚闽部、按视城守回，邀嗣濮王仲湜、资政殿大学士李纲、龙图阁直学士许份、显谟阁待制王仲薿、监察御史福建抚谕胡世将、集英殿修撰知福州事程邁、前右正言邓肃、参议官尚书屯田员外郎李易、机宜朝散郎胡纺、干办公事直秘阁马咸、承议郎郑士彦，会于乌石山之长乐台瑞云庵。绍兴壬子正月二十一日。

“绍兴壬子”，即绍兴二年（1132）。

要读懂这段石刻，先要了解石刻上出现的人物。在这些人物当中，李纲是最具历史声名的一位。



乌石山霹雳岩下的摩崖石刻

李纲是什么时候来到福州的？

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三月中旬，已经罢相数年的李纲，携家人经沙县由水路来到福州。到福州之后，李纲先是寄居于安国寺，六月移居

南台岛天宁山（今烟台山）的天宁寺。他在《迁居南台天宁寺》诗中发出一声感叹：“壮年几何时？倏忽成衰翁。”但终究是在福州定居下来了。

李纲定居福州之后，与好友王仲薮邀约、唱和颇为频繁。夏季的一天，王仲薮邀约李纲到城中西湖聚会，李纲写下一首诗《王丰甫待制会宴湖亭》。诗中描写了福州西湖夏天夜景之美，也写到自己当时赋闲的心情，委婉地表达了屈身南方、壮志未酬、酒醉浇愁的内心隐痛。王丰甫，即王仲薮，字丰甫，华阳人，北宋宰相王珪次子。高宗建炎三年（1129），知袁州，虜人寇江西，坐失守削籍。

冬天，李纲又有《天宁路上初见梅花，奉呈王丰甫待制》（三首），其一云：

江梅何处不先春？海峤初逢若故人。

谁谓冰姿太清淡，一回相见一回新。

诗中，李纲视梅花如故人，海滨见梅花，感到芳香奇异，特别清新脱俗。

他们曾一同登鼓山（鼓山石门至今留有他们的题名石刻“昭武李纲伯纪邀华阳王仲薮丰甫……绍兴元年五月二日”），还曾一同参加乌石山的一次聚会。

乌石山的这次聚会，发生在绍兴二年（1132），记载在霹雳岩下那段摩崖石刻上。“参知政事孟庾”亲自邀约，规格自然很高。

从时间上看，这次聚会跟平定范汝为之乱有关。范汝为是建州人，原是盐贩，于建炎四年（1130）七月率众起义，八月攻入建阳县城，在

宋廷的威胁利诱下，于十二月接受招安，受神武副军都统制辛企宗节制，但没有解散部众。绍兴元年（1131）九月，监察御史胡世将为福建路抚谕，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汝为怀反侧，犹肆剽掠。”高宗下诏悬赏擒杀之。十月，范汝为再次起兵，入据建州城，部众多至十余万人，战火蔓延至江西，朝野震动。当时的知福州事兼福建安抚使程迈连续上书，要求“改命将帅”，派重兵来平乱。十一月，高宗命参知政事孟庾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从抗金前线调回名将、神武左军都统制韩世忠为宣抚副使，率军三万入闽“征剿”，并令辛企宗所部改隶韩世忠指挥。韩世忠从台州航海至福州，尔后北取建州。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四，韩世忠部已围建州城，旬日之间，建州城破，范汝为在逃跑中自杀身亡（一说自缢，一说自焚）。此后，农民军余部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很快被韩世忠部击败。

乌石山聚会的“正月二十一日”，恰在范汝为为之乱平定之时。聚会由巡视回城的宣抚使孟庾邀约，大概有通报战况和庆功、慰问、安抚之意。

孟庾，绍兴元年（1131）十月任参知政事，十一月奉命为福建、江西、荆湖宣抚使，与韩世忠一起，为平定范汝为为之乱而来。他不需要亲赴前线，次年正月，其人在福州。

嗣濮王名列受邀者首位，显然，这是一场高官显贵的聚会。

嗣濮王仲湜，又是何许人也？赵仲湜（1073—1137），字巨源，宋太宗的玄孙，祖父

赵允让被封为濮王。汴京失守时，六军欲推赵仲湜登皇位，仲湜以“自有真主”而推辞。高宗即位时（1127），仲湜率众拜谒。论辈分，仲湜是高宗的皇叔祖，高宗乃下诏让仲湜袭封嗣濮王。可见，赵仲湜在南宋皇室中，德高望重。

为什么嗣濮王会出现在这次聚会中？或者说，为什么这位嗣濮王会来到福州？

据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载，南宋皇室于高宗建炎四年（1130）将原供奉的七殿神御、四殿御容，由浙江温州奉安于福州开元寺大殿。由此，嗣濮王赵仲湜来到福州，是很自然的事。另据郭柏苍《乌石山志》记载，在乌石山蟠桃坞，有赵仲湜题名手书的摩崖石刻：“建炎庚戌正月二日，因礼神光宝塔，遍游乌石精蓝，乘兴造西禅，历览胜概而归。男士街、士术、士衍、士程，侄士鶚，婿廖虞弼侍行。皇叔祖少傅、开府嗣王仲湜巨源书。”建炎庚戌为1130年，巨源是赵仲湜的字。这里面说的是，赵仲湜礼佛神光寺，游览乌石山，陪同者有他的儿子士街、士术、士衍、士程，侄子士鶚，女婿廖虞弼。只是，此石刻今已不存，黄荣春编著的《福州摩崖石刻》列入“佚刻”。

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北方和长江沿线动荡不安，南宋皇室为避乱而南来者并不鲜见。不但赵仲湜来到福州，吴国长公主和驸马潘正夫也因避乱来到福州，并在乌石山留下了题刻踪迹，即乌石山霹雳岩“绍兴二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题”的那方石刻。



潘正夫题所石刻

聚会中的许份，字子文，闽县人，状元许将之子，崇宁二年（1103）进士，官龙图阁学士。胡世将，字承公，晋陵人，崇宁五年（1106）进士，绍兴初范汝为乱时，充监察御史、福建路抚谕使。程迈，字晋道，安徽黟县人，哲宗元符三年（1100）进士，高宗时期先后知福州、温州，后入京，官至显谟阁直学士。邓肃，字志宏，沙县人，授鸿胪寺簿，曾出使金营，擢右正言，时李纲罢相，上疏争而罢归，绍兴二年（1132）避寇而居于福州。李易，字顺之，江都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时为参议官、尚书屯田员外郎，在宣抚使孟庾帐前效力。

李纲是前宰相，既然居住在福州，受邀是自然的事。李纲有诗赠孟庾，即《奉赠宣抚孟参政二首》：

赤子潢池学弄兵，柄臣仗节到闽城。
布宣威德雷霆奋，慰抚烝黎雨泽倾。
鏖战指踪烦妙略，凯旋铙鼓震欢声。
灵旗径向江湖去，早定艰难底太平。

（自注：克建城日，雷初发声。自去年冬久旱，王师来乃雨。）

睢阳一别五经春，邂逅相逢瘴海滨。
华发知公因国事，苍颜顾我久埃尘。
绋袍念旧故人意，药裹关心多病身。
人觐从容见知旧，为言只欲老垂纶。

此诗明显是为平定范汝为之乱而写，同时写到个人的情谊和感慨。

这次平寇期间，李纲还有诗赠安抚使程迈。他在《题止戈堂二首，奉呈安抚程待制》中写道：“止戈当自瓠闽始，愿挽天河洗甲兵。”止戈堂，据《榕城考古略》，在当时的府衙内，原本是“甲仗库”，韩世忠来福建平寇时，在这里饮过酒，遂改名止戈堂。

韩世忠抵达福州时，特意拜访李纲（东京保卫战时，韩世忠是李纲部属），“移樽就教”（朱维幹《福建史稿》）。李纲在《以旧赐战袍等赠韩少师二首并序》中说：“某以罪戾忧患之余，卧病江海，少师被命

宣抚闽部，相见有故人恋恋之意。既而躬率将士克复建城，讨荡群寇，一方宁谧，奏功凯旋，将复言别。随行有旧赐紧丝战袍、镂装松文剑、镀金银缠笥枪、金花团牌，山林病夫无所用之，辄以为赠，愿持此为圣主折冲御侮，讨叛敌愆，建中兴之功，使衰病者增气，不其韪欤！”

这年二月，李纲获除观文殿大学士，出任荆湖广南路宣抚使，兼知潭州、湖东路兵马钤辖，后又兼湖南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李纲力辞，朝廷派内侍前来抚问，李纲推辞不掉，便于五月起行，离开福州，赴任湖南，也平乱去了。

李纲等人“会于乌石山”的那方题刻，记录的虽然只是一次聚会，它的背后却是刀光剑影和历史烟尘，以及为民生安定而奔波的身影和风骨。



乌石山霹雳岩

翰苑连芳留佳话

安逸

福州文庙于唐大历八年（773）从福州城西北移建今址（鼓楼区圣庙路），1200多年不变址，虽处闹市中心，却在尘世喧嚣中独显清静且庄严肃穆。文庙里曾经展陈“邹鲁名邦 文脉

流芳——福州古代教育史展”“科举鳌首 大魁天下——福州历代状元展”“识礼明仁 闻乐知德——礼乐文化展”，令人记忆深刻。

教育史展和状元展都与古代科举相关，不可避免地提到福州“三科三状元”“一榜三鼎甲”“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五子登科”“六子科甲”等科举盛况。其中，“三代五尚书”“七科八进士”的盛况，出自同一个村同一个家族，那是仓山区林浦村林瀚及其父孙四代人的佳话。《榕城考古略》称，林浦是“明尚书林瀚所居，三世五卿，为闽中望族”。

“三代五尚书”的名字至今仍刻在村里的明朝隆庆间皇帝赐建的“尚书里”石碑坊上，历历在目，有案可稽。石碑坊正面中门上匾刻“尚书里”三字，下匾刻林瀚为首的“三代五尚书”



林浦村尚书里石碑坊



尚书里石牌坊背面



“官保五尚书”和“七科八进士”

及父、祖（赠尚书）之名讳及官衔。两旁横匾刻“两朝宠命，累世翰林”八字。背面正中横匾刻“科第联芳”四字，下匾刻明、清两朝科举中举人之名讳及中举年份。“三代五尚书”指的是林瀚任吏部和兵部尚书，儿子林庭棉任工部尚书，儿子林庭机任礼部尚书，孙子林嫌任礼部尚书，孙子林烜任工部尚书。《明史》记载“明代三世五尚书，并得谥文，林氏一家而已”“林氏三世五尚书，皆内行修洁，为时所称”。

“七科八进士”是指从明代林鏐（林元美）开始，子林瀚，孙林庭棉、林庭机和同族兄弟、曾孙林炫、林嫌、林烜四代八人蝉联科第。此外，从林瀚及子林庭机到孙林嫌相继担任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明史称：“三世为祭酒，前所未有的。”留下“国师三祭酒”的佳话。

在“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国师三祭酒”中的领军人物林瀚，真真是个牛人。他仕

两京，历三朝（成化、弘治、正德），从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修撰至南京吏、兵二部尚书，一生担任诸多官职，“忧国忧民，时陈说论，直躬守道，绰有高风。”（明世宗朱厚璫发祭文赞词）就算被假传圣旨贬仕回乡，仍关心朝中政局和乡邦建设，撰写《福州欧阳公浚河记》《重修怀安县学记》《鳌峰胜观亭记》《建阳新迁庙学记》《福州重修贡院记》等文章，还主持编修《福州府志》第一部（史称正德庚辰版），后两部又由林瀚两位孙子林嫌、林烜主持修订。明代现存三部《福州府志》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福州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人文资料，其参修人员皆来自同一家族，修书长达近百年，实属不易。

狮山林瀚墓旁，有一整块切割迁至的摩崖石刻，为林瀚题记（高2.3米、宽1.6米，楷书，纵9行，字径12厘米），内容为：“大明正德十三年戊寅三月初八日丁未，本里致仕尚书林



林瀚墓旁的摩崖石刻

瀚率诸子：云南参政庭棉，福州指挥庭楷，长孙礼部主事炫。拜扫樟山祖莹墓归，停车于此，同看农家老稚力田插秧，叹曰：稼穡艰难，有如此哉！尔曹不可不知，谨识以示来裔。”这又是一个乡人盛赞的“三世一堂”故事。林瀚次子林庭棉为云南左参政时，正德九年（1514）因为老父亲年老体衰，饮食起居需要人照顾，上书请求回到老家侍奉。当时林庭棉的儿子林炫，已经顺利考中进士，被授官为礼部主事，也跟着上书请求回到老家照顾爷爷。一家三代人，全部都考中进士，在朝廷当官，成为当地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世代读书人和为官者奉为精神绝学的追求。对“三代五尚书”而言，这种信仰蕴藏在他们忠心进谏、实心用事、不屈服于权贵之下的品性中。林瀚在南京做官期间，对于那些因得罪宦官刘瑾而被贬的文武官员，表现

出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得罪了刘瑾，被迫提前告老还乡。其次子林庭棉为工部右侍郎时，应诏向嘉靖皇帝上书，表示近段时间，郊坛正在大规模营建，南城、西苑等处也相继大兴土木，这些工程都太过于劳民伤财了，请求陛下勤俭节约，为天下做出表率。其幼子林庭机更甚，他嘉靖十四年（1535）考中进士入翰林时的住所与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严嵩相邻，翰林院的很多学士

都争先跑去同严嵩攀交情，林庭机却从不主动同严嵩往来。有人就此询问他，他便表示：“人各各有能，有不能，趋时干进非我所能也！”明朝史学家康大和与林庭机是同年进士，都为严嵩所忌，故二人十分投契。在学馆时他曾书写“学林”二字于壁上，寓意敬仰林庭机。他还常说：“庭机吾所不及也。”林庭机长子林嫌为官时，张居正（《濂江林氏家谱》说是严世藩）当权，设宴请林嫌，他不去。张居正的父亲丧事，有人劝他写文拜祭，他说：“过去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我反对他，而他死于地下了，我要去奉承他吗？”林庭机次子林烜任太平府（现安徽当涂县）知府时，朝廷内阁重臣张居正回乡路过太平府，有官员劝林烜准备厚礼去好好迎接，林烜十分生气地表示：“要我搜刮民脂民膏巴结权贵，做不到！”就以一般的标准接待，后来两次入京，也都没有去问候张居正。林瀚父子孙三代的直节劲气由此可见一斑，并一脉相承。

一张与加德纳家族有关的明信片

吴新友

岭有关，还是决意买回来学习研究。

得来全不费工夫

一天晚上，我在翻看《中国鼓岭邮史研究》时，被书中一张张鼓岭封片吸引住。这些封片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大多已褪色发黄，但是上面的邮票、邮戳、收（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等信息组合在一起，却像一件件年代久远的艺术品。我不禁感叹，如果能收藏几张这样的封片就好了！

随后，我打开国内某知名旧书网，在地址导航栏输入“鼓岭明信片”，耐心地浏览网页内容。突然，我看到了一张鼓山明信片。明信片图下方注明：清末老明信片，福州鼓山涌泉寺鸟瞰图，贴清蟠龙1分票，销福建鼓岭1906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邮戳。翻看下一页，发现明信片另一面贴着一张销有鼓岭邮戳的1分蟠龙票，这张票上的邮戳非常完整，字迹也非常清晰。虽然对邮票是否后贴持有怀疑，但价格适宜，又和鼓山、鼓

鉴赏与疑问

7月8日下午收到了鼓山明信片。快递来自广东某三线城市，明信片装在护邮袋里，护邮袋左上角贴有一张印有“大清明信片福建实寄英国”的标签，明信片尺寸138×88毫米，右上角英文标注“Birdseye View of KuShan Monastery”（鼓山寺庙鸟瞰）。与网络上可确定拍摄于1929年的鼓山涌泉寺图片对比，这张明信片中山上的植被明显稀疏，岩石暴露，树木也显得矮小。同时，我也向专门收集清代福州明信片的邮友请教，均指认该明信片为20世纪初期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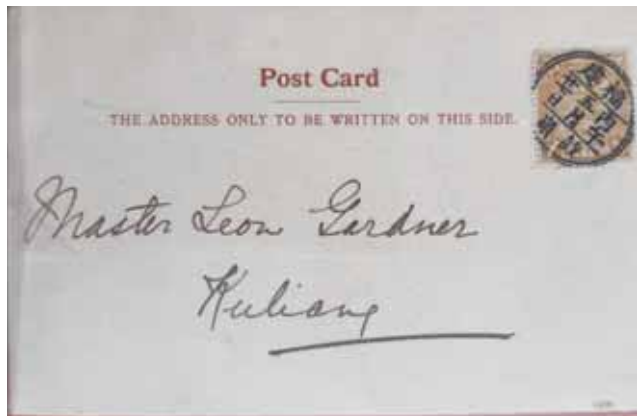
明信片正面格式简单明了。在Post Card下印有“THE ADDRESS ONLY TO BE WRITTEN ON THIS SIDE”（地址只能写在此面）。下面是手写的具



明信片正面为鼓山涌泉寺鸟瞰图

有艺术装饰性的圆体英文，第一行为“Master Leon Gardner”，第二行为“Kuliang”。手写英文笔画收放自如，劲健有力，非常规范老到，起笔和收笔与中国书法一样，都具有藏锋内敛的特点。我一开始将“Master Leon Gardner”译成莱昂·加德纳校长，以为莱昂·加德纳就是老加德纳，但翻阅《中国鼓岭邮史研究》发现莱昂·加德纳是老加德纳的第二个儿子。如果确如邮戳载明该英文是1906年所写，莱昂·加德纳此时应该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显然，将这一年龄段的人称作校长、大师、先生、硕士都对不上号。通过进一步了解 Master 用法得知，英语中有将年龄还不足被称为“先生”的少年敬称为“Master”的用法，大致对应于中文中的“少爷”或“王子”的称谓。这样看来，圆体英文书法和使用莱昂·加德纳的称谓一定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才能臻此境界，非一般常人所能及。

有点集邮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明信片右上角贴有鼓岭邮戳的邮票是从别的封片上移植过来



明信片背面

的，但是邮戳非常完整，字迹非常清晰。其上的邮戳是1904—1906年期间使用的干支纪年双圈三格式全中文鼓岭戳，直径25毫米，上格为“福建”，中排为竖排“丙午年五月廿七日”，下格为“鼓岭”。我又查阅相关资料，找到了两枚同为丙午年的干支纪年双圈三格式全中文鼓岭戳。很明显，除了邮戳是死戳，让人一眼看出疑点外，仅从明信片上无收信人详细地址这一点就能看出这不是一张实寄明信片。

但这张明信片的制作一定是一位对福州、鼓山、涌泉寺、百年前鼓岭历史和加德纳家族非常了解的人。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制作这样一张明信片呢？

制片动机

实寄封是指经过真实邮递的信封，即经过邮政传递系统，从一地寄往另一地的信封。实寄封汇集了封、票、戳、收（寄）信人信息等邮政

信息，在集邮活动中具有较高的价值。但遗憾的是，无论中外，早期的集邮者都注重对邮票的收集而忽视了实寄封的价值。实寄封的价值是随着集邮活动的深入而逐渐被人认识的。

如果这张明信片是后期制作的，戳票从其他地方移贴，势必破坏原本的价值。对于一个对福州、鼓山、涌泉寺、鼓岭历史和加德纳家族非常了解的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有违历史的真实。如果是邮商或集邮爱好者所为，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

也有的邮友认为这个邮戳是假戳，是作伪者制作了一个假邮戳，盖在了一张未使用过的蟠龙票上后再贴在明信片上形成的。如是这样，这个作伪者为什么不将邮票直接贴在明信片上再用假戳直接销票，让这张明信片看上去更像一张实寄片呢？！

一个大胆推测

近日再读《中国鼓岭邮史研究》，陈苏老师撰写的《一件见证历史，传播友谊的邮品》及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的钟翰撰写的《啊，鼓岭》，其中都提到了密尔顿·加德纳幼年时期用11枚清代中国邮票制成的集邮贴片来纪念儿时家园鼓岭的故事。

我观察发现，这个贴片由11张密尔顿·加德纳生活在中国时期发行的、盖有鼓岭邮戳的邮票和一张当时中国人生活场景的图片组成。这张



密尔顿·加德纳清代中国邮票贴片

贴片所呈现的形态表达了密尔顿·加德纳回到美国以后对曾经生活过的中国、鼓岭的眷念和热爱之情。我手上的这张明信片由鼓山涌泉寺风景、鼓岭邮戳和莱昂·加德纳的签名这些要素组成。明信片和贴片相对照，无论是形式还是要素，两者都何其相似啊！

密尔顿·加德纳自1911年离开中国以后，一直惦念着幼年时期生活过的福州鼓岭，他的父母和兄弟们也一定会想念他们曾经的家园。我大胆推测这张明信片是老加德纳用保存的鼓山明信片贴上最好的鼓岭戳票，在其上写下“Master Leon Gardner”和“Kuliang”，将之作为礼物送给儿子莱昂·加德纳。如果这确实是莱昂·加德纳生前保存的鼓山（岭）明信片，本文所提及的各种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协大”旧楼话往事

陈建中

在闽江南岸，江南桥（现称解放大桥）头向东有一条两侧背山临水的观井路，这就是近代福州有名的金融一条街。我涉世以来，见到的仅有观井邮电局、大新百货、新华书店等，这几个铺子又使这条街成为当时仓山区最热闹的地方。在观井路29号弄，异域风格的80多级宽阔的石阶直通烟台山上的一座洋楼，这就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以下简称“协大”）旧址、省文保单位。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在此生活工作过。

幼时我就读的天安小学（二部）就在烟台山上，那是每天早会上老师宣讲越战新书《南方来信》的年代。校门口往东走几十步即可见到这座洋楼，当时是某药厂用房，破破烂烂，四处是搭建物，晾晒着大小不一的裤衩。但见楼旁有四棵数百年的参天古榕，心里猛地想到，榕荫蔽日下藏着的洋楼，也一定藏着古树一般深远的故事。该楼始建于清咸丰十年（1860），为两层砖木结

构，平面为正方形，边长24米，立面宽7间，为典型的殖民地式外廊建筑，典型的券廊立面。洋楼出租他用时，屋顶等处都经过改造，屋顶有出檐和翘起的翼角，还有壁炉的烟囱。一个半世纪中，洋楼的功用几经变化，可考证的俄商茶行等若干洋行，还有青年会、协大、美丰银行和福州制药厂等几个单位皆使用过。

清宣统三年（1910），福州市基督教“三公会”根据爱丁堡传教士大会“在世界各大战略中心建立大学”的决议，在福州开始筹办协大。每年由四个差会提供开办经费，英华书院的教师庄才伟为首任校长。从俄商手中租用的这座洋楼作为学生的宿舍、教室、办公室和餐厅。从福州英华、格致、三一等校招来81名学生，专职教师5人、兼职教师4人，只开设英文、哲学、国文、社科、生物等课程。1916年协大正式开课，翌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承认协大为合格大学。接着协大在马尾镇魁岐乡新建校园，聘请曾经为燕京大



福建协和大学旧址

学设计校园的建筑师穆菲做建筑设计。1922年春，占地千亩的校园里数十座建筑群矗立于闽江北岸。在海外基金会捐助和省政府的补助下，协大已发展为拥有三院（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十四系（中文系、外文系、数学系等），在当时的中国东南地区很有实力的教会大学。

叶圣陶（1894—1988），苏州人，从事出版、教育，承担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曾任民进中央主席、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小时候，我爷爷曾让我读旧国文课本中《古代英雄的石像》的童话，还对我说，用石像破碎后的小石块铺路，才是石块最有意义的生活。那时我好像晓得童话作者是叶圣陶。初中时，我订阅了叶圣陶参与主编的《中学生》杂志，此时的我进一步

“初识”了叶先生。1923年1月叶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任国文编辑，9月获得书馆准假半年。在这期间，叶圣陶应当时担任协大文史学系教授、系主任的好友郭绍虞的邀请，前来协大执教新文学，与郭绍虞共事。在这期间，叶先生就住在观井路这座洋楼里，每天早出晚归往返于烟台山和魁岐校区之间。

仓山区虽不是租界，但这里有17国领事馆。当时观井路东段的大岭顶尚未贯通马路，西段还是石板小道，没有车马的喧闹。叶先生在住处抬眼可远望城北屏山上的镇海楼，低头可静听江南桥下潮涨潮退的哗哗声。闲暇时他也一定会到附近的英国领事馆、乐群楼或石厝教堂等处走一走。一走就走出了他对烟台山的感受，于是写

下了“仓前山差不多是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礼拜堂里送出一声钟响，绿荫下走过几个张着花纸伞的女郎”的佳句，足见当时叶先生的心情有多么美好。

叶先生上班乘船半小时便到达魁岐协大码头，然后与师生们相继登阶步入校园。校园背倚鼓山，面瞰闽江，山光水色，美不胜收。岸边山坡上具有中西合璧的“西装加瓜皮帽”风格的建筑群，成为闽江口的一道风景，协大被誉为当时全国风景最美的七所大学之一。叶先生在他的散文《客语》中对此地作了描述：“向来不曾亲近江山的，到此却觉得趣味丰富极了。书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场，闲闲地流着闽江。彼岸的山绵延重叠，有时露出青翠的新妆，有时披上轻薄的雾，有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好些云，却与山通起家来，于是更见得那些山郁郁然有奇观了。”接着叶先生不忘提到草场上几十头羊和十头牛的放牧情景，因为他每天都喝着它们又白又浓又香的乳汁，以为是上天的恩惠。叶先生在另一篇散文《转过头来》中也有相近的描绘：“望那隔江的群山还把头埋在白云的被里，山腰以下没有遮掩，承着阳光，显出鲜明的绿意。楼下的场上直到江边，阴阴而愈见静寂，原来连山把东方的初阳挡住了……江水又低又平，似乎横铺着一条白蜡。”想象一下吧，29岁的叶先生当时正站在协大的高地上，踌躇满志，张开双臂，仰起脸，深深地感受着来自马尾港的天风海涛。

近代仓山区的兴盛，是闽人接纳蓝色文明的历史见证。协大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也是东西文化“协和”的成果。协大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所设课程中，除了引进生物、化学、数学、物理学等现代自然学科外，中国文学系等就开设有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文学史、经学研究，以及福建地方的文学史、民间文学、文献研究等科目。协大第一任国文教师是陈海鳌先生，他是当时福州颇负盛名的经学家。也聘请诸如郭绍虞、叶圣陶、严叔夏、傅家麟等名家教授来校执教本土文化。协大十分重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组织学生参与乡村建设。学生成立有国语研究会、福建文化研究会、国术社，以及各种经济、科技社团等。叶先生曾详细记录下了学生们的一场精彩篮球赛，称：“他们就是力！他们就是活动！”体现协大的勃勃生机。

1951年1月协大与华南女院合并为旧福州大学（福建师大前身）。经历过三个“朝代”的协大，实际办学35年，毕业生1300多人，培养了许多出类拔萃的人才，除了提供大量社科方面的人才外，科技方面的郑作新、唐仲璋、黄维垣、林兰英等人都是中科院院士。

岁月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当我们回到烟台山上，望着协大旧洋楼墙上的文保介绍牌，内心的感慨不由自主，觉得牌上除了叶圣陶一人名字外，还应该记上更多的“协大人”的姓名。

在龙峰河湾里

张 茜

龙峰河缓缓流淌，在这儿转了一个弯，推开高楼丛林，展露出两座瑰丽建筑——龙峰泰山庙、张氏家庙——翘角向天，粉墙接地，彩绘斑斓。

这两座庙宇，犹如两棵大树，牵系着华夏张姓氏族的一根枝丫——福州清河张。

清河在河北，为“百家姓”之一张氏发源地。从黄帝孙子挥开始立宗，已有数千年历史。这一支张姓从北到南抵达福州，与王审知入闽有关。史书记载表明，彼时有河南固始人张姓军校张睦随从闽王前来，因战绩显著受封梁国公。这份荣耀宛若一颗星，照耀在世代福州清河张的头顶上：清河绵世泽，固始振家声。

张睦军校来到福州，随部队扎营于上街，至908年住进仙塔街凤池坊官邸。因而福建各地的张睦后人，均以“凤池”为堂号，俗称凤池张。张睦的二子张鹰、三子张庚又相继迁徙永泰月洲，后人考出了永泰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第七世至第九世更涌现父子6人六登科、祖孙三辈18条官带的高光时辰。月洲由此成为张睦脉系的名穴胜地，俗称“月洲发祥”。殊不知，获得如

此辉煌的科举成绩，月洲张氏是狠下了一番功夫的。单说明朝，省科试举人考场设于城内屏山，为便于家族学子复习考试，张氏就在考场附近的屏山东南麓，建造房屋，乃至筑起一座宏伟壮观的泰山庙。

到了清康熙年间，张睦二子张鹰后代张继卿索性举家迁来，落户考场和泰山庙旁。详细地址为侯官县三十八都八座乡观风里司徒境，也就是现今屏山东麓龙峰河畔龙峰新村片区。之所以那时叫司徒境，是因为居住着一位大官——户部尚书，即大司徒。这个片区紧紧依偎屏山。屏山也称越王山，彼时为福州城北屏障，山巅筑有镇海楼，山下一马平川，为河网湿地夹田畴。从此，清河张、凤池张、月洲张，才有了龙峰张氏。其实说是村子，却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之后的龙峰村基本由张氏繁衍而出。

龙峰张氏继续着科考奋斗之路。也许只是字意巧合，到了这里的家字辈、国字辈，又进入了一个巅峰，人称“四家十一国”“家国盛世”。人丁兴旺，仕途发达，八座三进大厝，挂满进士、文魁、武魁牌匾，令福州谚语盛传至今：“红



龙峰泰山庙 张晓敏 / 摄



张氏家庙 张晓敏 / 摄

墙山头角，文魁武魁中不辍。”龙峰又称山头角。

光阴从唐朝跋涉至清朝，1000 多年过去。

关于龙峰张氏武魁，入闽先祖梁国公声誉一直奉为祖训，是砥砺前行的阵阵鼓声。守着北边进城要道，平日治安环境颇为复杂，琅琅书声溢满座座大厝，安全防卫尤其重要。他们毕竟是军人后代，几经操练琢磨，以实战赢得“拳头绣”殊荣。由此开起武馆，一间一间，连锁城内。各大戏院、茶楼及消费场所，所请保安，皆为龙峰张氏族。一家一家张氏人，血亲连血亲，适合习武的少年交给村子武馆，由善于传授的教头带领。亲不见怪，孩子们顽皮，教头手持竹条子，打了骂了，各家大人还说教训得好。如此这般，一代一代，后浪推前浪，诞生接二连三的武状元。一幅幅镏金牌匾高高张挂门庭之上，里程碑般激励着后人。

村子“拳头绣”扬名在外，读书的孩子们

似乎比着劲儿苦读，陆续夺得大小功名。父子两进士，兄弟三人皆中举，成为族人握拳击掌的骄傲。但也有满腹诗书考不中者，村人称其“屎肚金”，意思是屎肚里装满金子。时间大概在清代中下叶，“屎肚金”名叫张长光，出身名门，祖父、父亲皆为进士。他也读书刻苦，成绩一流，一手好字，却不幸得了晕场病。一进考场便脑袋犯晕，考举人三次没中，痛定思痛后转身办起村子私塾，教出的学生很争气，个个都像样。有样学样，龙峰村那会儿有三个社，其余两社也陆续兴办私塾，学风颇盛。村口专门设有惜字炉，全村男女老少，但凡看见有字废纸，必敬畏捡起，存放进惜字炉，定期举行仪式焚烧。这在福州郊野乡村，传为佳话。至今人们说起，依旧肃然起敬。

守着北边进城要道，龙峰张氏因地制宜，设有“歇脚牛市”“永泰酒库”。每年腊月里，从北边赶来的连江、罗源等地牛贩子，下北峰，过新

店，来到井楼门外龙峰村，需要歇脚休整。人、牛各自住店，洗去旅尘，加上补给，焕然一新再进城，前去目的地城门屠宰市场。“永泰酒库”伴随而生，生产青红酒出名。这厢要开酒坊，必定打上故乡商标，赓续乡情和商情。

不管经商还是尚武，村人最崇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民国时期，村旁屏山之巅要盖“林森纪念堂”，请了张氏昌埜先生做监工。工地当中有座白玉蟾白仙宫庙。这昌埜先生出自书香门第，自幼爱诗，便默不作声地抱了白玉蟾塑像，安置于自家主厅。之后凡是家里孩子读书懒惰，长辈不打也不骂，便领了孩子来到白玉蟾塑像前，说白先生看着你读书呢，今天不乖，罚你钻桌子。孩子们乖乖弯腰钻到八仙桌下，转上三圈方可出来，日后读书写字真是用功起来。这个方法传遍全村，便有了而今的百年张氏家庙。

2024年春，我慕名前去拜访，庙中端坐着82岁的张氏后人福如先生。他身板硬朗，双目炯炯，谈吐自如，泡茶倒水接待村人。乡亲们围坐一堂，品茗聊天，云淡风清。主厅里白玉蟾塑像依然高坐，张氏祖宗牌位我寻了几圈才发现供奉在一个窄窄夹道里，福如先生称是弄堂。白玉蟾须髯飘飘，门外河畔大榕树与之相对，也是须髯飘飘。微风里，日影下，我轻声念出：“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水浅笼沙。”这是《千家诗》中的白玉蟾诗歌，近旁白墙上配有一首福如先生诗作：“人生八十不算老，悠然自在示阴阳。一杯清茶半日

闲，余生安暖夕阳好。”

福如先生理工科出身，却能有感作诗，完全出自白玉蟾诗歌熏陶。

少年时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很幸运地长在红旗下。农家孩子晴耕雨读，放学回家从新店到龙峰，一路田野开阔，水道密布，鹭鸟翔飞。福如心中想着诗句，弯腰捡拾稻穗，愉快地走完几里路。进门递给母亲几扎稻穗，染着炊烟的母亲就笑了，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儿子的骄傲也油然而生。家族传下女干活男读书规矩，二姐早饭后去八里外的猫头山后砍柴火，福如快速吃饱饭，带上饭团、拿起扁担和绳子，赶在下午上课前接回二姐。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能匀开二姐柴担，挑回六七十斤的硬柴，如今他说起这事儿，眼中闪着灿灿亮光。当然也会想起不做作业，被母亲领到白玉蟾先生前钻桌子的糗事。周末时村中男孩结伴，就近登上屏山弄些轻柴燃火。山上种满果树，荔枝、龙眼、阳桃、枇杷、黄皮果，丰饶美丽，蓊郁阴凉。鸟雀穿梭枝间，啁啾鸣唱，使寂静更加寂静，宛若仙境宫阙。

龙峰八座三进大厝以及后增的一些小厝，厝厝相连成村庄，厝外田畴阡陌，河浦地肥沃。肥沃间暗藏泥流，也就是沼泽，孩子们成长路上，耳旁日日萦绕父母警示。贪嘴的黄牛却不知不觉陷入其中，越是挣扎陷入越深。牲畜性灵，便不再动弹，嗷嗷叫急，声音万般绝望，眼角流下泪水。村人闻讯拥上长形木板、绳索奔去，将木板逐块铺在沼泽上，围住牛，抄绳轻脚过去套住牛



百年前老家三落厝

身。一人拖牛绳，一人托牛肚，一人推牛尾，用力但不能过猛，缓缓救出牛儿，人畜汗水淋漓，瘫软在地。

河浦地肥沃疏松，龙峰地瓜苗驰誉闽地。其实龙峰人育出优质地瓜苗，也来自因地制宜。河浦地水系如织，容易水涝。遇到洪灾年，田里庄稼歉收，地瓜便是充饥粮。退水后的冲积沙洲，油汪疏松，插下一截地瓜藤，便蓬勃生长。结出的大地瓜，肥硕滚圆，皮儿粉红，瓤肉沙甜，帮助村人渡过难关。水土有灵，经验积累，龙峰地瓜苗脱颖而出变为名牌商品。每年春夏之交，购苗商蜂拥而至。碧绿的苗叶，水红的嫩根，一扎一扎湿稻草捆了，装满筐子、袋子，带着喜悦奔赴各地，生根发芽结果。

水涝倘若发生在稻穗灌浆前，对收成妨碍倒不大。几阵大暴雨过后，条条水道与稻田连成汪洋，禾苗只露头梢，摇摇晃晃。鲤鱼、草鱼、鲢鱼、青鱼，还有从海里游来的鲈鱼，统统冲向水流平稳的稻田，慌乱地游弋、翻滚、跳跃，村里大人小孩手拿水桶、畚箕、鱼篓，抢收般跑向田

野。洪水歉意似的，渐退渐去。鱼儿惊慌失措，在人小腿上撞来撞去。人们兴奋地喊叫着，捡拾着。暮色里，暖黄的灯泡下，各家都有成盆、成桶的鱼，主妇们激动得满脸通红，手脚格外麻利。取出存放的鲜红酒糟，糟鱼入缸，慢慢儿吃。翌日清晨，洪水没了踪影，人们赶向自家稻田，像再次插秧般一棵棵扶正歪倒的禾苗。重新站起的禾苗，迎着阳光，灌满浆汁，来个沉甸甸的丰收。

河水复回缓流，静静地撑起一片片竹条编网，养育水雍菜（水培空心菜）。也养菱角，但无须搭网。龙峰河从莲花山、猫头山出发，过新店溪、湖前溪、长安河、护城河到龙峰村，本是林间活水，再经一路净化，水质清澈甘甜。生产的水雍菜、菱角品质极佳，一挑到井楼门菜市场，就被抢购一空。

……

斜阳挤进木窗格，跳跃在茶盘上。福如先生顿了顿，起身带我去泰山庙，不远，百米之遥。庙宇走来，却400年。墙上水墨壁画也400年。福建十府两州城隍栩栩如生，面容或平和，或微笑，各自执牌管辖福州府、台湾府、漳州府、延平府、邵武府、福宁府、兴化府、泉州府、建宁府、汀州府、龙岩州、永春州。老先生手指“台湾府”，眼含泪花，久久不语。回头凝视院中六角思乡亭，缓缓道出：该回来了，这是“清河张”龙峰张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去台湾的乡亲所建，那儿滞留着200多号人呢。

藏了二十年的宗祠

大 雄

3月的青口，真就如被春天“亲了一口”，暖暖的阳光下，满眼满心的绿意。

宏屿“面金奎拥石鼓”，坐落在金奎山和石鼓山下。这里地势很特别，从山脚，以十几二十厘米的高度平缓向下，这就使得山上的溪水和雨水，能够慢慢地往下流，浸润土地。在农耕时代，这是得天独厚的天然灌溉系统，加上水质又好，这里的人们百年前就开始选择种菜的活计，所种的白菜、瓠瓜和芋头尤其出名。据说，当年马尾设置通商口岸，摘下的第一批瓠瓜要被送到外国领事馆。

20世纪80年代，这里成为福州市主要蔬菜生产基地，每年供应各种蔬菜三四千吨，特别是春节期间，每天上市量都在千吨左右，可以说是福州市的“菜园子”。

这一切已成为往事。如今“菜园子”早已变成了“汽车城”。1995年，东南汽车公司坐落

于此，是迄今为止经国家正式批准成立的最大的海峡两岸合资汽车企业。福建奔驰汽车有限公司2007年也坐落于此，标志着福建汽车工业从闽台合作成功走向了国际合作。

说起来真是传奇，一个村里有两家“巨无霸”汽车公司。“村”就变成了“城”。不仅厂



吴氏宗祠 郑天强供图

区内，路边也停满了新车，每到上下班高峰期，这里车来人往，经常堵车，村民开车上下班已不稀奇。当年的菜农现在纷纷变成工人。村民富裕了，村里每家每户五六层高的房子已很平常，最高的有11层，用上了电梯。

“宏屿”也消失了。1989年，宏屿自然村分划为行政村设置，成为宏一、宏二、宏三、宏四、吉山、后福六个建制村。虽说“分家”，但村民通常还是说自己是宏屿人。

如何分得开呢？他们都是吴氏子孙，共有一个祖先，共拥一座宗祠。

宏山吴氏宗祠始建于明朝，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建，民国元年（1912）重修。宗祠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祠堂坐北朝南，前后二进，厅堂面阔三间，内有戏台、天井、大堂厅、后厅楼，神龛等。正面大门上方石匾阴刻“宏山吴氏宗祠”六字，正面柱题楹联“临濂水镇宏山二气效灵钟大地，面金奎拥石鼓双峰挺秀拱华

堂”，均系明代首辅叶向高题写。1995年1月，它被闽侯县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堂厅摆列三四十把躺椅，有几位老人正在休息或看电视。墙上贴有闽剧演出安排表。看得出，这里已经成为老人们的文娛休闲场所。

初看宗祠，无特别之处，但若细察，你会惊叹，这是一座保存尚好葆有艺术气质的宗祠。

戏台上的藻井为多层圆盘形的木质叠砌，雕镂技艺精细，中层夹饰有16组（面）以《三国演义》等历史人物为内容的环形嵌雕。酒楼两侧栏杆雕饰着“二十四孝”的人物图案，皆是文明劝世、国学家风的经典故事。大厅背堂门屏八扇，阴刻着清道光壬辰科（1832）状元吴钟骏的楷书《朱柏庐治家格言》，书法端庄遒劲，艺术价值颇高。

殿堂公祭桌后的神龛更是讲究，雕刻尤为精湛，摆件陈设精巧，构思巧夺天工。在注重大气势的同时，采用调动微小饰件和摆件陈设的精巧手法，使之疏密错落，变化有致，寓婀娜于刚健，挟流丽于端庄。其雕刻内容以民间喜闻乐见的神话、传说、故事、杂宝、花卉为题材，大者如繁缛精致的盘龙舞凤，小者如形态奇异的虾米蚶仔，集上百个人物形象，形态兼备，栩栩如生。

“木有根，水有源，人有祖宗，理无殊也。木有枝，水有流，人有子孙，理亦无殊也。”令人称奇的是，宏山吴氏家族数百年的源流历程还被镌刻在神龛两侧，400多个楷字，情文兼备。

整个神龛高3.9米，宽3.2米，由黄杨木、



宋祠内神龛 郑天强供图

花梨木、杉木为材质，木雕均饰以金箔，给人以富丽堂皇之感，让人误判金属所制。有专家评价，此神龛是不可多得的民间艺术瑰宝，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观赏价值。据当地人讲，当年神龛是聘请莆田三位雕刻高手，闭门三年专心而作。

宗祠的精美能够保存至今，令人大感意外。它是如何逃过那个特殊岁月的劫难的呢？老吴揭开了一段往事。

老吴名叫吴炳华，67岁，曾经是宏屿村总支书，退休后成为宗祠的管理人，已经8年。他说，1964年，村民担心宗祠被破坏，也不知当时是哪个人做出决定，偷偷地将神龛、门屏等可以被拆卸的都拆下，封藏在阁楼。这一藏就是20多年，直到1988年，当时他是宏屿村总支书，听闻有人偷窃那些封藏的“宝贝”，两扇围屏及附叠栏已经不见，他心中焦急。藏着并不安全，在众人眼皮底下才最安全，他觉得是时候把先祖留下的宗祠及其文化恢复原貌了！终于，在暗黑的阁楼沉睡24年的一件件雕刻、书画、屏栏等重见天日。被盗走的两扇围屏及附叠栏，也找人修复替代。虽然从雕刻水准与艺术感觉来讲，比古旧的实物还是差距明显，但终究是完整了。

宏山吴氏宗祠完整了，祭祀的传统文化也完整了，村民的心也完整了！

据悉，宏山吴氏祖先可追溯至唐屯田员外郎吴祭。吴祭，字孝先，由河南光州固始县青云乡铁井兜随王审知入闽。据唐天祐四年（907）吴氏族谱记载：其祖吴祭，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兄

弟一行二十余人住福州侯官县（今福州后街）。历经分枝辗转，赴北征南，始祖吴天佑为莆阳壶山元益公的九世裔孙，明正德三年（1508）举家自福清玉塘乡迁居闽县七里还珠里的宏屿与沪屿之间千家山吴头桥畔，不久移居宏屿上道头。

祠堂大厅两侧悬挂着六位始祖像。宗祠还有明代丞相林有我题写的楹联，也有吴氏宗亲、清道光壬辰科状元吴钟骏祭祖时留下的对联，还有清道光年间福州知府王绍兰的一段佳话：少年学业时曾得到吴氏赴浙经商乡贤资助，有缘拜吴明通为义父；嘉庆年间，王绍兰特在祠内撰有一联：“瀨水肇新基堂构不忘前代泽，石塘留旧迹蒸尝犹动故乡情。”这些文人轶事提升了吴氏宗祠的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

那天下午，憨厚、热心的老吴还带着我寻访了宏屿的“一井半桥”。它们都是闽侯县重点保护文物。宋古井藏于深巷的一个角落，直径约1米，瓜棱形井栏，井盖由两块半圆石板拼成，中间有两圆孔用以提水。井水现今仍在被使用，井旁设提水的罐子、绳子。宋古桥，目前只剩下三截石板架在一条内河上，不再使用，只能勉强称为“半座桥”。老吴说，桥原址并不在此，因为汽车城工程建设需要，经批准把桥面的石条与底座的石块一同搬到此处。

春天的暖阳，微微的暖风，那天，我们仿佛在一段过去的历史中辗转了一回，打捞起往事。蓦然从时间的迷藏中钻出，惊奇地看到村头巷尾，人们在悠闲地享受生活的宁静，真好。

林家村，穿越时空的旗杆林

郑秀杰

18 对旗杆碣蔚为壮观地挺立在林家村祠堂前的空埕上，因机缘巧合而聚杆成林。一个崇文尚武的家族，在异常艰难的封建社会科考路上，吹响集结号，使得村庄在短短的几百年间就涌现出一大批文武才俊，成为村人心中莫大的骄傲。让这些功成名就的学子们，以树立旗杆碣的方式集体荣耀登场，也算是朝廷为一个家族乃至个人颁发了最高的荣誉。

旗杆碣从集结展示的那天起，就垒砌了一个家族的历史文化厚度。它们在此后的几百年风雨中，仍然风采依旧，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们仿佛穿越时空隧道，每天在村口与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对话：曾经的这些主人们到底有过怎样的辉

煌人生？

位于罗源县西北部河洋溪畔的林家村，东西连接宁德市金涵镇、古田县大甲乡，地处宁、古、罗三市、县的交界处。林家村庄的岸边，有一条清澈的溪河缓缓地流过，溪水注入百丈水库再飞泻龙潭，然后经由宁德金涵扭头直奔东海。

据林家村林氏族谱记载，林家祖先源出莆田八角井，乃闽林十七世九牧迈公后裔。始祖十公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由宁德白鹤钓鱼岭迁入罗源新丰里河阳井垄头。明洪武四年（1371），移居杨家墩（即现在的林家村），至今历时 936 载。旧称丰上里后山境或阳溪境杨家墩，先祖扎根这块风水宝地，林氏家族开枝散



叶，现在已繁衍 31 代，十世同堂，3000 多人，部分后裔分迁至宁德、连江、建宁等地，人口逾万。

据村民介绍，在耕读传家祖训倡导下，林家家族在明、清两朝曾考中十八举人两进士，诰封仕宦以及解元、拔贡、秀才等有 230 人之多，享有“三子十孙一门九顶戴”“乡试会试罗川第一名”的美誉。其中，授任官职的，明代有乌程县丞林灯、河南道参军林日荣，清代有廉州知府林长存、武解元林光继、荆门州知州林芝华等历史名贤。

为林家村这些乡贤树立的旗杆碣，团结了族人，勉励了后辈。它们虽是旧时科举制度下的产物，却也彰显了林家家族几百年来至高的荣耀。

如今，林家村里的 18 对旗杆碣，已被列为省级第八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福州地区保存最为完整、杆碣数量最多的一个景点。如此整齐生动的旗杆碣，比之今日各地的高考贺匾更令人震撼。随着清末科举的废止，这些科第世家的旗杆碣，已成绝世孤品。

在我国古代，体现科举功名成就的主要形式就是树立旗杆碣。依照当时规定，中举者，可根据名次级别的不同，得到中央、府、州所赐的一杆旗，高中者扛回家乡光宗耀祖。家乡的族人从飞马来报的差卒口中得到消息后，就要立即请来石匠打好花岗岩基座，以木柱或竖立于祠堂、祖居，或竖立于府第前埕，顶上挂旗帜，向人们炫耀科第和仕途的荣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家



林家祠堂

村旗杆碣上那些彩旗早已不见踪影，木制旗杆也腐烂了，唯有花岗岩材质的石碣保留完好，而那些隐藏在旗杆林背后的故事，依然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据林家村乡贤林鼎城介绍，林家游子在异地为官，大多都能够清正廉洁、关心民众疾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尤以清代廉州知府林长存在当地任职时的斐然政绩，被后人歌颂至远。

林长存（1644—1683），字尚孩，号鹤龄，罗源中房林家人，他的故居就在林家村的阳溪边上，其后人如今还在这座二层木构建筑里起居生活。作为林家村林氏第 16 世孙的林长存，乃清顺治十七年（1660）举人，翌年登马世俊榜第十七名进士，授广东灵山知县。

灵山县历史悠久，隋开皇十八年（598）始置南宾县，唐贞元十年（794）易名灵山县，因



林家祖庙



祖庙前树立的旗杆碣

县治有西灵山（今称六峰山）而得名。灵山原属广东省，1965 年划入广西至今，现属钦州市。旧时的灵山地属边隅，兵燹之后，民众多离散。林长存上任后，立即清厘赋役，减免负担，同时召集流亡者垦田植桑、构筑城垣，动员乡贤捐资兴办学校。其任内三年，政声远播。他先是署任廉州府海防同知，后擢廉州同知，卒于任内。当地州民感念其德，于灵山立庙祀之。林长存博学多才，书法拔萃，曾主编康熙版《灵山县志》四卷，有《西灵呖语》《澹园诗集》等诗作传世。

清代顺治年间知县张翀，曾有文章形容钟灵毓秀的罗川山水曰：“鹤龄容藹若春晖，润比荆玉，英爽豪迈。”

据康熙《罗源县志》记载：1670 年暮春，“公至灵山，清厘赋役，召集流亡，缮城垣，筑桥梁，修学庠，课子弟。三年间，灵山以熙。署廉州海防兼理司马，适西孽震邻，公奉檄会师，遇

墟越境。而流亡百姓闻公督师，莫不襁负来归。西灵之地得公平定而安集之。会擢廉州同知。无何，公已不禄，灵人哀之，如丧考妣，至今立庙祀之。”

由此推断，面对穷山恶水、满目疮痍的地方现状，林长存一如众多初任的为官者一样，为改变现实，壮志雄心烧起了三把火：一是请愿朝廷，作为奉檄督师，平定山贼乱寇，还地方一个清明的政治环境；二是召集流亡百姓垦田植桑，发展地方经济，并从减轻民众赋役入手，营造一个繁荣开明的生活环境；三是筑城垣、办学校、修水利，致力于打造民生工程，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另据《灵山县志》记载：“康熙九年（1670）知县林长存，相继修复城楼 5 座、角楼 4 座、串楼 3 座、窝铺 24 间、炮台 18 个、雉堞 530 个、水关 1 穴。” 因此，康熙《罗源县志》修志者顾中

子对其赞曰：“余观《罗志》，历睹诸先生政绩，大者佐廊庙，次者泽里閭，操柄则一方倚庇，职教则多士响风，是诚得志泽加之所为也。可谓上不负君，下不负民，中不负所学者矣。后释褐从龙者，得先览是迹，而奋然以兴者乎！”

擅长书法、诗文的林长存，在各地还留下了许多墨迹。今天的广西图书馆就藏有清康熙十一年（1672）由林长存、王启辅主修的四卷本《灵山县志》胶卷。该志首引林长存原序云：“灵山，其士则美秀而文，其民则乔野而愿，虽在荒徼绝域，犹蒸蒸见文物之盛焉！后经战乱，遂致村墟市镇之地，半是绿林啸聚之场。”林氏受命来灵时，欲“考古镜今，典文凋落，搜罗记载，泯灭无闻”。

林长存曾著有两部诗集，今皆失传。康熙《罗源县志》艺文篇录有其诗三首。其中《灵山令邑人林长存粤中奉檄督师》云：“捧檄下岩疆，三章约法长。万藏胸中范，一殪釜鱼张。扞虱谈容易，飞鹰疾奋扬。铙歌马上曲，士女遍壶浆。”详细描写了奉檄督师时的那段峥嵘岁月以及他内心的政治抱负。

又如《又过线村百姓挈家来归赋诗以慰》：“万山深入最嵌崎，半壑寒烟异昔时。蛛网飞丝当户织，鹿场柔草傍篱梳。新丰鸡犬犹如旧，故里田庐更属谁。百堵共欢还定后，劬劳应绩哲人诗。”

诗人目睹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其内心安适在《秋江晚眺》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该诗云：“舟停晚照落红霞，字字题云雁印沙。秋



旗杆林

望一天腾雪浪，冷浸双眼入霜葭。鸥飞远渚回樯去，鹤傍孤帆落日斜。秋色暮烟山尽紫，悠悠绿水泛浮槎。”

林长存与连江马鼻名士陈元登交往甚密，因两人对诗歌有共同爱好，林长存以七律专辑《澹园诗集》寄送陈元登。元登曾写序篇，评价长存诗歌题材风格多样，能兼取各家，达到“清以幽、肆以廉、和以柔、雄以达”的美学境界。

今道光版《新修罗源县志》中残留有《澹园诗集》中的七律七首，其中《过九龙滩》诗曰：“峭壁嶙峋倚碧空，石门中断一溪通。洪涛怒卷千层雪，飞瀑光摇十丈虹。不信操舟如驶马，却疑破浪若乘风。波涛九折琼珠溅，似遣孤帆入蕊宫。”

林长存在任职广西灵山知县、廉州郡丞时，他的足迹留在了名山古刹，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文。其中，他拜访万寿寺时，品茗之后，且留诗曰：“岭接晴云暖磴苍，蓝舆迢递入微茫。鲸鲵萧寺钟犹远，鸾凤苏门啸正长。一坞浓柯罗贝阙，半岩修竹胜笄篁。客来七碗茶风发，不浸



林长存墓碑林

龙皮晚亦凉。”把休闲与隐逸的心态表露无遗。

林长存对乡民的疾苦也关爱有加。有一次回乡省亲，正好碰上林家村一带遭遇大旱灾，面对日渐枯萎的农作物和苦不堪言的村民，在族长的邀请下，他欣然应允和祈雨队伍一同前往百丈龙潭，为百丈龙抒写“门书”，使得百丈龙后来被朝廷诰封为“白项珍珠龙王”。传说，此后凡林家村附近一带若遭逢旱灾，只要村民有求，龙王因念旧情，皆极力布施雨水，深受百姓爱戴。

林长存死于任上，因其对地方的贡献，当地百姓长歌当哭，立庙祀之。落叶归根，林家村人把长存遗骨运回家乡后，葬于村里的过溪山西北半山腰。

抚摩着石碣上的岁月留痕，林家村昔日的鼎盛文风让人感慨万千。18对旗杆碣，大小不一，排列紧凑有序。每对旗杆碣的上部都凿有外圆内方孔，面上雕刻有龙凤吉祥等图案，其间刻有中举者姓名、官衔以及中举时间。至于旗杆的长

度、底座的样式和杆身的雕刻，都与中举者的级别高低和文武区别有关。这里最早的一对旗杆碣立于明朝万历四十年（1612），最小的一对，雕刻则最为精致，所立者官衔也最高。

流水千年不腐，风华绝代犹存。旗杆碣的后面，就是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林氏宗祠。祖厅始建于明洪武六年（1373），占地总面积1763平方米，建筑面积463平方米，分前、中、后三进，正厅高9.12米，宽13米，为明清风格的土木建筑。1999年，它被评为福州“十邑名祠”之一。走进林家祖厅，只见门廊两侧横挂有“举人”“进士”“文魁”“武魁”“拔贡”等牌匾数十面，还挂有1988年9月被中央军委、国务院授予上将警衔的林庚勤的简历。

如果说18对旗杆碣和林氏宗祠是百年科第的最好见证，那么村里那些保留完整的参军府、进士厅、解元厅、文昌阁、荣福宫以及29处宋、明、清时期的古民居建筑，无疑是林家人通过辛劳的双手孕育出的一颗颗闪亮珍珠，它们与村里颇有年代的龟石、雁石、龙心古井和500年怪树等景观一道，成为游子心中一幅幅最美的画卷。

今天，林家村依旧注重培养人才、净化风俗。这个历来崇文尚武的村庄，现在每年都出了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最为难得的是，村民们在走向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上，从来不曾忘了对自家文物的保护。今天，旗杆碣再次被插上了木杆、旗帜，这难得一见的古老文物在盛世中重新焕发光彩。

罗源湾说潮格

董山静

罗源位于福州市东北部，因其境内罗江流分三支、同出一源，故名罗源。东北鉴江半岛与东南连江黄岐半岛构成口小腹大的罗源湾。

据《潮格董氏家谱》记载，罗源湾的董氏始祖早在唐朝昭宗年间随王审知入闽，后来分支起步镇潮格村，现已发展到二十二世，全村 1600 多人，其中董姓 1300 人，占 80% 以上，其余还有倪、叶姓原住民。人们常说，潮格村有“三宝”：唐宋至明清时期古厝 20 多座，有儒学遗风；村内美食“尚书肉”，古法烹制，流传千载；“肩头坪”戏曲源于明代，列为县级首批“非遗”。

—

潮格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从潮格的地名可以推断，古时候这里是观测水位的地方。古代

把观测水位的标记称作水则，又名水志、水尺。通常每市尺为一则，又称为一划。因海水涨潮时会顺南、中、北溪流上溯，甚至进入罗源城内，故史上曾有“海在城中”之说。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地方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古代官府设置有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抓紧抢修，安排百姓转移。

随着海进海退，罗源潮格的水文遗址已无处可寻，但古人防患于未然的千年智慧已深深地刻在这个村庄的肌理里。



罗源潮格村董氏宗祠

二

据传，唐代吏部尚书倪振最先随罗源湾海潮至此定居。接着浮海而来的董氏先人，看到这里绿树成荫，人烟辐辏，于是舍舟登岸，择居是地，开创了罗源潮格董氏基业。“豢龙氏”也因罗源湾而兴旺发达。1000 多年来，居住在此的董氏家族，人才辈出，瓜瓞绵绵。

唐朝时期，潮格村是罗源最繁华的商品流通交易区。明朝诗人林元铸的《草桥夜市》写道：“桥头彻夜欢，嘈杂每盈耳。才歇管弦声，书声又四起。”在宋代，潮格倪氏考中进士的就有 18 人之多，造就了众多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村中有 20 多座唐末至清代的民居，保留至今。

数量最多、建造最为精美的，当属村中董氏一门 12 个兄弟所建的 13 栋宅院（明清建筑），称作“三策堂”。每座呈长方形布局，结构与风

格大致相同，土木建筑，火墙包栋。其中，潮格村 58 号祖屋保存较为完整，依次由前廊房、左右厢房、天井、主座组成。穿斗式木构架，悬山顶。建筑内木雕精美，前山墙为一字形，左右两侧山墙为马鞍形。据史册记载：西汉儒家董仲舒应武帝之咨询，作对贤良策，后人谓之天人三策，并以“三策”作为董氏的堂号。漫步古厝，大门里“耕读传家”“文魁”的匾额，无不彰显尚学之风。屋檐下、门框上、窗棂中，皆是浮雕、镂空雕，既有植物、动物、祥云等图案，也有“郭子仪拜寿”等历史人物形象。这些年，潮格村采用“三策”使得古厝重焕生机：一策是修缮保护使得古厝添生气；二策是变身“书院”“国学馆”增人气；三策是招商引资开发民宿积财气。

当步入潮格董氏祠堂，会发现一座低调的千年古村，却有着并不低调的过往与历史底蕴。

据清朝嘉庆丙子岁次（1816）所书《董氏小谱序》记载，原潮格董氏宗祠于清嘉庆年间由第

十三世董丰富与兄弟昆仲倡导而兴建。宗祠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潮格小学教学场所。1976年因学区教育发展需要，将原宗祠拆除改建潮格小学。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1996年潮格村在上级有关部门及社会热心人士的支持下，在本村东面处新建学校，潮格小学搬到新址。2001年开始民间集资重建董氏宗祠，当年资金不足，所建宗祠结构简单粗陋，经过20多年的风雨侵蚀，破漏不堪。2021年由族人集资在原址重建董氏宗祠，并于2023年初开工建设。

一座祠堂就是一部家族史。新落成的潮格董氏宗祠，坐北朝南，面阔三开门，进深二进，两进前均有花岗岩铺路，两进间两边有卷棚顶廊，为典型的明末清初祠堂建筑风格。占地面积129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480平方米，高14.7米，由前廊、前厅、天井、走廊、宗厅、神龛组成，采用进口木材菠萝格及本地杉木，青砖结构，地面全石板。最是那一抬头的惊艳，宗厅顶端上方装饰有中国古建之绝学、穹顶之魂的金色蟠龙藻井。檐下桁、枋、雀替、挡板、垂柱、斗拱等木雕，采取圆雕、浮雕、悬雕、透雕等多种雕刻技法。还有配套设施与马鞍防火墙，整个宗祠宏伟壮观、古雅庄重、工艺精湛、雕栏玉砌、金碧辉煌。

匾，指的是题字的横牌，它集书法、建筑、文学、雕刻、印章以及民俗于一体。一块木匾，意蕴万千，它是宗祠建筑中“画龙点睛”的睛。

抬头仰望，潮格董氏宗祠正殿上方挂着竖

形雕龙金匾，写着“三策堂”；神龛上方挂的匾额写着“流芳百世”。宗祠里挂着的三幅匾额尤为珍贵。一为“武魁”牌匾，是清咸丰己未年间武举人董兆瀛贺匾，现仅存照片，照片上铭文“钦命兵部尚书太子少保总督闽浙等处地方庆端钦命署理福建巡抚印务布政使司布政使端瑛为武魁……”。二为“望重乡评”匾，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为顶戴耆宾董新益立的，匾上部分油漆虽已脱落，但整体保存较为完整，字迹清晰可见，雄厚苍劲。匾铭为“赏戴花翎同知衔署理罗源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朱葆慈”。“加十级记录十次”是清代对官员功绩的奖赏制度，被朝廷加过十次级、记录过十次的官员即被朝廷议叙。匾额的主人董新益是一位德高望重，深受邻里乡人爱戴之人。匾额一直保存至今，董新益的高尚品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三为“耕读传家”匾，是民国时期福建省省长萨镇冰赠予晚清庠生董家文的。

悬挂在宗祠里的匾额对于后人是一种崇高志向和远大追求的激励。

三

潮格村很老，既有古厝，也有古味——“尚书肉”。

“东坡肉”很有名气，无独有偶，潮格村有道“尚书肉”也很有名气，在乡野之间已流传千余年，是历来村宴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硬菜，有



潮格村“尚书肉”

历史、有颜值，还有挑战味蕾神功。

“尚书肉”源于倪尚书。倪振，字士起，唐朝吏部尚书，赐封梁国公爵位（世袭），约于贞元五年（789）举家外迁，自淮西入闽，定居罗源潮格村。梁国公潮格村故居，约于贞元后期（796—805）始建，倪氏后人于宋元明历代多次扩建，是潮格村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建筑。

卤猪肉各地都有，红烧的、五香的、酱香的，而在潮格村，地道的“尚书肉”，必须选用罗源湾本地土猪。据潮格村董大厨与猪打交道的经验，那就是“看、摸、问、品”四字法。首先是“看”，看猪的外形。农村喂养的土猪体型比较小，宰杀后，它的皮比饲料猪厚，肥肉多，瘦肉少。其次就是靠“摸”，是不是土猪，可以通过摸猪肉的皮来判断。土猪肉的皮摸起来有点刮手，饲料猪的皮摸起来就光滑得多了。正宗的土猪肉用手一摸就能感觉到非常油腻。再次就是“问”价格，正宗的土猪比饲料猪每斤要贵5—8元。最后是“品”，正宗的土猪瘦肉吃起来软而有嚼劲，

肥肉吃起来香而不腻，而吃饲料长大的猪瘦肉吃起来很柴，肥肉出油率少，味道寡淡。

听村中精于此道的董宗长介绍：“‘尚书肉’要用柴火灶烧，用大海碗盛装，才能显示潮格村的淳朴之风。从选料到烹饪，用的都是古法，才能保证肥而不腻，瘦不嵌齿。”

选用本地的土猪肉与特制的中药材卤制而成的“尚书肉”有独特的烹饪方法：首先焯水，去腥；接着五花肉入红糖水中上色；以生抽为佐料，翻炒、勾芡、焖炖，慢工入味，把好火候；而后待肉质为焦黑镬金时出锅；再将上色后的五花肉切成薄块；然后加入生抽、卤水等焖煮20分钟；最后起锅浇汁。选料严格、加工精细、口味鲜美的潮格村“尚书肉”，很是有点曲径通幽的意味。潮格村倪氏家族从唐朝吏部尚书倪振起传承千年的特色传统美食，就“有了存孝不显彦章”了。

满满一大碗的“尚书肉”色泽诱人、肥而不腻，酥香味美、肉香浓郁，谁能抵挡诱惑不大快朵颐呢？！

四

潮格村“肩头坪”是伴随民间迎神赛会衍生而成的，源于明万历年间，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罗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肩头坪”又名膀戏，融闽剧、高脚戏、杂技于一体，是福建省传统戏曲剧种之一。表演的剧目有《打花鼓》《钱串舞》等。

2006年春节，潮格肩头坪艺术文艺队代表福建参加全国“飘色艺术文艺会演”，荣获银奖，潮格村被列为“肩头坪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潮格董氏宗祠落成典礼当天，最出彩的要数“肩头坪”艺术团的孩子们。为了配合活动，孩子们凌晨4点就起床了，穿戏服、化妆大约需要3小时。在箫管弦曲声中，平均年龄在6岁的小演员身穿古装戏服，扮成小生、小旦、小丑等，神情自若地站在身着素服的成年男子演员肩上，于两米左右高空中，手里拿着道具，边唱边舞，把戏曲角色表演得惟妙惟肖；大演员当坪柱，肩托小演员，双手紧握小演员双脚，随戏走台，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变换台步与台位。一小一大，一上一下，浑然一体。任四周观众密密匝匝、站得远近，一抬眼，就能将演员的一板一眼、一招一式尽收眼底。看着孩子们粉嘟嘟的小脸、嫩生生的动作，听着他们甜脆脆的嗓音，演绎着喜悲剧情，在场的人都能沉浸式地感受到戏曲的地方风韵以及童趣盎然。

肩头坪演出场地要求不高。演员在哪里，哪里就是舞台，或者说观众在哪里，舞台就迁移到哪里。它是流动的广场文化，坊巷间、天井中、舞台上，随时随地上演，于乡野尤为相宜。

参加肩头坪排演的成人演员既要有戏曲表演的功底，又需年轻力壮，小演员更是在平衡感、体重、长相、嗓音等各方面，样样讲究；还需较多人手，演员少则8大8小，多则16大8小，外加后台音乐由8—10人组成，使用民族乐器



肩头坪演出

笛、箫、笙、二胡、三弦等，配以锣、鼓、钹、檀板。演奏时，根据曲调，管弦乐与打击乐或齐奏，或轮套，板介严谨，节奏感强。还需要指导老师、化妆师等后勤力量，如此阵容可谓不少。现在的潮格村有一支稳定的百人文艺队，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当每一个宁静的清晨，海鸥衔着东方一抹红晕快乐地翱翔，它们的身影与天空、大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古老的潮格村里，炊烟袅袅，人声鼎沸，罗源湾新的一天开始了。

坑上人家

莫 洁

一

“坑”，福州十邑人家方言与“涧”字谐音；坑头，一听这村名，就知道是一个山旮旯，就让人想起陡峭、逼仄、贫瘠、渺小等词语。现实中，这就是一座典型的灯笼挂壁村。“竹篮掉了不用捡！”就是邻村人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意思说，用捡竹篮的时间去做一个更省事。



坑头村全景

“犁、耙、薅、挑、扛、担”六个字，是这一方人家一年农事的六字经，前三字为手上活，后三字为肩上活。一个小伙子把这六个字都玩溜了，即可讨一个婆娘分灶安家，生子添丁，燃起一炷新香。险恶的地势让村民生活倍感艰难，大家以能够跳出村子，走向山外讨吃为荣。父亲是其中的一位，他通过读书上大学，分配在邻县教书育人。

儿时，伙伴们爱搞恶作剧，常有事没事提起我故乡的名字，还调侃说大抵只有青蛙屁股大。每每此时，我就恼火地警告，或干脆冲上前与找碴的家伙干上一架。稍长一点后，则以人家提起故乡的名字为忌。成年后，故乡的名字却经常萦绕在我的梦里。

二

村子位于两道山梁交接的皱褶处。大凡交接处皆有一丝神秘感。房屋

以依山面水而筑的落堂厝为轴，层层铺开，为清一色吴姓血缘聚居村落。一条山涧从两山夹缝一泼而下，穿村而过，湍急处飞花四溅，远望恰似出水莲花，有添丁的寓意隐藏其中，是为先祖择此肇基安家之由吧！

明弘治五年（1492），吴氏先祖海公犹如一粒随风飘荡的种子，由浙入闽，几经周折，于临水竹林境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路、一厝、一庙，哪怕是一条小小的村弄皆是村庄的孩子，村里人以地标为姓氏，一一取标志着身份的名字。如以村庄为地标，前后山分别称为门仔冈、后门山；以大厝为地标，周边的房子曰大厝坪，大门下的为门下路；以水碓为地标，起名碓岭、碓岭头、碓岭尾；以山涧为地标，起名过溪厝、溪洋坪；以拓主殿为地标，起名佛殿冈、冈巅坪。此外，方位、形状、功能等皆可入姓。如以方位命名的下厝、后头厅、上楼顶、上下新厝；以形状命名的旗冈头、安窠仔、路头壑；以功能命名的晒谷坪、牛栏弄等。这些日日挂在口

头、出入双耳的地名，折射出这一方人家淳朴、敦厚的秉性。

落堂厝，俗称大厝，是村民们祭祖会亲的重要场所，又具有佛殿祈福许愿、求子添丁的功能，抚慰着村民的心灵。碓岭头、后头厅、冈顶坪是村民茶余饭后嗑聊的场所，是村庄大小糗事的发布点。

山多田少，所种出的粮食远不足以填饱肚子；田窄坂高，通常犁完一丘田，耗时还不及劈完一条塍坂。有做有吃、贴做挨饿是艰难做吃的写照。为此，开山种薯是村民唯一的谋生出路，养猪、种柿、苕麻成为解决柴米油盐的副业，能将副业做到极致的，即可起厝、讨媳妇、添团当爷，完成人生三大事。小孩子也不白食，除了帮助大人打下手外，下笥、搏濑、拾螺、砍柴火、捉泥鳅、拔兔子草等是孩子们的拿手好戏，只要有参与就基本不会两手空空。

捡稻草蒂由两人配合完成，即一人挑着筲筐往前走，另一人弯腰捡起稻草蒂投入筐。这是一



项大人怕做小孩子却拿手的农活。缺少劳力的人家，可派出小孩子与大人换工，以完成犁田、做田塍等劳力活。爷爷下南洋期间，父亲才十三四岁，正是用这种方式耕种了全家人丁的田呢！

类似的活还有莳田、薅田等。莳田，只是将秧苗从秧厢移到农田里的农活，也是一种不用花大力气，却得连续弯腰的苦差事；薅田，用手或五齿耙除去田中的杂草，耙仅为辅助工具，主要还是靠手，杂草中有稗草极似秧苗，却逃不过小孩子的眼睛。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拿手活。

三

村小人多，大凡有山有水的地方，不论地势多险恶，几乎都开垦成了水田，是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吧！一些水源不足的山地被开垦成梯田，雨水之年得怡乐，旱年则多因争抢水源而大打出手。

记忆中，我遇上过一个大旱年。那年，云儿像受了惊吓一样，飘得很远，广阔的蓝天空荡荡的，日头离地很近，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空中掉下来，发出火辣辣的光。村里的稻田干涸、皴裂，那条小小的山涧和几处冒泡的泉眼成为村民们的命根子，那一丝丝的流水流向谁家的田，谁家就有生存的希望，一场水源的争夺战悄悄展开了。先是近邻抱团与远邻干架，近亲抱团与远亲干架，接着兄弟携手干倒邻里。庭公兄弟七人，个个高大剽悍，在干倒同样拥有七兄弟的佐公

后，成为赢家，晚餐摆酒庆贺，焚香敬祖。想不到，还不到一周时间，七兄弟之间就操起狼筧、锄头、镢刀等家伙大打出手，为的就是争得一眼泉，育两丘田，续一家烟火。村民们知道，同住一座村，同祭一座坟，靠干架求生存终不是办法，却又找不到更好的途径，只能在矛盾中顺应求生的法则过日子。随着番薯引进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以及乡村文明程度的提升，这一惨烈的水源之争，已成为历史旧迹。

番薯，这个带“番”的家伙，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个外来词，村里与此相关的外来货主要有“洋钉”“洋火”“洋油”等。别小瞧这些外来的小家伙，有着小中见大，改变村民生活方式的本领。

洋钉引进后，乌黑的竹脯钉就下台了，村民们节省了与老竹子打交道的砍、扛、锯、破、劈、削、熏等劳力活。一枚小小的洋钉，钉在墙上，比又粗又笨的竹脯钉牢固呢！一盒小小的洋火一进家门，用来焙火种的灶围即遭冷落，一根小小的火柴一擦即着，省的是主人家的柴火与讨柴火的工夫。

当年用桐油的日子，一家老小为了一点微弱的光明，捡、挑、剥、晒、榨，忙得晕头转向，还得花钱榨取。点火把照明的活就更加烦琐了，用竹箴、麻秆或松茗当燃料，得耗时、耗力从山上砍回来晒干不说，点起火来，火光暗淡、烟多、火焰闪烁不定，伤眼费神，说透了就一个“烦”字！洋油来了，把光的事变简单了，一下

子，就把这一“烦”字消除了。

四

秋收是坑上人家的一道风景。

“三秋大忙，贵在‘早’字。”秋分过后金黄色的稻谷沉甸甸的，正是割稻谷的好时机，这是一个属于孩子们的季节，他们早早地在这个金色季节接受锻炼。村民们割稻谷采用的方式是“换工”，即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合力收割，争抢时间。早收割，早晒干，早归仓，一切围绕着“早”字展开。村民们起早摸黑虽苦，但集体干活，有说有笑，吃的是大木桶蒸饭，喝的是老米酒，自然乐在其中。将沉闷的苦力活玩出诗意，是古老山村生活最深的记忆。

稻田是孩子们的乐园。除了踩水踩泥巴的乐趣，还有捉泥鳅的刺激。那是一项孩子们的拿手活。只要一见到稻草茬边突然间冒出一小团浑水，十有八九是受到惊吓的泥鳅钻入田泥中逃命。此时，孩子们只要双手合掌，顺势瞄准浑水团一捧，就能将惊慌失措的泥鳅捧在掌中。也有一两只傻乎乎的不知道逃命的泥鳅，孩子们则屏住呼吸，将食指跷得高高的，与拇指组成虎钳状，往泥鳅腰处一夹，泥鳅只慌里慌张地扭动几下腰身，就被扔进篓子里了。黄鳝劲大，被孩子们夹住后还会逃脱。大伯教我折下一根细长的芦苇叶缠在手指头上，再去抓。我试了一下，一夹就中，从未失手。

村里的孩子个个扛起稻把来健步如飞，打起谷来呼呼作响。但玩是天性，他们需要用玩来调节体力。打谷坪是孩子们的游戏场，记忆中用稻草搓成长绳进行跳绳比赛，将稻草垛烧起来烤番薯是每位游子的共同记忆。

番薯叶为家猪的冬粮，得赶在霜降前收贮，否则冷霜无情，会将番薯叶冻得片叶无收。落番薯叶时节，身围青色麻布围兜、肩背扁篓的母亲携子落番薯叶的情景，亦成一道山村风景。此时，母亲们常常隔丘喊话、嗑聊，孩子们累了就聚在一起玩游戏。风篁沙沙响，杨柳轻轻摇，一曲堪比采茶调的秋收曲就这样传唱起来了。

推番薯米是一道将番薯加工成贮备粮的粗活。母亲能快速将一个大番薯推成细长条而不留片蒂，惹得孩子们羡慕不已，争相模仿。

推出的番薯条得倒进大谷槎中清洗，再捞出来摊在簸箕上晒干，即成为仅次于大米的主粮番薯米；洗出的淀粉沉淀、凝固、切块晒干即为雪白的番薯粉，可加工成粉丝、粉片，是年夜饭一



冬晒

道不可或缺的佳肴！

五

深藏于大山皱褶里讨吃的村民不容易，除了练就一身与自然灾害抗争的本领，还得时时提防土匪的打杀抢劫。为此，习武练武成为像一日三餐吃饭一样重要的活，村民们不管上山下地刮风下雨都得抽出拳腿捣鼓几下，正所谓拳不离手。

有了这一身功夫，村民们说话就有了底气，腰杆子自然就直了。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座小小的村子也成为福州府北路临水竹林八村中唯一不设围墙、栅栏，甚至炮楼，却没有土匪胆敢前来冒犯的村庄。据说清末，也曾有几股土匪多次来攻打过，每次，村民们都倚仗着险峻的地形与狭小的村弄，将入村的土匪队伍截成数截，尔后再逐截消灭。据《延陵郡兰陵坑头吴氏族谱》记载，直至民国八年（1919）春，村子才由春瓦坑李姓匪首说服村中的外甥，利用劳力下田蒔秧村中空虚的时机，纠集七班土匪里应外合，攻破村庄，抢走粮食，烧毁房屋12座。我的曾祖父世公与高伯祖父益公等几位留村防守的老武师战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前来剿匪，李姓匪首战败后带着余匪逃藏于村东的葛垄弯。村民们获悉后，连夜带上火铳、刀斧、锄头前往包围了葛垄弯，激战一天一夜，活抓了李姓匪首，令其自挖至胸深坑，众人争先填土，尔后

一人一锄头，将其沿胸锄成两截，上截移葬于老蛇垄。村里有奇俗，身首异处，是对死者最大的惩罚。儿时，慈祥的奶奶每当讲到这段往事，都禁不住老泪纵横咬牙切齿，那种刻骨铭心的痛，是我等晚辈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古老的习武之风，让村中老幼妇孺的身上都有一股刚烈之气。村中讲话人腾公的儿子牛牯偷窃了拓主殿的金元宝，被村民们当场抓住，大家见是德高望重的腾公儿子就放走了他。哪知道纸终究包不住火，这事还是让腾公知道了。他火速召开村民大会，将儿子反绑吊到戏台上批斗。会后，牛牯羞愧难忍，持刀自杀……

六

邻村钱厝是母亲的娘家，村前的大辰樱花谷离家乡坑头仅两公里。我择得一个好日子带着母亲回家走了一趟。

现代化进程让众多古村消失。所幸，两座古村均保存完好，割稻谷、蒔田、推番薯米等农活仍在延续，炊烟依然袅袅升起。大辰樱花谷瀑雄、谷深、岩险、花艳，有彩蝶起舞，有蜜蜂采蜜，有孩童戏水。当然，更多的是熙熙攘攘赏景留影的人流，一波接着一波的涌动恰似涨水欢唱的龙门溪。陪同我们行走的是一位声如洪钟的帅小伙子，说下一步将开发钱厝、坑头民宿与古村旅游，打造翠屏湖——大辰樱花谷——临水宫——蓝田书院的旅游线路……

石马骑山入梦来

邵永裕

永泰“九山带水一分田”，山多且高，千米以上山峰77座，同安镇境内4座。其中海拔1005米的石马寨，就屹立在我家乡，历经千年，愈发生机，成为村里人最稳当的“靠山”。

名为“石马寨”，其实是一座以寨为名的山。此山半腰处有一巨石，形似一匹骏马伫立在山谷中，远远望去，仿佛静候主人跃马扬鞭。山顶有座寨，二者相得益彰，不知谁概其为名，“石马寨”山名流传至今。

小时候，我随大人到石马寨捡柴，忙里偷闲常约伴登顶。俯瞰四周，山下房屋星星点点，仿佛隐约的天河。

山下村庄，北有大洋镇旗东村，东有同安镇文滌村，西、南两面被丹洋村半包围着，从村头到村尾绵延5公里。丹洋原为丹阳。居住在山间盆地的先祖，内心向往着更广阔的地方，无奈山高谷窄，只好把美好的愿望寄托给了地名，改阳为洋。

丹洋行政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丹洋、隔下、长垄。俯瞰村形，恰似一串葫芦，由一根线

拴在一起。这根线就是213省道，贯穿全村。村域面积5.1平方公里，人口近2000人（迁居在外600多人）。村里以邵氏为主，连氏1户。邵氏于明永乐二年（1404）拓荒置户于此，其过程似乎冥冥之中带着天意，充满戏剧性。

邵氏入闽始祖邵楚茺，唐时避安史之乱，由河南安阳迁福州邵岐。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增多，居住地由城外向城内靠拢。福州城的新塔街邵氏祠堂，便是当时城内居住中心。明永乐年间，随着全国人口大迁徙，福州城各族姓也开始向外迁徙。明永乐二年（1404），永泰各乡村开始拔屯拓荒。居住在新塔街的邵氏，往哪里安家？一天晚上，邵氏第26世伯垣公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骑着一匹黑骏马，站在山上，俯瞰山下村庄，指点着脚下的山川溪流。

依着梦境，他在拔屯分地中，找到了永泰丹阳（丹洋）这地方。于是，他不再彷徨，认定梦中的家园就在眼前。

如果说，这是“跑马圈地”，先祖邵伯垣顶多算是一个圈地者和见证者，那么真正的经营

者，应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1404年邵伯垣领受丹洋拔屯地后，其家族长期在福州鳌峰新塔街生活。据传，他只派了10个士兵据守经营，分别姓倪、刘、张、柯、安、马、王、潘等。又一说法，这10个随带士兵，系其曾孙邵畴带来，分兵把守村域边界。村里地名：倪厝里、刘氏窝、柯厝、张泰墩、安门隔、马精坑、双王墩等皆为10个士兵造房驻扎地。

迁居丹洋邵氏，受邵铜文化影响最大。邵铜，明甲戌孙贤榜进士，任监察御史，巡视京城，总督两浙盐课，弹劾昏官。他为人清正廉洁，亦重视文化传承，著有《户册易见图》《湖重山人集》《鸣盛集》等。有道是：“何妨云影杂，榜样自天成。”600多年来，丹洋村耕读文化蔚然成风，走进邵氏祠堂，只见厅堂挂满了文魁牌匾，其中有邵锸、则扬、师董、师煜、宣华、文祯、文奎、文趾、文品等，此辈由明至清皆有。丹洋邵氏崇尚读书风气传为佳话。清乾隆年

间，苏知县巡察全县众多村落，走到丹洋村，了解到小小村庄竟有如此多的举人，还有进士，大为震惊。感动之余，命人拿来笔墨纸砚，欣然题写“士林模楷”授挂祠堂。牌匾犹在，黑底金字依然闪耀着先祖荣光。

邵氏后辈不忘传承读书家风，倡导“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理念，鼓励子孙读书成才。从1952年新中国实行高考制度后，村里先后有人考上大学，在那大学生稀缺的年代，丹洋邵氏连出大学生成为佳话。邵永祥于1960年考上西安交通大学，邵永基于1964年考上南京土木工程学院。此后人才辈出。这现象，引发周围村民的赞叹和羡慕。

丹洋武术文化远近闻名。清朝时，邵师严在比武中斩获“武魁”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氏重视武术文化传承，三个自然村，上起丹洋、中至隔下、下至长垄，豹拳、杖法等，以房、队（生产队）为单位，习拳练武成为时尚，



丹洋石马寨



石马寨脚下的丹洋自然村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鼎盛。

丹洋村域狭长，三个自然村由三个小盆地构成，不规则隆起的山峦或山峰，成为修筑寨堡的理想场所，也是躲匪避难的最佳选择。寨堡主要分布在丹洋自然村，此村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重要建筑也在此。于是，丹洋成了行政村的名字。

丹洋村有四个寨，分别是新寨、旧寨、矮寨、石马寨。新寨与旧寨建于清朝年间，早建的叫旧寨、后建的为新寨，建造年间不详。旧寨 90 多岁老人邵长荣说，10 岁时（1942 年）他还在旧寨嬉戏玩耍过。寨堡规制完整，分为上下落，石墙把整座山头围得固若金汤，矗立在山峦的最高处。民国七年（1918）土匪吴焕山打家劫舍、放火烧房时，全村男女老幼都躲在旧寨里，安全无虞。那时，旧寨里还住着邵孟桃、邵孟进等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寨里人陆续往外盖房，旧寨房屋逐渐倾圮。

新寨建在旧寨斜对面的山头上，1837 年举人邵宣华所建。上去要爬一道长长的岭。接近岭的顶端，种菜的园坪，依山势逐级提升，然后过渡到宅院。瓜果飘香季节，这片园坪郁郁葱葱，还有许多让人垂涎的水果，仿佛世外桃源。新寨三落建制，规模宏大，加上周围园地开阔，风景迷人，我

常流连忘返。

1983 年，住腻的人们，纷纷往外建房，由于缺钱少料，新寨被拆除当作建材或卖钱按份分掉。厅廊铺设的一条长约 6 米、宽近 1 米的大石板条，全部按石板材卖给了大洋公社，作为新建办公楼压廊使用。矗立山头 146 年的寨就这样消失了。

丹洋的四个寨，依石马寨山势逐级布局。旧寨地势最低，新寨其次，矮寨位于石马寨山腰，石马寨处于峰顶。为何如此选址？据说主要是在匪乱时，作为避难撤退路径来谋划的。

矮寨位于新寨与石马寨间的一座山坡上。此寨比新寨早，但未建成。据传，建矮寨的主人为宣华祖父，名则仁，准备动建时，由于建寨的位置处于风水学上的龙脉，村里另一房头担心斩断龙筋。精通诗书的文人邵则进，写了 16 字上书官府：“太平世界非纷乱天下私起营寨邵则仁。”则



石马寨山顶犹如一颗硕大的心脏，周围有三个寨门

仁被治罪进狱至死，留下矮寨空址的悲叹。

石马寨位于丹洋村的顶峰。山顶面积约 5000 平方米，遗留 1 座石屋、1 个碑址。寨墙被莽草覆盖，只有寨门的垒石可见。石马寨建成时，绕着寨墙有一进深的房屋，村里遇有匪乱时，曾发挥过作用。后来风雨侵蚀，倾圮殆尽，仅余一圈石头垒成的围墙和一座石屋昂首屹立。石屋楹联写着：“帝功开宇宙，王泽荫闾阎。”横批：“石马寨。”上题款：“道光己巳年孟冬立。”下落款刻：“信士弟子邵、朱、连仝立。”在石屋的附近，留有“盘古帝殿”石碑遗址。据说，在清朝、民国期间，来自四面八方的猎人，狩猎后都会登山来此祭拜，以求平安。盘古大帝是山脚下民众的保护神，自从伫立山头，始终俯视山下，察看苍生，与悠悠天地共存。

丹洋村四周环山，蜿蜒其间的道路，打通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村里人很朴素，信仰佛道文化，尊奉天地神明。在村头的位置，建有积善堂，供奉“古溪大王”，每年正月初三，抬出八顶大轿，巡游全村。所过之处，家家户户鸣炮迎接。这项活动年年举行，参与人数越来越多。八顶大轿造于清代，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如今已成文物。在村尾的地方，盖有供奉“泗州佛”的亭子，祈望村人进出能够平安顺意。

2004 年，村民集资重修邵氏祠堂，由于建构完整，功能齐全，形貌有仪，被福建省列为永泰县同安镇五大名祠之一。近年来新修并扩建了积善堂、二祖厝。除了传承信仰文化，还把现代文



石马寨石屋

明融进村民精神追求。积善堂和二祖厝，增添了舞台和观众席，成为村里文化活动聚集地，一台台戏剧和文艺表演，不断丰富村民的娱乐生活。

在解放战争时期，村里许多壮劳力参加了闽中游击队。邵瑞琛任队长，领导的游击队员 300 多人，其中邵家子弟就有 30 多人。

丹洋虽说不上显要，但溯其邵氏繁衍史，却散发着对安居乐业的不懈追求：从石马骑山到拓荒栖身，从建寨避匪到供神祈安，从守道勤耕到“士林楷模”，从红色游击到戏院赏剧，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族群、一个村庄进化演绎的进程。

水吉访古

陈崇勇

水很吉祥！这是我看到“水吉”这个地名时的第一反应。后来得知因南浦溪在建阳区水吉镇境内营头村的位置，被石矾阻挡，曰“水矾”。明朝文人因“矾”与“吉”谐音，于是取名“水吉”。现水吉镇屏障巷仍存有一块明天启五年（1625）立，1918年重修的石刻门楣“吉水上游”。

水吉地处南浦溪中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闽北浦城、建阳、建瓯等六县经济往来、商品流通和土特产交易的主要集散地，也是闽北山区的重要水陆码头之一。溯溪而上，直达浦城。顺流而下，可抵建瓯、延平，省城福州。大宗的粮食、木材、茶叶等土特产，以及水产品、食盐等上溯下航全凭水上运输，每天行船数十艘，多时过百。20世纪50年代，水吉公路通车，水运衰弱，至70年代末绝迹。

拭去时间的尘埃，可以看到曾经繁荣的“闽江古镇——水吉”，有两个高光时刻与建盏有关。

一个是在遥远的北宋，东京汴梁盛

行着“点（斗）茶”游戏，即将茶饼烤炙碾细，然后烧水煎煮。如果研碾细腻，点茶、点汤、击拂都恰到好处，汤花就匀细，可以紧咬盏沿，久聚不散，这种最佳效果名曰“咬盏”。反之，若汤花不能咬盏，而是很快散开，汤与盏相接的地方立即露出“水痕”。点茶以水痕晚出为佳。点茶之盛，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窥探一二。著名的有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



水吉镇

斗茶香兮薄兰芷。”苏轼《送南屏谦师》：“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宋徽宗《宣和宫词》：“螺细珠玑宝盒装，玻璃瓮里建芽香。兔毫连盏烹云液，能解红颜入醉乡。”

点茶，首先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茶汤白，茶盏黑，对比才分明。为了适应点茶的需要，曾在庆历七年（1047）担任福建路转运使的蔡襄，大力推崇水吉建窑生产的兔毫盏，他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紺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熇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而皇帝宋徽宗则钦定了好盏的标准：“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因而建盏声名大噪，产量激增。民间传说，建盏生产最繁盛之时，有百条龙窑遍布在水吉的山丘上，窑火日夜不熄，很是壮观。

而随着崖山海战的失败，南宋王朝彻底覆灭，进入元朝的统治，禁绝斗茶之风，特别是明洪武的禁团茶令后，饮茶方式改变，建盏再无用武之地，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出人意料的是，建盏的文化生命却在异域得到延续。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日本的僧侣们来到浙江天目山学佛，回国时就带走建盏（当时的日本人不知道建盏的产地在建州，讹称建盏为“天目瓷”），在与源自中国的日本茶道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茶盏价值体系。成书于16世纪（明中晚期）的《君台观左右帐记》，其中对建盏记录如下：“曜变盏乃无上

神品，值万匹绢；油滴盏是第二重宝，值五千匹绢；兔毫盏值三千匹绢。”

如今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被誉为“天下第一碗”的曜变建盏，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油滴盏等一些世界著名的建盏都在日本。那么，这些建盏是怎样漂洋过海到日本的呢？

1323年从中国开往日本博多的商船，途经韩国西南端的全罗南道新安海域时不幸沉没，史称“新安沉船”。1975年，被打捞出水时发现建盏42件。2007年4月，“南海一号”沉船从广东阳江一带打捞出水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黑釉建盏。这些商船的考古都可以看出建盏是宋元时期对外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品种，也是随着商船来到日本的。

另一个高光时刻则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驻中国海关官员的普拉曼，从福州古玩市场里购得一些很独特的黑釉盏，被它们神秘的斑纹所吸引。于是追根溯源，来到水吉，从建窑遗址上挖掘了大量的建盏残片，运回美国。后经研究，写成论文《天目——关于建瓷的研究》，发表在《伦敦新闻画报》上，轰动一时，成为发现建盏真正来源的西方人。

但因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时期，民不聊生，没有人关注此事。甚至连水吉当地人，也只是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从芦花坪里拣了好几大筐的“破烂”，装船运走，不知意欲何为。好在当时，普拉曼挖掘建盏残片的现

场、运输建盏残片的船、渡口打鱼人等都拍有照片，使得半个多世纪后的我们追溯起来，还可以按图索骥。

2023年的深秋，我在水吉建盏文化专家徐子明的陪同下，沿着南浦溪畔，寻找当年的历史痕迹。来到池中村古渡头，一湾平静的溪水畔，芳草萋萋，绿树成荫，看不出丁点码头繁华的迹象。他讲解道，在水吉古窑址这一片12.6万平方米的区域内，有目前国内也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长的龙窑遗址：135.6米。有堆积如山的建盏残片，其中，在池中村原瓷厂旧址挖掘出大量刻有“供御”“进盏”的建盏残片，说明可能是存放官方建盏的仓……离此不远的南浦溪畔，有一个码头遗址，推测是官用码头。

而与之相隔数百米处，即现今古窑址牌坊正对面的南浦溪边，也有一个码头遗址，推测是民用码头。数年前，有人在附近的河道中打捞出大

量的建盏残件。更早时期，许多当地的小孩还可以在溪边捡拾建盏残片打水漂。

当然，重提昔日建盏的辉煌，还与现实有关。如今，走在水吉的大街小巷，许许多多销售建盏的门店，柜台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曜变、鹧鸪斑、油滴、兔毫等各式建盏。建盏产业已经成为水吉乃至建阳的文化支柱产业。

流水的便利，带来物产、人流的聚集，进而形成文化的聚集。水吉也是一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镇，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留下遗迹。晚唐时，黄巢军队从浦城开往建瓯，前锋部队在营头渡口过渡时，正逢洪水季节，被当地民团打败，大军绕行政和县黄念山。民团头目蒋源获封石矶侯，并留下黄巢遗剑的传说。南宋时，水吉的义塾改名朱子学社，建在林泉寺院旁边（现水吉中学大门附近），占地3亩，有亭有池，朱熹曾至此讲学。清嘉庆年间，瓯宁知县张腾募金重



水吉古窑



建盏

建，易名为“西澜书院”。道光二年（1822）竣工后，成为水吉一带儒生读书学习的场所。道光三十三年（1907），改为“西澜小学”。民国三十一年（1942），创办“水吉中学”。是闽北旧式书院到新式小学、中学转换、演变的一个较典型的案例。我到水吉中学走访时，在展览室里存放的一块“西澜书院”旧碑残件上，看到“……是以后人有西澜书院之建焉”等文字，可与民国建瓯县志中“西澜书院”“在禾供里水吉街，清嘉庆年间知县张腾募金重建，拨废庵田租以膏火，腾自为记”的记载相互印证。如果单从字面的意义出发，“西”是方位，“澜”是大水，与水密切相关。可在互联网上搜不到“西澜”的出处，向本地的老师请教，回答说是“知县张腾赐名”。作为兴办书院的知县，当然不会随意题写书院名称，只是现在找不到更具有说服力的出处，算是一个待解之谜。

西澜书院不仅是一所学校，也是水吉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据记载，“咸丰八年

（1858），太平天国义军石达开部驻跸‘西澜书院’多日，石达开曾在后院奎星楼题诗抒怀。”“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军路经水吉，军长何应钦下榻西澜书院”，等等。师生们也深度参与了一些历史事件。像1926年冬，“国民北伐军击败军阀孙传芳，孙乘楼船沿南浦溪北逃，路经水吉时，‘十驮仔’李悼年组织学校师生到码头迎送，并设宴几十桌款待”“民国三十一年，水吉初级中学教师带领学生上街进行抗日宣传”等。

漫步在水吉古街上，看到一座古朴的周家祠堂，门墙上嵌着白底泥金的砖雕大字“宋大儒周濂溪先生祠”，大门两边的黑底金字对联为“吉水文章第，濂溪理学家”，两边小门的门楣上分别写着“道脉”“学源”，祠堂正中供奉着周敦颐（濂溪先生）全身画像。周敦颐的后裔于明代来到水吉，至今已繁衍30多代。在周氏族谱中载有水吉八景诗，其中“柳溪弄月”是南浦溪畔的风景。诗曰：“浓荫环岸畔，翠柳列晴溪。古道青牛卧，仙桥白叟跻。青潭千古碧，好鸟万声齐。爱此真忘倦，遑听报夜鸡。”周氏后裔带来的“祖公老佛”安放在民主村八角井的真如寺。每年农历正月廿一，华灯初上之时，50名青壮年轮番抬着“祖公老佛”神像，队伍由金沙大锣开道，龙灯、鱼灯、花灯、十二生肖灯等随行，神像所到之处，鞭炮齐鸣、烟花对射，信众挤到神像前用手触摸以求保佑……整个队伍长达500多米，有来自闽北各地的数万群众在此围观，游神规模堪称闽北乡镇第一。



水吉古镇

古代迁入水吉的旺族大姓还有好些，他们和水吉的许多古迹、习俗密切相关。如水吉镇市头村东南6公里的大觉寺，相传原为宋末元初谢氏家族的家庙，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改建为大觉寺。清朝嘉庆五年（1800）建造藏经阁，内藏明朝刻印的《大般涅槃经》《法华经》和《华严经》等5000多册，平时开放，供外界阅读。每年农历六月初六，阳光最猛烈时，将经书搬出暴晒，流传下来，成为有名的大觉寺晒经节。

南浦溪畔，离岸不远的乌火山，绿树丛中耸立着一高一低两座白塔。高的叫普照塔，是楼阁式实心塔，砖石结构，六角七层，高16.24米，是叶氏宗孙于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集资修建。低的一座叫联升塔，是楼阁式空心塔，砖木结构，六角三层，塔高12.57米，由徐氏宗孙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修建。据明代徐氏宗谱记载：明万历乙酉年（1585）至崇祯乙亥年（1635）的50年间，徐氏族人科举中中榜眼2人，探花1人，出任各地知县、知府、尚书等官职的有14人之多。该塔塔身三层，以寓三元及第、连升三级之意……

水吉还有一个特殊的升县撤县历史。抗战期间，因大批福州手工业作坊迁到水吉生产，经济相当繁荣，1938年，由原为建瓯县的水吉区升为省府直属的特种区，1940年划入周边各区，成立水吉县。又因1956年，苏联援建南平安丰超大型水电站，设计将淹没建瓯、建阳和水吉三县全城等原因，导致水吉县撤销，成为建阳县的一个

镇。随后中苏交恶，水电站援建计划废弃，水吉县却难再恢复，闹了个乌龙。水吉县存在的这短短16年历史，形同昙花一现。如今的水吉也已经很难看到相关的痕迹，只有在新华路段一座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二层青砖瓦房墙上，那一排繁体的“中国人民银行”孤寂地诉说着陈年往事。

穿过水吉主街，来到笔直的防洪堤上，堤内是繁华的镇区，堤外是玉带般的南浦溪缓缓流过，一派宁静祥和，看不出哪里是曾经的古码头。明代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五入福建四进闽北，在笔记中也有“泊水吉，风雨彻旦，溪喧如雷”的记载。400多年前的那个雨夜，他的舟系于何处？在堤上走走停停，看到有通向水边的小路就走下去查看，没有发现明显的码头石阶痕迹。问一位在芦苇丛中钓鱼的中年人，他摇摇头，不知道。我又在微信里向一位本地籍的作家甘联露询问水吉镇古码头的位置。他说，靠溪边防洪堤，土话叫“街头”的地方就是主码头。入口在水吉大桥往上游一点，原先木材转运站那里，是一个避水、避风的港湾。“街头”对面，是营头村，古代叫“营头驿”，是驿站，也是渡口。作为古代出省入闽的必经通道之一，宋代设置营头巡检司，有巡检官员，元、明时撤销，清顺治五年（1648）恢复设立，民国三年（1914）再度撤销。驿站边有一花桥，桥旁建有“接官亭”，很可惜，在建高速公路时把古驿道和驿亭都推掉了。

我站在水吉大桥下茫然四顾，心情很复杂！

长亭更短亭

张玉琳

永泰母亲河大樟溪，水岸迢递如长廊，廊上有簇簇汀埔。近中游处的这段水道逶迤成巨弓样的弧形，到南岸的铁券山、牛垄头山之间，是呈扇形的冲积地带。这么一小片如“埕”之“埔”，“埕”上土地舒展平阔，生息一村曰“埔埕”。埔埕村人烟繁盛，曾经是龙津里里治。

村中有 3000 多年前的土袋山遗址，考古挖掘出来的陶片、石刀，其上先民的生命痕迹或还略显轻忽。一座五代十国后梁开平二年（908）始建的灵鹫古寺遗存，一口开凿于北宋元祐二年（1087）、重修于南宋淳熙丙午年（1186）的太平古井，两宋期间迁入本境的李、林、黄、郑姓的几卷族谱……这些草蛇灰线般的印记，虽然幽渺，但也依稀可勾画出中原族姓南迁在埔埕留下的千年足迹。此后的明清数百年，这里有治世的繁荣，也或有乱世的桃源。县志谱牒、民居古寺、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使得这方水岸聚落所上演过的一幕幕热血场景依然清晰。如这个大一统民族的任何一块被教化着的王土一样，这里儒生文进，力士武举，贞妇流芳；倭寇匪乱，陈、林、黄姓义士捐躯。横遭过樟溪水灾、鼠疫传



埔埕村 池建辉 / 摄

染、匪寇洗劫，如此这般，这里的众姓族民仍生生不息。

巷陌：卵石巷、龙眼树

村居的中心地带像个大迷宫，有“埔埕十八巷，走来走去走不透”的戏说：7000 多常住人口，12 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不过两三平方公里面积的中心居住区里，厝屋如蜂房——有民国前的老厝 40 多座，古祠 6 座，新房近千座。

巷道里，空间紧蹙的地方，两人相过要侧身；宽绰的，摩托车可以驰行。砖混新屋紧贴着土木瓦矮屋拔地而起；坍塌的旧土墙护卫着外墙

鲜丽的新房。

这里是卵石的世界！

古厝、老院的基、墙多是卵石砌就，巷道也还残留了一些光亮的卵石路面。基、墙或高或低，路或长或短，石料或全卵或半劈，无不求大小匀称、排列工整。置身这般齐整的卵石世界，能感受到几百年间，构筑房厝的村人从河滩上肩挑手握搬运回石料的欢欣，施工匠人比画着挑选用料的拳拳用心。那种整饬，甚至还生成一股倔强的、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严整的卵石还有着刚硬的质地，给予了以土木为主体的老屋一份硬朗；而卵形又呈现出一种细碎的美感，给了这个古老村落以盛放蔷薇似的温馨与细腻。想来，如若微雨窸窣，这巷子里四下罗布的卵石，在绵密雨丝的滋润下弹射出喑哑的微光，为这逼仄的空间增添了人烟的温润。

深入街巷之中，惊叹于厝前屋后的果木掩映：扇叶招摇的芭蕉丛倚靠土墙搔首顾盼，浓密

的薜荔藤骑着墙上下蜿蜒，长柄的仙人掌、火龙果成群地攀上了墙体、房瓦。最是惊异在这寸土难得的人烟繁稠之地，竟然四处遍植高大茁壮的龙眼树！暑气蒸腾的时节，一串串龙眼果缀满在油绿泛光的树叶间，如同瀑流跌落时迸溅出的一团团水花。村外围的龙眼树大多年岁尚浅，干枝挺直，树皮浅棕；村里巷道中大小空地上长着些年长干粗的，树高枝虬，树皮苍古。

人烟：厝厅堂、李家祠

老厝的大门大多敞着，已经少有居住其中的村民了。我们探访了几个保存完好的百年厝屋。

厝屋的前厅、大堂、厢房大都收拾得干净。进得大门，总是见到中堂之上红纸铺天。太师壁正面壁上粘贴着的“某（姓）某（姓）结婚典礼”的喜字层叠，右下侧粘贴着敬告祖先的婚配嫁娶吉课。屏柱及厅堂两侧柱贴满楹联；堂中



卵石巷 池建辉 / 摄



老厝 池建辉 / 摄

悬挂着红灯笼、红彩纸拉花。左右侧墙壁上粘贴写有“麟趾呈祥”“前程远大”“光前裕后”等贺词的红色贺纸——这是兄长、叔伯、娘舅等至亲长辈中有威望者，为成婚子弟寄予的成家立业的祝福。满堂的红纸，剪成菱形或长条形或长方形，有的粘贴有的披挂。古老的厝屋，因这满堂的红艳而冲淡了颓废感。

堂上香案或古老精美或现代简约，但案上香炉里的香灰总是满溢的。

穿行巷道中，看到新屋修建，也看到古厝翻修：翻新椽檩、屋瓦，更换梁柱，修整牌匾。厝中堂上贴着记录祖厝翻修资金收纳细目的红纸。祖屋多数已经不再居住，但族人们依然捐献自己的财物来延续祖产，也凭之以陈述今生世事、预知缥缈来世。

村中现居有十姓，其中六姓建有七个宗祠。本地有李姓祠，李姓却无本地居民。经过李姓祠堂，难得看到大门洞开——祠堂正在进行翻修。里头有工人正忙着抬柱木、砌砖石，堂上堂下长条木、圆木柱竖放横躺，木刨花漫地散落。往里张望：堂正中高悬着“陇西堂”堂号牌匾，大堂前檐下横拉着书写“热烈欢迎各地李氏宗亲返乡谒祖欢聚一堂共叙亲情”字样的条幅。

这是一个很有故事的祠堂。埔垵李氏先祖李思升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由莆田白塘（今涵江区白塘镇洋尾村）迁徙至此。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处于沿溪河谷低洼地的埔垵遭百年不遇的洪灾，已经成为当地望族的“埔垵李”，基业

大部分被洪水冲毁。此后500多年间，陆续有李姓族人沿着家族田园产业所在区域先后外迁，开拓新家园。到民国时期，埔垵当地已无李姓人家居住。

明成化年间的那场洪灾后，李姓将祖屋修建成祠堂，500多年间，散居各地的宗亲从未间断对祠堂的修缮维护。李氏祠堂也如同埔垵其他姓族的祠堂一样，每一年度都举行祭祀活动。在八月初一的祭典仪式上认祖归宗，散居永泰各地以及附近县域的“埔垵李”后裔，都会按照由支系数设定的名额数，派代表回祖地参加祭典仪式，近年参加的人数保持在四五十人的规模。祭典仪式的操持、宴席的操办，主要是由离埔垵村较近的李姓后裔统筹安排。

眼前这李姓祠堂，庭院不甚宽大，门楣并不夸耀，但一种寻根、归根意识的神圣力量，能把四散的宗族后裔召唤归来。

风情：独根榕、钟官庐

从一座老厝旁侧的外廊道经过，高高搭起的装修脚架遮拦着去路，躬身钻行而出，回望，这是在正厝、横楼之间一方几十平方米的空埕位置上修建的一栋三层楼砖混房。我惊异地发现：二层阳台处长着一株翠叶繁枝的小叶榕树！树干碗口粗，树身微倾向外，树冠宽可比窗。顶着这一棵头重干粗榕树的竟然是一个椭圆扁平的不过几厘米高的绿色盆景盆。这景象，仿佛一个体态颇

为壮硕、气度颇为豪迈的女子穿了金莲绣花鞋。

在向导郑老先生的提示下，拨开横七竖八脚手架的迷障，我终于分辨出这榕树悬垂了一层楼高而寻土钉入一楼地面的独根：根脉从盆里翻越而出，五花大绑一样箍着盆外沿，到盆底部汇合成锄头柄粗的独根，然后笔直地向着一楼地面，直到钻入石板缝隙间的土层。

骄阳下，榕树密叶泛着油光，快乐、自适。再看此楼，它顺着地势建成L形，左侧位大致两间，右侧位只有半间加一个楼梯间，右侧外墙甚至紧紧贴着老厝屋檐，老厝一段外檐横突在右侧二楼阳台前。如此局促的居所，主人家竟肯让一棵榕树这么恣意地存在？过道上站着的中年男子回答我说：“二十几年前，孩子出生的时候种下了小树苗，长着长着，觉得好看，又好玩，就一直留着。”原来，这树是“家庭成员”！

想起明朝《永福县志》编撰者之一的徐爌所著，叙写当时地方名士林宗程风采的《绿榕轩记》中有如此的记载：“溪滨古榕十数本，美荫参天。其根盘结如峦，其干诘曲如龙，其枝叶亭亭如车盖。占埔垵一乡之胜”，“轩窗之前，绿榕斜映。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环碧横翠，扑人衣袂。至于朱明届候，烈火流金，而绿叶垂阴，令人翛然有北窗高卧想。若夫严冬司令，霜露结凝，翠影扶疏，不作憔悴可怜之色。宗程居而乐之……”

榕荫里，人们“居而乐之”。这主人家难舍的盆景榕，难道是400多年前那轩外的无边榕翠

中的一抹？

途经通幽曲路、果木扶疏的小院，精巧的钟官庐赫然眼前。钟官庐，民国年间修建的三层铕楼。屋檐微翘，有凌飞之势；庐前两侧各有的一座小小单层护座，给庐屋增添些稳重安泰感。

铕楼在十几年前重修过，黑瓦坡顶，墙面粉白，小窗朱红，三楼木吊脚长廊朱漆。白墙面上从右到左两字一组、对称排列书写行楷墨字“风清”“月白”“水秀”“山明”，书法拙朴，但有行楷的飘逸、洒脱。登三楼前木廊，朝右侧眺望远山，暑气里偶有风过，龙眼树的冠盖一团一簇地铺展向溪边，不远处的樟溪白亮的水静静流淌，对岸如屏如壁的山上的植被裹着冷峻的岩峰。白水果然被绿植映“秀”，岩山的确被绿植点“明”！若在三五之夜，于此楼廊上披风呷茶，看那涵虚月色下风动树影，听那远水潺潺，定更惬意。

如斯“风”“水”，何人寻得？

钟官庐以兴建者林至钟之名命名。林至钟，字官常，他白手起家，教子甚严，甚有远见，舍得钱财送子赴福州求学。钟官庐刚起建，村里就遭逢一场横行半年之久的鼠疫。在疫情将终结之际，林至钟因为施针救人而不幸感染身故。儿子林昀继承遗志，铕楼终于告竣，勒字告知后人父辈创业的艰辛：“敝庐始建钟官公，余继而成之。钟、官，先严名与字也。先严自幼贫寒一生，克勤克俭，一丝不苟。晚年以生平所蓄建筑此庐，创业未半，中道崩殂。余因以‘钟官’名其庐，



新栋纪念亭 张玉琳 / 摄

盖所以取纪念也夫者。”

林钟官、林昀父子负重修建成这防御匪寇的建筑，其后，林昀生九子四女，如今这个家族有160多传人。他们各执其业，各筑新居，钟官庐也基本不再住人。墙面上这“风清”“月白”“水秀”“山明”的风雅，是后人对家族曾经沉重艰辛的历史篇章的新时代续写？

村里有20多座民国年间修造的铕楼，严实牢固的庐筑本为对付凶残的匪寇，不少却有着或温情或意味深长的名字，诸如：“梅林小筑”“梅鹤别墅”“养晦山馆”“东升庄”“朝阳庄”……这每一个名字背后是否都有着如钟官庐这样一段可歌可泣又不失风情的家族记忆？

203省道沿着埔垵村南向的山峦脚划过。过往的岁月中，每每驾车途经埔垵，都会诧异这一

两公里路上路亭迭现——省道进入村道的上中下三个入口处各有一个路亭。

位于村中心主道的西向出口有“新栋纪念亭”，是本村旅居台湾的黄长先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为纪念其父黄新栋而建。位于上山面村道口的牌楼“爱乡亭”，是七位陈姓旅沪游子2012年捐建。长尾垵村道出口处的下路口，有旅沪乡亲林镇在2010年建造的“归去来亭”。

山水画卷飞亭阁。一片田园，梅林掩映，枝柯扶疏，蔬菜丛青。如弦的省道划开了田园，弦上停靠着这三个红彩绿颜、檐角欲飞如舞蝶的路亭。新栋纪念亭、归去来亭六角玲珑，两层重檐，飞角如翼；爱乡亭，三开门楼造型，轩昂大气。亭轩即美丽的风景照：亭的柱梁如相框，虚空处摄入迢嶂远山、潺湲近水、错落村舍、花木云鸟。

筑亭之人，从故乡开启了征途，在时代大潮中搏击，挥洒如爱乡亭上书写的联辞一样的激情：“爱心博大崇德尚仁怀远志，乡运亨通敢拼会赢险小康。”筑亭之人，又以故乡为皈依，归来只在亭上题：“关山万里几多乡思几多梦，湖海四方一样明月一样天”“涨落无惊锦鲤樟溪朝福地，高低尽秀灵鹫铁券护桃源”“银雨洒天坐看闲云出岫，金霞铺地伫望宿鸟归林”。

先前途经这几个路亭，只道它们是这个村庄优雅的背影，几经探访、不断寻踪才明白，它们其实是乡民为这片人神护佑的厚土唱响的缠绵恋曲中几个灵动的音符……

走进龙山

林思翔

青口龙山远看就像一条绿色巨龙蛰伏平川，“龙头”昂起，“龙身”平卧，栩栩如生。龙山曾名仙霞山，传说古时夕阳西下时，霞光与水面相映，宛如蓬莱仙境，故称。因其山体肥长，千家簇拥，故近代又称千家山。

龙山不高，顶部海拔也仅 130 多米。山顶原有一座高大的古塔，后塔身被移走，仅留塔座残石，人称“塔座尾”。塔身何以被移走，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如何移走如此庞然大物？这些至今仍是谜，令人生发遐思。如今龙山已被辟为公园，步道环行，可达山巅。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龙山之所以远近闻名，自有其独特之处。

龙山的独特之处在于风光秀美。

在当地文史爱好者郑天强、吴新光的热情引导下，我们登上龙山。虽时届冬令，遍山树木依然蓊郁，浓密的相思树和高大的松杉把山体裹得



青口千家山公园



千家山公园休闲步道



观景台



观景台上，可览天地秀色

严严实实，三角梅、玫瑰和少许斑驳的红叶，给山体缀上点点红晕，绿中泛红，雄浑中透出妩媚。

立于山顶观景台上，可览天地秀色。五虎山、石鼓山、金鸡山、莲花峰、梁山，众山延绵，巍峨挺拔，形态各异，直连苍穹。山峰环绕着龙山，护卫着一马平川的广袤大地。山下江河纵横，阡陌相连，村庄星罗棋布。山水相映，秀色如画。

龙山下这块平坦大地因了众山环卫，成了一片丰腴富庶的沃土。粮多菜丰，是福建首屈一指

的农业高产之地。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省委书记叶飞推广的高产样板田——凤港和被誉为“三分土地千斤粮”种田经的杨厝，都位于这片洋上。这里产的蔬菜远近闻名，是供应福州市区主要的“菜篮子”基地。如今闻名省内外的东南汽车城就静静地卧于山脚下，奇瑞、奔驰，厂房成排连片，生产的车辆如同骨牌般排列有序，列阵于前。眼前的村庄，新楼林立，高低错落，街道宽敞，车流如织，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一幅农村城镇化的壮丽画卷尽收眼底。

龙山的独特之处还在于环绕山体的村庄历史悠久，处处散发“古早味”。

紧偎山体的宏屿村，宋时属闽县崇善东乡还珠里。是古时福州至莆田古驿道必经之地，千年古桥犹存，“石梁古桥，闽邑为最。通福莆古驿，招过往商旅。”村中尚存宋代古井两口。其中一口叫宏四古井的位于宏屿后山直坑底与古村道交接处，井为圆形，内径0.7米，深约8米，井内用青砖横竖重叠式垒砌，井栏为整石凿空而成，上面阴刻楷书铭文：“龙山比丘居悬义畚共造井阙劝首黄绍章副壬戌岁。”据当地文史爱好者郑天强先生考证，此井为北宋建隆三年（962），由住修龙山的僧侣出资并主导，当地的信士和乡民募资出力配合开凿的。千年古井至今完好，水质清纯，仍可饮用。还有一口宏一古井，凿于宋元符二年（1099），井盖由两块半月形石板拼成，中间凿两圆孔用以提水，坚固考究，至今亦在使用。

井是人们繁衍生息用水之来源，也是村落的灵魂。两口考究的宋代古井说明当年村庄兴旺。而僧人主导修井，也印证了《三山志》上所记载的这一带“五代两宋，庙宇林立”。据史料记载，这里当年就建有龙山院、报恩堂院、隆兴院、隐峰院等多座寺庙。宋庆历三年（1043），福州地区官方登记的庙宇就达1625座。闽县地区总人口3.7万多人，有僧人2000人，出现了“钟声佛号闻十里，路上行人半是僧”的景象。寺庙拥有的田地占农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庙宇每年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有一万多贯钱。因此很多僧侣都



宏屿古井

参与建桥、凿井等民间建设，留下了不少古迹和碑刻。宏屿古井的铭文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

宏屿的宏山吴氏宗祠，历史积淀丰厚，是一处浓缩的文化殿堂。宗祠始建于明代，清道光十七年（1837）重建，占地1300多平方米，内有戏台、天井、大堂厅、后厅楼、神龛等。规模宏伟、布局合理，保留了明代建筑风格。

祠堂大门上方镶着石匾，阴刻明代首辅叶向高题写的“宏山吴氏宗祠”六个大字，左右仪门门额刻有明代丞相林有我写的“出悌”“入孝”几个大字。

宗祠建筑十分考究，戏台的藻井雕镂技艺精细，谯楼两侧栏杆雕饰着“二十四孝”人物图案。神龛雕刻尤为精湛，疏密有致，流丽端庄，神话、传说、故事，图案浮雕线条流畅，人物嵌刻栩栩如生。这方木质神龛是不可多得的民间艺术瑰宝，具有很高的文物和观赏价值，据说是当

年聘请三位莆田雕刻高手，闭门三年专心而作方成。

宗祠大堂正面悬挂明首辅叶向高题写的楹联：“临瀨水镇宏山二气效灵钟大地，面金奎拥石鼓双峰挺秀拱华堂。”道出了祠堂的方位与气势。清道光壬辰科状元吴钟骏题联“祖让周孙让吴至德传家燕翼贻谋孙继祖，兄武安弟武顺奇勋盖世雁行齐美弟联兄”，也悬挂厅中。还有明丞相林有我等达官名宦留下的珍贵对联，丰富了宗祠文化内涵。

当然，龙山最独特之处，还在于这里深藏着的后土文化文物。

在龙山乾元殿，我们看到了这里出土的“报恩堂梁贞明五年”（919）碑刻和“龙山天公地母，崇宁二年”（1103）石碑以及“后土之神”石碑等五代和北宋文物。还有一个遗存的宋代石香炉和一块长4.1米、宽0.66米、厚0.16米，重一吨多的石横匾，正面刻“拱秀钟祥”，中间浮雕篆刻“凤翔”，背面刻有“彩凤朝阳”。透过这些历史遗存构件加以文献佐证，有关专家认为，龙山是当年弘扬后土文化的一个重要场地。当地文史爱好者郑天强、吴新光为我们解读了这里与后土文化的深厚渊源。

他们说，根据这些文物和当地老人口口相传，龙山宋代时，建有许多庙宇和社坛，龙山之所以密集发现宋代这些文物，说明后土文化信仰那时已在龙山扎下了根。

“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黄河，发源于黄土地之上，为我们民族打上了“黄色”烙印，她以黄土地丰腴的胸脯哺育着我们这个黄皮肤的民族。土生万物而不取，孕育万物而不弃，承载万物而不怨。中华儿女对黄色土地从来敬畏、崇敬，感情深笃。用于指代上古时代国家的社稷，就是古代帝王和诸侯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据专家考证，我国自西周时期就开始祭后土，汉武帝时定汾阴（今山西万荣县）祭后土，并建后土祠，这座有史记载中国最早的后土庙，迄今2100多年仍香火不断。

后土文化的形成就是农耕文明的体现，后土神灵的产生实际上是农耕文明高度依赖土地的结果，后土文化与土地文化是相伴相生的。龙山的社坛和后土庙是后土文化由北向南传播的一个例证，也说明当年龙山是后土文化信仰的一个重要场地。

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大地如母，养育了万千生物和人类。人的血脉中，都流淌着依恋乡土的文化基因。当前，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尤为重要。因此，弘扬后土文化，唤起“地根意识”，感恩大自然，珍惜绿水青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可喜的是，我们在龙山看到，目前宏屿的有识之士正在挖掘后土文化，修复文化遗址，让龙山公园成为一处弘扬土地文化的标志性场所。

大地之眼

鹿 野

1

很难去定义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村庄还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市集，又或是一个现代化的居民区，虽然地名仍然沿用着过去的“宏屿”。

宏屿是一个大村，因人口众多，于是又分成了宏屿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以及吉山后湖行政村，简单直接的命名方式可能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一个缺少历史和文化底蕴的现代飞地，就像刚一入眼时它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和狭窄拥挤的街道。来去呼啸的大小车辆穿行其间，喇叭声此起彼伏地鸣叫着，擦着行人的衣角开过；街边自建房底层做门面，陈列着各种各样的商品：水果、蔬菜、肉，也有时尚服饰店、电器行、百货超市、餐馆、金店、电信营业厅……城市里有的，这里也都有。那些未经设计简单修建的、外墙灰白的小楼挤挤挨挨，相邻的两栋楼推开窗户都能望到对面厨房主妇正在煎带鱼还是炸海蛎饼。

错落的高楼中也有围墙围起来带着院落的大房子，院子里还种着荔枝、龙眼，古老的树木旁边搭个中式亭子，红漆立柱上刻着吉祥美好的联

句。有老人家闲坐在里面，兴许是在等待放学的孩子，他们哼着闽剧，自得其乐。这时候你又会相信，是的，诚如其名，这里还是一个村庄，一个正在向大都市转变，又未完全转化的村庄。

不同风格的建筑展示着这种转变的痕迹，低矮的农舍已经消失，偶尔可见一两处无主之地还残留半人高的土坯泥墙，干硬的黄土墙中夹杂着海边人家才有的蛎壳碎瓦片，一蓬蓬荒草从中冒出来，更增加了一点古意，更多的是已经翻修成了高高低低的水泥小楼，二层三层四层……一家高过一家。

黄金之地，楼挨楼，店挨店，人们争相地在有限的地基上建起高楼，经过一段时间毫无规划的野蛮生长以后，形成了今天犬牙交错密不透风的样子。也许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所有的建筑都将变成整齐划一的玻璃幕墙的高楼，那时候，这个村庄就将完全地城市化了，取而代之一个更加现代更加时尚的街道或社区名。

若还有什么是不变的，恐怕就是静守在闹市街心的那口古井了。

与这些竞相往高处生长的地面建筑不一样，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向着相反的方向延伸，深入幽

暗与深沉的地心，直至觅到地底的一汪清泉，汨汨而出，千年不竭。到了今天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有了先进的自来水供给系统之后，人们已经完全不再依赖古井的水源供给了，甚至年轻人已经忘记了人类从地底取水的方式，但它依然悄无声息地隐于车水马龙中间。喧嚣纷攘的人流车流从它身边经过，井口如同大地的眼睛，摇晃着波光，静静地观察着地面上发生的一切。

2

古井位于宏四村最繁华的街道中心，是通常可以见到的圆井样式，井口略大，三四人环抱，井沿是最为简朴的粗石开凿而成，上面镌刻着一行字，被今人用红墨描过，清晰可辨：“龙山比丘居恳义畝 劝首黄绍章副 壬戌岁”。

于是一群围观者仿佛找到了破解一段村庄历

史的密码，纷纷拆解起来。

“龙山”，应该就是村子背倚的这座山，只是现在已经改名为“千家山”。山不算高，但足以作为整个村子的后花园。山上建有生态公园，植有大片的山樱花和碧桃，春天来的时候漫山绯红。山顶修建了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的观景台，宏屿的沃野田畴便在千家山的护卫之下，一派悠然自得——想来还是叫“龙山”更有气势。

山脚处有一道观，不算宏伟，但自有一份清幽。虽是道观，但显要处供有一尊巨大的观音像；观内供奉玉皇大帝和后土娘娘。这样“儒释道”不分家的现象在闽地的宫观寺院中并不少见。按照观内道长的说法，此处便是千年前“龙山院”的旧址。是的，井沿之上所记录的造井阙者“龙山比丘居恳义畝”，应该就是来自这龙山院了。当年正是在这位比丘的倡议之下建了这口井并修了井阙，即井栏。“劝首黄绍章副”大概是村人中的乡贤人物，热心公益之事，出面筹集资金，共同完成这一件今天看来不小的义举。时间是“壬戌岁”，为宋建隆三年，即962年，距今千余年不虚。寥寥几字，清晰地道出了这口井的身世由来。

井旁还残留着一阙土墙，大概是清末建造的民间房屋倒塌过后的残余。一同去的杨琮老师是考古界的权威，他用手细细摸了摸土墙里的蛎壳、砖块、泥土，还有一些瓦石碎片，说这一带在晚唐时期就有人居住了。这些建墙的材料就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里面所含的杂质可佐证居住



被保护的宏四古井

在这里的先人留下的痕迹。

以这口古井为时间的坐标，我们可以简单地追溯一个村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一定是先有人落脚于此，当人口渐渐稠密，才会建寺院，再更多的人聚集，形成一个个村落，建起更多的房屋，不断有人迁来，共同组成了这个小小的社会。可以被清晰记录的是近些年宏屿由一个蔬菜种植、水产养殖的农渔社会到工商业社会转变的痕迹：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宏屿打造蔬菜基地，当地出产的芋头、大白菜曾经出现在每一个福州人家的餐桌上；90 年代，东南汽车城取代了蔬菜基地与大棚，村民们由田间地头转身上路，纷纷驾着大卡车跑起了运输，搞起了物流，实现了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型……

但是带我们来的村人觉得仅仅这些还不足以证明此地的荣耀，他们希望沿着时间轴相反的方向，将村庄的历史拉回更遥远的年代，从中找到一些闪光的名字来照亮宏屿历史的星空。

那个凭一己之力建造了这个乾元宫的道长，长着一对精灵一样的耳朵，瘦削的脸上有一双仿佛不谙世事的眼睛。他和另外一位执着的文史爱好者，利用一切机会向参访者诉说着他们发现的雪泥鸿爪，以证明历史上这里留下过先贤的足迹。

但相对于宏大的历史，我更好奇这样一个人何以在这山上建了一所道观。他说自己早年做运输——是的，青口宏屿的村民们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以运输物流业起家建立了庞大的物流公司，他也跟着开大卡车，载着钢材、水泥、



从井口俯瞰古井内部

化工原料等奔赴福州、厦门新修的高速公路上。多年的辛苦拼搏积累了不少的财富，但是在此过程中，似乎家人的健康出现了些问题，他不愿细说，我想一定是遭受了大的打击和变故，才会让他几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私人出资建造了这个道观。在建造道观的过程中，不断从地下挖出刻字的石条、类似瓦当的碎陶片以及一些体量颇大的石梁——这越发激励了他把精力投入自己的信仰当中。墙上挂着的一张“道长执照”据说来自宗教协会的认证。

他不断地向我们诉说着这些事物的重要性，想要向我们证明这个小小的村子曾经地处古驿道要隘，历史上一位有名的僧人曾光顾并留下诗作；那个横梁上的字迹多半出自明代首辅叶向高；还有关于此地曾建有社稷坛的记载，他们也收集起来，热切地要告诉世人：此地曾有神灵显

应，曾获得中央权力的重视，且有大人物纷纷留下痕迹，似乎唯有如此才能突显这个村庄灿烂悠久的历史底蕴与显要地位。

为了证明这个地方的文化与血脉源远流长，村人又将观者带到那个气派的吴氏宗祠里面。

一座明清时期的四合院，宽敞的天井里有老人正躺在竹椅上晒太阳。天井四壁依次张贴着历代吴氏先祖杰出者的画像，大多数是考取秀才举人当官的。走过天井，屏风后面是祖宗牌位供奉处。引领者颇为神秘地将我们引到里间，掀开帘子，让我们瞻仰陈列多层的框架上的吴氏祖宗牌位，一具具牌位精雕细琢的程度让人惊叹。据说这是当年吴家后人花了巨资请莆田仙游的木雕匠人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雕刻完成的。凑近细看，确实繁复精美，可以说是木雕技艺的精华。据说早些年疏于守护，那陈列柜一侧的镏金画屏就被人剥去了半面。

3

作为一个没有家族历史可追溯的外来移民，我对这种浓重的家族根脉和乡土情缘充满了羡慕与敬意，可是在这遥远的家族历史和触不可及的祖先成就面前，我还是更愿意亲近那口古井——它的存在证实着，有人用最为原始的劳动力，一点一点挖出了这口井；有人在井边砌屋筑房，生儿育女；一代一代平凡普通如你我的先人在此生活，每天从井中打水，做饭，洗衣，沐浴；它证

实着，无数的生命在这里繁衍，在时间的长河里诞生了更大的家族与村落、城镇，乃至如今的蔬菜基地以及现代化的汽车城。

它是真正活着的，并仍在滋养着众多生命，贴着井沿还可看见清冽荡漾的井水映出好奇探看的脸，井壁上布满的青苔间长出细小的野草。还有我们看不见的小生灵寄居在它的身体里。1000多年，它依然承接着天上的雨水，吸纳着地底的潜流，连接着脚下的最深层的土地。

那些在井边存在又消失的不可计数的平凡的村人，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奋斗史，我们无从细考了，但这口古井是大地的眼睛，见证了一切。在我看来这些普通人才真正创造了神迹。

除了井栏上刻着的两位有姓名的倡建者，一定还有深入这口深井底部胼手胝足开拓出这口古井的匠人们。当时没有现代化的勘探设备，那就只能凭着运气来挖掘。未知的地底是否有源泉，也只有抵近深入之后才能知晓。或许他们一定是经过了不止一次的失败才获得了这口井，然后选定了以此作为生活的半径，开始一点点建造。

如果真有神灵，我更愿意相信是这广博的大地有灵，古井便是地母张开的眼和口，不然何以人们自古至今都以“一口”或者“一眼”来指称井呢？当我们趴在井口好奇地探看井底的世界，大地之母是否也正通过这古老的眼睛守望着地面上所发生的变迁，是否也正以它独有的语言诉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遥远而漫长的，且正在延续着的时间的奇迹呢？

秋江夜泛七里诗

叶育新

闽县七里地处闽侯县东南部，早在宋代，闽县在此设十四里，分内外七里。元代以后，以还珠里、西集里、方岳里、永庆里、清廉里、灵岫里、积善里为内七里，俗称闽县七里，其范围大致在今闽侯县青口、祥谦、尚干三镇。在七里境内，濂江贯穿全境，为七里人民的母亲河。500多年前，濂江流域生活着大义陈氏、扈屿叶氏、尚干林氏三大家族，他们重视耕读传家，世代联姻，文人辈出。明弘治年间，大义进士陈娃、扈屿举人叶稷、尚干进士林璧等相约交游，竟演绎出一段秋江夜泛的文化盛事。此事虽为一时风雅，却名播至今，成为美谈。

一、秋江夜泛的时间、地点、参与人物

林璧（1444—1508），字世调，号双松，尚干永庆里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官至广西左布政使。他是秋江夜泛诗会的发起人之一。林璧所倡导的秋江夜泛主要参与人为尚干林氏、扈屿叶氏和大义陈氏等三家文人。明曹学佺编《石

仓历代诗选》收录林璧所写的《秋江夜泛诗并序》一文，对此有详尽交代，摘要如下：

义溪陈君文厚，予乡同年进士也，不乐仕进，隐于桐山，殆二十年号桐山先生。弘治乙丑春，乃弟金宪留余先生冢子达暨乃侄墀同登进士第，余邀叶宜休先生往贺，因得访文厚于濯缨亭。次日复移舟从余江浒，潮至而别，未能尽欢。文厚乃期为秋江夜泛，月一会，会有诗，以文酒交欢，谊至厚也。亡何余弟世增归自南宫，闻而心醉，遂坚前约。以是秋八月十有三日同世增泛舟会于匏峰渡之坂口。

西集里大义陈氏也称荣绣陈氏，自明永乐至隆庆100多年间，先后涌现出9位进士，均官居四品以上，世称“九条金带”。弘治十八年（1505），大义陈墀（1463—1530）、陈达（1482—1554）两个堂兄弟同登进士，为家族赢得殊荣。闻此喜讯，已经退休在家的林璧邀上辞官归里的扈屿表弟叶稷（1447—？）一起前往大义登门拜贺。



弘治乙丑年（1505）春，林壑、叶稷两位前往大义祝贺时见到了隐居的陈焯，次日，宾主双方移舟江上，潮至而别。因未能尽兴，陈焯便提议举行秋江夜泛诗会，每月一会。到了秋天，刚参加完举人考试回乡的林壑得知此事，极力赞成举办这样的约会。当年八月十三日，由林壑主会，这些七里名公在濂江河段进行了第一次秋江夜泛之游。我们可以遥想，5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夜，皓月当空，几位诗人坐着小船，沿着曲曲的江流，泛舟水上，一路把酒临风，浅吟联句赋诗，传为百年佳话。

明崇祯十四年（1641）《扈屿叶氏世谱》所录黄玠《秋江夜泛诗序》也有记载：

……弘治乙丑（1505）秋，三山致政宪金留余陈公偕方伯双松林公、太守侗庵李公、教谕宜休叶公共为泛江之会，而金宪伯氏桐山君，方伯之季翠庭君亦与焉。……盖金宪诸公皆仕而归者，桐山翠庭则皆以乡进

士隐而不出者也。

上述文字中提到的秋江夜泛参与人物还有“太守侗庵李公”，此人即李廷美，林壑岳父，原籍古田杉洋，后占籍闽县，与陈焯的堂兄陈炜同为天顺四年（1460）进士，官至苏州知府。《扈屿叶氏世谱》记载：

（叶稷）与大义孝廉陈桐山焯、金宪留余陈焯、方伯尚干林双松、孝廉林世增壑，小门下洋太守李侗庵廷美等结为诗社，有秋江夜泛诗。

笔者分析，文中的“下洋”有可能是指今长乐营前镇下洋村，下洋古称高详里，属七里的范围。然而由于资料散失，目前尚未见到李廷美的秋江夜泛诗。

二、诗会作品赏析

联句，这是古代诗会的一种形式，是指一首诗由两人或多人共同创作，每人一句或数句，最后联结成篇。林壑的《秋江夜泛诗并序》描绘了当年秋江夜泛的场景：

是日，桐山宜休留余三先生咸在方舟促坐，陈蔬果列樽罍，随潮上下，月白江清，山光凝翠，景殊可人。今日之游，人景俱胜，不可寂然已也，遂以唐人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

人”二十字为韵，觥筹交错，唱和献酬，即事寄兴，人各一咏，遂为联句，率成十韵。

上述文字可以看出，本次秋江夜泛以联句作诗的形式举行，以唐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20字为韵，人各一咏，共成十韵。明崇祯十四年（1641）扈屿叶其郁辑录的《扈屿叶氏世谱》，其第八卷收录了弘治十五年（1505）八月十三日秋江夜泛首会的十韵联诗，十分珍贵难得，选其部分摘录分析如下。

其 二

沧江万顷一天秋（双松），此会何殊赤壁游（桐山）。

击筑敲诗摸远景（留余），倚蓬把酒捉苍头（宜休）。

半林月色悬青镜（留余），几处渔歌起白鸥（桐山）。

九日黄花犹有约（宜休），东岐翘首望仙舟（翠庭）。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由“双松”（尚干林壑）、“桐山”（大义陈焯）、“留余”（大义陈炆）、“宜休”（扈屿叶稷）、“翠庭”（尚干林壑）依次联句而成。韵脚为“移舟泊烟渚”的第二字“舟”，押尤韵，联句内容既有对自然风光的描绘（“沧江”“月色”“渔歌”“白鸥”），又有对秋江夜泛场景的叙述（“击筑敲诗”“倚蓬把酒”），更有自比北宋苏东坡携好友赤壁夜游的抒怀。我们不难看出，几位七里名公在夜游濠江时愉悦放松的心情。其中“九日黄花犹有约”表

示对下一次聚会的期待，而“东岐翘首望仙舟”则点出本次秋江泛舟的出发点是在濠江中段的东岐道（今闽侯县青口镇庄头村附近的江域）。

其 五

草没平洲月在渚（桐山），金风一阵吹残暑（双松）。

水光山色两宜人（翠庭），短棹分携重延伫（留余）。

赏析：这首四人联句而成的七言绝句，韵脚为“移舟泊烟渚”的第二字“渚”，押语韵。诗句描绘了当年濠江秋夜所看到的“草没平洲，明月在渚”的美景，又通过“金风”“残暑”点出季节和气候特征。诗人们泛舟濠江，旖旎的水光山色让他们心旷神怡。然而时间过得很快，诗人们恋恋不舍这样美好的聚会，小船长久停留在江边。

其 九

解却烦襟万古愁（双松），夜凭短棹泛清秋（桐山）。

月华似画离林岧（宜休），水色和烟漫荻洲（翠庭）。

落笔无诗成寂寞（双松），飞觞有客总风流（宜休）。

老来贪着登山屐（留余），会看雷云起状头（桐山）。

这首七言联句律诗，韵脚为“日暮客愁新”的第四字“愁”，押尤韵。在继续写景抒情之后，身为退休官员的留余（大义陈炆）发出感慨“老来贪着登山屐”。陈炆为官清廉，素有能声。在

担任南京御史时，他巡视两浙，奏劾贪吏监司以下13人，名声大起。弘治元年（1488），他又上疏奏苏民困等8事，均被采纳。如今，告别官场的险恶，悠游于山水之间，其长子陈达和堂侄陈墀一起高中进士，陈娃的心情十分惬意。而桐山（大义陈焯）的“会看雷云起状头”则对年轻的林逵（翠庭）充满鼓励，期待他来年荣登状元。

在《扈屿叶氏世谱》卷八的十首联句诗后面还录有一首诗，由林塋、叶稷、林逵联句而成，摘录如下：

别桐山留余二先生舫舟北洲山下，以待潮退而返，把酒怅然有怀漫成联句。

客散江头潮欲平（双松），百壶未尽主人情（宜休）。

烟笼村色空中溟（翠庭），月浸江心分外清（双松）。

解棹乍违今夕念（宜休），抱琴还订后时盟（宜休）。

芦花两岸秋萧瑟（翠庭），忍听翩联过雁声（翠庭）。

可以看出，首次秋江夜泛是在北洲山下停船靠岸，这时陈焯、陈娃两位先生已经离开返程。北洲山的位置在闽侯县祥谦镇卜洲村，位于濑江上游的汇合处。卜洲村的险江湾是濑江三十六湾之一，也是濑江的第一个湾。笔者推测，弘治十八年（1505）八月十三日秋江夜泛的路线大约是从濑江东段庄头村附近的东岐道出发，顺着涨潮的潮水行舟，依次经过凤港、施厝、杨厝、洋下、卜洲等村落的河段，再经过义溪流域的南边、吉山、船尾等村落，大义的陈焯、陈娃两位先生应该是在大义村的河段上岸，随后，小舟又原路返回，停泊在卜洲村附近的险江湾，等待退潮时顺流返回。上述诗作就是林塋、叶稷、林逵三位在北洲山下候潮时所作。

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收录多首陈娃的秋江夜泛诗，摘其目录如下：《九月十三夜泛分韵》《十一月十三日余主会夜泛东江分得桃字韵》《与林方伯世调、叶学谕茂才、乡进士世增、洎堂兄文厚夜泛分得鸟惊二韵时乙丑岁十一月十三日》《东江夜泛用谢康乐诗句十韵》《腊月十四夜翠庭主会泛江以欲问吴江别来意为韵》。

不难看出，当年秋江夜泛的确坚持每月一会，而且都在每个月的十三日由各家轮流做东召集。《石仓历代诗选》保留的部分幸存诗文为后人了解当年的秋江夜泛盛会提供了难得的研究资



料，其中不乏佳作，如《十一月十三日余主会夜泛东江分得桃字韵》：

扁舟几度泛江皋，天纵清游属我曹。别渚尚开霜后菊，钓矶闲走石边螯。

诗情放浪成千首，雪色缤纷笑二毛。为语渔人莫惊讶，前溪不种武陵桃。

显然，十一月十三日的秋江夜泛的活动范围在濂江东段，也称东江夜泛。本次诗会不再以众人联句成诗的形式，而是每人分一个韵，分别独立完成一首七言律诗。陈桂所作这首诗以“桃”字为韵脚，押豪韵。通过这首诗，可以想象弘治十八年（1505）十一月十三日初冬诗会的场景：江边的霜后菊尚在开放，石头缝隙中的螃蟹悠闲爬走，几位白发老翁又一次相约泛舟江面，尽享山水之乐，对此美景他们不由得诗兴大发，成诗不断。空中落下缤纷的雪花，仿佛在笑老诗人们的痴狂，连渔翁都为他们的纵情而惊讶，诗人们却告诉渔翁不必惊讶，濂江虽非世外桃源，前面的溪边虽没有种着桃花，但濂江沿岸美丽的山光水色也足以让人们流连忘返。

三、秋江夜泛的成因和结局

为什么闽侯七里地区会在明朝中期产生秋江夜泛这样的文化盛会呢？其一，七里秋江夜泛的文化盛事始于弘治年末，当时正处于明朝最繁盛的时期。弘治皇帝即明孝宗朱祐樘，其统治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天下

小康，史称“弘治中兴”。参与诗会的主要人物宪金留余陈公（陈桂）、方伯双松林公（林璧）、太守侗庵李公（李廷美）、教谕宜休叶公（叶稷）均为朝廷退休官员，而举人桐山（陈焯）、翠庭（林埜）都是隐而不出者。当时繁荣安定的社会背景给文人之间的雅集提供了存在的土壤，在宽松的社会气氛下，诗人们才能组织诗会而不用担心官府管制或政治上的不利影响。

其二，参与诗社的几位诗人都是当时七里地区著名的文化名流，他们大都出身于文化世家。如陈焯、陈桂属大义陈氏“九条金带”家族，其祖父陈遇有文名，志趣高雅，曾在义溪万玉潭附近种竹万竿，引得杨士奇等名流题咏；而扈屿叶稷的祖父叶光为永乐间南海主簿，为官清廉，有诗名，曾筑后山亭，与陈桂伯父陈叔刚御史、闽中名士高漫士等交友唱酬；尚干林璧、林埜四兄弟中有两进士两举人，其祖林昌茂的堂兄林枝为明初闽县著名文人，与扈屿叶稷的祖父叶光等交好。从族谱可知，大义陈氏、扈屿叶氏、尚干林氏累世联姻，太守李廷美虽为外籍迁居本地，却与尚干林璧交游，并把女儿嫁给林璧的弟弟林埜。这些诗人或是同年，或是姻亲，或是好友，他们志向高洁，志趣相投，也为诗会奠定了重要的人际基础。

其三，景色优美的濂江曲水为诗会提供良好的地理环境。秋江夜泛的水路正是七里地区的主要河流濂江。濂江，又称濂水，起源于七里地区周边的山脉，不断汇聚溪流而成，一路自西向东

蜿蜒向北延绵，最后汇入乌龙江。濑江有三十六湾，支流遍布七里全境。西集里的义溪是濑江上游，流经清廉里卜洲村的险江湾后称为濑江，中段流经还珠里扈屿和灵岫里洋下等村落的河段两岸称七里平原，下段流经永庆里尚干地区的水域称淘江。濑江上游的义溪为陈氏世居地，中段葫芦山的偃匏口为扈屿叶氏世居地，下游的淘江则是尚干林氏的聚居地。“义溪下匏口，东与淘江合。”这是林鏊在《秋江夜泛诗并序》中的附诗，为我们勾勒出当年秋江夜泛的主要路线是在义溪—濑江—淘江之间。其中，濑江中部的扈屿河段流经沪屿、洋下、杨厝、施厝、凤港、庄头、镜上等村落，这段江面弯曲萦绕，水流平缓，正是濑江三十六湾中景色最美的河段，也是当年秋江夜泛的核心河段。清黄致中有《夜泊扈屿》诗曰：“日落晚山苍，沙平秋渚广。芦苇鸣萧萧，渔灯射乌榜。半夜觉潮生，月斜橹声响。”明郑善夫的《从扈屿沿溪路行抵义江陈职方留宴山中》则写：“扈屿逶迤连紫台，濑江曲曲罢喧豗。渔人钓艇沿溪泊，野老柴门傍水开。树底巧通仲蔚宅，玄中殊愧子云才。南游兼得酬佳节，黄菊青山共举杯。”这样的优美的风光给秋江夜泛提供了绝好

的地理环境。

林鏊在序文中对秋江夜泛诗社给予高度赞扬，他说：

呜呼！谢尚之牛渚，东坡之赤壁，亦一时之偶防耳，名播千古，后世侈谈，岂不以人哉？今日秋江之游，虽未能追踪往哲，然而七里之山川，宁减牛渚赤壁？而文厚诸君之逸兴，其视谢尚东坡何让耶？

上文中，“谢尚之牛渚”指东晋时期谢尚牛渚泛舟赏识重用袁宏的典故，而“东坡之赤壁”指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与朋友夜游赤壁，写下《赤壁赋》等千古名篇的典故。在林鏊心目中，无论是七里的山川，还是濑江的景色，都不逊色于牛渚、赤壁等名胜古迹，而陈焯等七里文人的雅兴，也丝毫不让于当年的谢尚与苏东坡。但遗憾的是，秋江夜泛诗社并没有持续时间太久，明《扈屿叶氏世谱》所录黄玠《秋江夜泛诗序》中说：

会始是秋历是冬又至明年之秋而冬止。为会者仅四，得诗凡若干首……而好事者又特为之梓行，故余得以推而序。黄玠，字仲固，莆田人，与陈达同为弘治



十八年（1505）进士。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秋江夜泛的时间应该是弘治十八年（1505）秋开始，到第二年正德元年（1506）冬天结束。明正德十六年（1521），已任官多年的陈达刊集父辈的秋江夜泛诗，并请同年好友黄巩为之作序。虽然当年的文集已经失传，但《石仓历代诗选》收录的林壑、陈焯等人诗作中亦有与秋江夜泛相关的诗句，亦可与之印证，如：

答陈文厚

（明）林 壑

露下天高星汉秋，长江十里称闲游。雁声缥缈烟连树，月色浮沉水满洲。

笑折黄花聊插帽，酣歌白苣久停舟。知君不负沧洲约，何日重盟海上鸥。

第二句“长江十里称闲游”，疑为“作闲游”。从诗句“知君不负沧洲约，何日重盟海上鸥”可以看出，秋江夜泛诗社已经解散，诗人林壑向老友陈焯表达了他对重盟诗会的期待。那么，陈焯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从他的诗作中寻到答案：

《漫兴寄友人》

（明）陈 焯

青山谁识隐君扉，寂寞茅堂落叶稀。惯睹儿童驱犊去，不知冠盖买山归。

白鹅浴水间牵藻，沙鸟窥鱼晚上矶。老我不堪秋夜泛，赓酬莫讶与君违。

陈焯的“老我不堪秋夜泛，赓酬莫讶与君违”表达了自己的委婉拒绝，其理由是因年老不

堪。史料记载，陈焯为人狂放，他不乐仕进，恣意山水之间。既然他是秋江夜泛的提议者，为什么会婉言谢绝老友的建议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变化有关。黄巩在《秋江夜泛诗序》中说：

当是时群英汇征，国家极盛之时也。寃金诸公方相继引去，如不及，桐山翠庭亦自放于寂寞之滨……而后天下多事，一时缙绅鼠逐，流离交迹而不能，下至山林退处之士亦皆杜门畏祸局蹐自安……

弘治时期是明朝最繁盛的时期，也是序言中所说的“天下极盛之时”，然而，随后登基的明武宗朱厚照（即正德皇帝）却被后人认为是明朝最荒唐的皇帝，其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明武宗即位不久，便任用刘瑾为首的宦官等8人，时称之“八党”。在他们的诱导下，武宗造“豹房”“新宅”等密室，每日游乐其中，荒嬉无度。皇帝不理政事，再加上宦官的恣意妄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如黄巩序言所说：“天下多事，一时缙绅鼠逐，流离交迹而不能，下至山林退处之士亦皆杜门畏祸局蹐自安”，文中明白地告诉我们，在君主荒诞、社会动荡的明王朝，文人纷纷杜门畏祸以自保，闽侯七里的秋江夜泛诗会只好解散。黄巩这篇序文作于正德十六年（1521），正是明武宗驾崩之年。因此黄巩在文中含蓄地点明了秋江夜泛诗社解散的真正原因。